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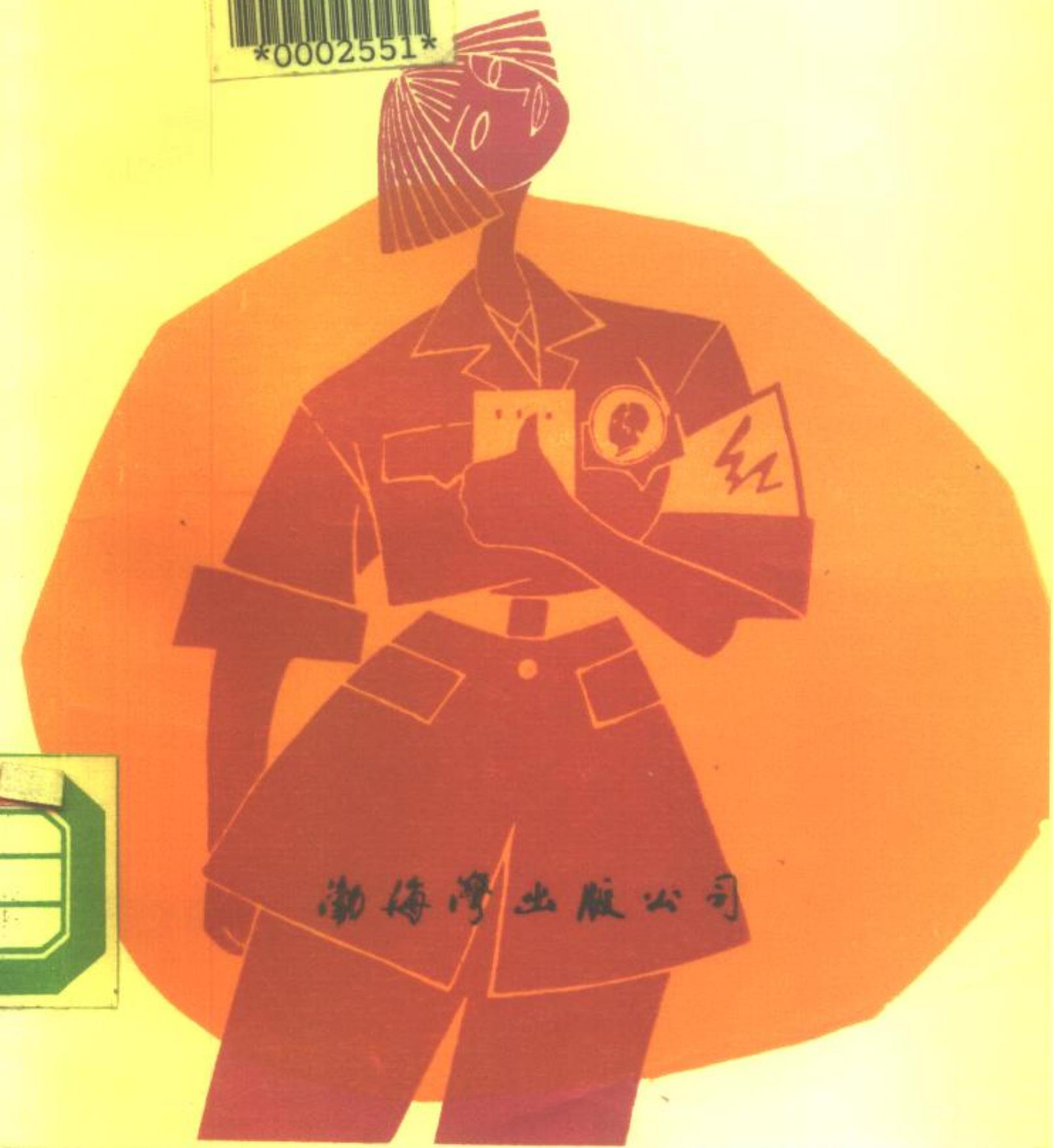
(美) 阿妮达·陈 著 史继平 田晓菲 穆建新 译

毛主席的孩子们

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



0002551



渤海湾出版公司

(美) 阿妮达·陈 著
史继平 田晓菲 穆建新 译



2 020 5468 6

毛主席的孩子们

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

渤海湾出版公司



毛主席的孩子们

——红卫兵一代的成长和经历

〔美〕阿妮达·陈 著

史继平 田晓菲 穆建新 译

渤海湾出版公司出版

(天津市和平区新华路庆云里23号)

河北省深县印刷厂印刷 中国青少年读物发行总公司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2插页 186千字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00

ISBN7-80561-001-0/D·2 定价：3.10元

序

文化大革命是对现在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惜于种种原因，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南开大学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将有计划地组织开展文化大革命学研究，并致力于与文革社会生活、文化、心态有关材料的挖掘、抢救和整理。为了了解海外学者的研究状况，我们还计划有选择、有针对性地翻译和介绍一批国外有关文革研究的著作。《毛主席的孩子们》就是政治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翻译的第一本书。

《毛主席的孩子们》是近年来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一部有影响的著作，是一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文革前后内心世界的书。译介此书的一个目的就是想为国内有志于从事文革研究的人提供一些在方法、材料和认识上可资借鉴的东西。关于这本书的内容，我不想说得过多。导读式的序言无异于给人限定思维框架，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有对读者不信任之嫌。

关于文化大革命本身，我倒有一些想法，兹述如下：

一、文化大革命结束距今只十余年，而文革爆发到现在也不过二十二年，但这段历史却开始在人们心中淡化。经历过的人或因耻辱、或因负疚、或因厌恶而不愿旧事重提，年

轻的一代则由于没有亲历而对这段历史又很淡陌。两者结合起来有可能导致一种历史健忘症。当然仅仅忘记过去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但可怕的是——一旦我们真地遗忘掉了这段历史，那么会不会出现历史的重演呢？“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一句由我们民族智慧结晶而成的古老格言不是已经告诉我们一些答案了吗？反思过去，是为了有一个更好的现在与将来，记住、思索、分析这段历史是我们抵制类似悲剧重演的一件得心应手的武器，有助于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

二、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从是非功过方面进行判断的。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把否定变成简单的遗弃。文化大革命绝非离开中国历史轨道之外的怪物，它恰恰是中国历史浓缩的再现，是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种主义与当时追求的社会主义等诸种因素的奇特结合。文革中所表现出来的丑恶、残暴、麻木、疯狂以及对理想的追求，种种现象，大都可以从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找出原型。文化大革命无疑是领导者错误发动的运动，但进一步观察与思考，又不能否认，它也是被发动起来的人们的一次相当自觉的运动，以至出现了被忠于的主体无法或难于驾驭效忠者的现象。历史的事实驱使我们需要从更深的层次去理解文化大革命现象。

三、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其实是革文化的命，这自然是不错的，但换一个角度看，它又是一次由一定的文化支撑的运动。现在有一些人把文革视为权力斗争，这样就很容易把思维限制在一个狭窄的框子里。其实底层社会所表演的一幕幕活剧，是更值得重视的，是整个社会文化与心态的大暴露。权力斗争问题固然需要研究，但社会文化与心态的研究目前

看更是刻不容缓的，应加紧进行材料的搜集与研究，因为这些很容易随着一代人的自然消失而给后人留下空白，向下一代传白卷是莫大的过失。

四、研究文革从政治文化方面进行考察是不可或缺的。政治文化有两方面，即政治文化化与文化政治化，前者表明，一定的政治体制通过有效的政治社会化手段可以内化而成为共同体成员的政治文化观念；后者则表明，政治运行无法离开特定的文化背景，并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与改造。从这一点出发来看文革，不难看出，政治与文化的交互作用、相互制约，在整个文革过程中表现得异常突出。《毛主席的孩子们》按作者的观点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不足之处在于，作者对于文化的政治化，亦即文化因素对政治过程的影响，显然注意得不多，从而给人以隔断历史的感觉。

《毛主席的孩子们》即将付梓，编辑和译者约我写几句话，借此呼吁几句，开展文革社会生活与文化、心态的研究，权以为序。

刘泽华

于南开大学政治文化研究中心

1988年11月10日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1、研究方法与实例调查	(3)
2、政治积极性——积极分子	(5)
第二章 小学的政治教育与性格构成	(13)
3、党的教育与杜威主义	(15)
4、政治教育的组织	(19)
5、区：顺从的儿童积极分子	(23)
6、白：有纯正癖的儿童积极分子	(39)
7、张：反抗的儿童积极分子	(49)
8、邓：讲求实际的儿童积极分子	(58)
第三章 青春期的政治社会化	(66)
9、小组	(67)
10、阶级教育	(70)
11、共产主义青年团	(71)
12、模范教育	(76)
13、英雄人物与死亡主题	(84)
14、英雄人物与个人主义	(87)
15、区：顺从的青少年积极分子	(89)
16、白：有纯正癖的青少年积极分子	(102)

17、张：叛逆的青少年积极分子	(125)
18、邓：抱有实用观点的青少年积极分子	(139)
19、阶级阵营和统一性的加强	(149)
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政治积极性的一次检验	(159)
20、第一阶段：正统化的运动	(160)
21、第二阶段：自由化的运动	(176)
22、造反派的信条	(182)
23、脱离毛泽东主义的规范	(185)
24、张：文革中的造反派积极分子	(193)
25、邓：文革中的务实派积极分子	(201)
26、白：文革中有纯正癖的积极分子	(208)
27、区：文革中的驯服的积极分子	(220)
28、自我欺骗	(232)
第五章 非政治社会化：文化大革命的后果	(235)
29、非政治社会化	(239)
30、张	(242)
31、邓	(246)
32、白	(249)
33、区	(252)
第六章 中国的政治社会化与权威人格	(257)
34、权威人格	(257)
35、中国人的行为与权威人格	(261)
36、政治社会化的不同结果	(265)
37、权威主义与非社会化	(278)
38、新一代	(279)
译者后记	(281)

第一章 导 言

“我一直坚持不懈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所以，睡觉时我经常先让别人选好地方睡，我还经常为他们打水喝。我是想以此来表明我的心是好的。我这么做是那么自然。我曾经做过多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指导，我向雷锋、王杰、白求恩、张思德这些革命典型学习。我学他们是一心一意的，并照他们的事迹去做，让毛泽东思想影响我的行动。毛泽东思想我是活学活用的。”

当六、七十年代在中国的报纸广播中见到这样的表白时，禁不住要引起人们的怀疑。这一种热情，看起来是那么装模作样、渲染过度，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它还很容易被人们当作笨拙的、人为的宣传而搁置脑后。

可是，这段引语并非来自任何一份官方的出版物，它来自1975年在香港我同一位年轻女士的谈话录音——带着嘲弄的口气叙述她在中国监狱里的行为。我的所有访谈对象都是做过红卫兵的那一代人，和这位年轻女士一样，他们中

绝大多数人对毛泽东主义的献身行为，可以见诸其从小到大成长的全过程。

这种献身行为在那时的中国被看作是“政治积极”。本书将探讨下列问题：如何以及为什么一些中国城市青年会成为充满热情的积极分子？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会有那么多人成为狂热的红卫兵？为什么这些红卫兵在同样保卫毛主席的旗帜下却分帮结派，互相攻斗？

此项研究还将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这第一代人进行一些探讨。当然也许其中的一些结论会引起读者的争议。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逐渐地，却又是顺理成章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这些年轻的访谈对象，在不同程度上都带有法兰克福学派称之为“权威人格”^{*}的某些性格特征。

可以进一步观察到，这些年轻人身上所共有的权威信仰和情感需求，与其说来自他们父母的影响，不如说是在学校里政治社会化的结果。在这些年青人中，谁对毛泽东主义的信条最努力奉行，谁就会被官方称作积极分子；和那些较少献身，也较少政治上成功的同学相比，他会发展成更高程度的权威人格。

当然，我并不是说，是学校当局或共产党领导有意识地把象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表现的狂热信仰这样的权威人格极端形式灌输到孩子们心中。党的教育工作者所做的只是竭力鼓励那种与毛主席的教导相一致的高标准的道德和守纪律

• 权威人格：崇拜权威并屈从权威，但与此同时又希望自己本身成为权威，而且要求别人屈从他自己。参见第五章。——译者注

的行为。不难看到，正是通过这套体系，这些教导很快就形成了影响：个人献身行为成了竞争的内容，对于政治正统的夸大需求被灌输到孩子们的心中，而对于被排斥对象的强烈歧视却受到了鼓励。我将提出证明，在六十年代城市中学里，“权威人格”已经成为这些毛主席的孩子们的居支配地位的社会性格，——在文化大革命中，正是它导致了毁灭性的后果。

还可以看到，那些曾经形成的性格特征，也并非就必然是持久固定的。作为文化大革命争斗后果的感情破灭，使这些同样年岁的成年人中出现了非政治社会化 (political desocialization) 现象。随着同辈集团约束的解体和其意识形态信仰直接导向怀疑，他们对权威社会角色的顺从也就消失了。

在拿出影响红卫兵一代政治社会化的材料之前，我并不想在权威人格及其影响这一题目上做过多的论述。本书的最后一章将把全部材料上升为理论上的考察，藉此读者将能够自己评定我的结论正确与否。

1、研究方法与实例调查

推动我进行此项研究的是1971年在香港我与一小群来自大陆的年轻人的几次短暂谈话。我自己是广东人，在中国海岸边的英国殖民地长大，来自广东的红卫兵和香港人之间的巨大差别震动了我。他们所操的广东话的语调与我们并没有多

大的差别，但他们讲话的内容，却使我们大惑不解。他们使用着与我们完全不同的辞汇，在这些辞汇背后有着不同的词义和内涵，以及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世界观。正是这使他们与我们有所区别，也就是这些不同之处，引起了我的兴趣。

1974年，我回到香港进行我的博士学位研究。通过我三年前认识的那几位前红卫兵，我和他们的朋友，以及他们朋友的朋友建立了联系。由于这些人是通过私人介绍认识的，当我们初次见面时，就出现了互相试探的现象。他们在考虑我是谁？我研究的领域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我想要认识他们？同样，我也想知道他们是谁？他们的背景怎样？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有何作为？以及他们现在的情况。我开始与他们频繁接触，有时是一对一的，有时是许多人在一起。逐渐地，或单独，或三三两两，他们中大部分人开始非正式地跟我学英语。通过这种私人教授的方式，十四人中有十一人，我与之进行了深入的谈话。我喜欢这种安排，因为这能够使我心安理得地要求和他们进行正式的、广泛的交谈，并且不至于使他们陷入“付钱的谈话者”那样的窘境。在他们那一方，他们也欢喜有一两个朋友可以吐露心曲。有几位还急切地谈到了更多的内容，诸如他们个人生活经历以外的事，以及他们最了解的关于中国的情况等。到1976年访谈结束时，他们之中有好几位已经成了我最好的朋友。

对于十四个人中的每一位，我主要运用开放性问题的提问方式，与他们进行了广泛的交谈。我鼓励我的访谈对象离题去讲他们自己的生活轶事和自己的话题。每一次谈话大约持续二到三小时，平均与每一位访谈对象都有八到十次谈

话。所有这些都录了音，逐字逐句地从广东话译成英语，并且誊抄下来。

此外更多的时间是在饭馆、他们的家和我的家中渡过的。聊天、扯东拉西，或者讨论问题。这样做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尽管在谈话中当他们暴露内心情感时有些不安和窘迫，但我们之间的亲密程度减轻了这种困难。有时他们的文饰很容易看出，我可以通过他们的性格了解其内容；而且，事实上，对于一些特殊事情他们所表现出的窘态和反感反而为我的分析提供了更多的素材。

这些年轻人中大多数碰巧在两个方面具有共同性。其一，他们中大多数都有由官方确认的相似的阶级成份。此阶级成份指的是其家庭中的户主在1949年解放前所占有的社会地位。这些情况保存在政府档案内，后代的成份根据父亲的传递来确定。根据官方的说法，出身好的人（解放前是工人、农民或共产党员）理所当然会带有更革命的态度，而那些阶级背景不好的人（出身于解放前的资本家、地主、富农或国民党家庭）一般都带有不可靠的政治态度。他们相信这种态度是可以传递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老子传递到儿子身上。

对我的访谈对象们来说，阶级成份的划定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由于政治身份的确定表明了新政府对他们的看法，所以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他们在学校中的地位以及提高地位的机会。而且，它还影响着青年人对自身的看法。

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人被划归到小资产阶级里，即一般

成份，这包括解放前的文人学士家庭和小商小贩家庭。在我的访谈对象中，大部分都属于小资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出身。这意味着他们的父母在解放前属于象西方的“白领工人”那样的社会集团，它包括从专家到教师、职员的各类专门人才。

这些家庭的政治身份并不明确。写于1926年的毛泽东的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曾经把小资产阶级称为潜在的革命力量，可以分为右派、中派和左派。

“小资产阶级的三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

以此为据，革命后小资产阶级被认作是动摇分子，或者是支持革命的左派，或者是一定时间内隐藏在无产阶级阵营中的右派。这样，小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就如同被设了陷阱。1950年以后，他们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尴尬的位置上，忽而是可以信赖的，忽而又不可信赖。如同其父母一样，在学校里他们的孩子也是走在钢丝上。

事实上，绝大部分我的访谈对象的父母都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中派或左派。四十年代他们支持共产党，反对腐败无能的国民党。他们也是爱国的，事实上，尽管在刚解放时他们是能够自由地离开广东去香港的，但他们中的不少人是经过

选择后而留在大陆的。看到数十年战乱后满目疮痍的祖国，他们是准备献身于国家建设，尤其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因为他们确信中国需要他们的专门技术和教育。在以后各章可以看到，正是这一点通过非常特殊的方式影响了他们子女的态度。

前面讲了我的访谈对象的第一个共同点是具有相同的中产阶级背景，那么第二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充当的角色。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投入到这场剧变之中，而且其中有两位还是广东的初中红卫兵领袖。正是他们作为红卫兵的积极性与态度，使我发现了在政治积极性与权威人格之间的关系。

我所感兴趣的是他们在中国成长的一般状态，作为青少年，这些年轻人曾经有着坚定的信仰。读者自己将会很快发现，他们是如何献身的，事实上，这种献身也就是对党的信条的献身。无疑，正是这种献身精神的强烈性，以及对于任何异端信仰的顽固排斥，构成了此项研究的主题。

我的访谈调查实例的选择仍然带有强烈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已经看到，它只集中于同一类型阶级身份的青年。但是，如果在分析中注意到了这一点，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也未必就会使研究和结论失败。通过访谈对象的集体回忆，有可能得到一个对于城市中等阶层年轻人状况的看法。我相信，通过这一集团的周围环境，我们能够对于中国社会整体作出某种系统的概括。例如，肯尼斯·肯尼斯顿（Kenneth Keniston）的《年轻的激进主义者，对美国青年的几点说明》一书就表现了与其主题并列的六十年代

美国的非裔青年。又例如奥斯卡·列维斯(Oscar Lewis)的《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书，它把目光集中于贫民区的生活，但在叙述之中也告诉我们了一些关于贫困，关于墨西哥的更概括的东西。同样，本书也将为您提供对于中国其他类型青年的更深入的理解。

2、政治积极性——积极分子

此项研究的对象是年轻的积极分子，也就是说，是对那些积极献身的人的研究。应当指出，“积极分子”这个词只有放到中国政治系统的环境中才能理解。

真正的积极分子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党的教导的笃信者。这些教导被认为能为他们提供一种依托，一个终极的目标。其信念的中心部分是这样的：通过在大众中对这种信仰的广泛传布，中国能够重建一个繁荣的和政治上纯洁的社会。积极分子的热情可以做为鼓动群众的催化剂，他们被看作是在掌握真理的上层和真理推行对象的大众之间的一个重要桥梁。他们不仅在运动中要起到发动和组织群众参与的作用，就是在平时，也要致力于“发掘”群众的热情。

与列宁主义信仰一致，他们认为只有有纪律的组织才能推动历史前进。也只有通过组织成员的积极行动，其贡献才是真实有效的。这样，积极分子就被吸收到共产党中，如果他太年轻，那么就由共青团接纳他。为了换得成为真正的“革命先锋”的机会，他们能够毫不动摇地服从组织的需要。作为

组织成员，他们的责任加强了，但却可以从中获得感情上的慰藉和依托。

当问到这些以前的积极分子关于积极性以及积极分子组织时，他们经常提到“光荣”这个词。这个词本身就暗示出其既表示精神上的成就，也意味着个人的声望。这就是问题的两难之处。积极性可以带来社会地位和局部的名望，而且甚至有时还能带来个人提升的机会和物质上的利益。毫无疑问，后者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虔诚的积极分子所企望获得的。他们要坚持不懈，反反复复地锻炼自己，以与一己之私欲进行斗争。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完整地保持自己的正义和献身精神，并且使自己成为普通群众的榜样。

问题就在于，一个成功的积极分子所获得的种种好处，对那些有野心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诱惑。他们追着潮流，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表现出积极、献身的样子。这样的人，也就是那些不具有真正积极分子信念的人被称为“假积极”。有些中国人认为他们所认识的大多数积极分子事实上都是骗人的投机分子。当时中国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正是这种现象的反映。由于获得了可观的报酬，那些“真积极”的积极分子所面临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才能表明他所公开表现的对于积极分子行为准则的献身，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做样子给人看的。

在我的十四位访谈对象中，有十一人声称在他们生活中的某一阶段曾经真正地按照对积极分子的要求去做过。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十一人中有八人，从来也没有成功地获得过任何好处或权力。在本书中，这几位访谈对象可以划

到“未被承认的积极分子”(unrecognized activists)之列。与此相对照，那些在少年时就被认为适于作领导，并且获得了领导权力的积极分子则可以称之为“担任职务的积极分子”(official activists)。在小学，这些积极分子是学生干部，在中学是共青团员，成年人则是共产党员。在我的访谈对象中，有三位声称在少年时代曾经是“担任职务的积极分子”。

无疑，走上积极分子道路的各种人并非都是一个模式。他们为不同的需要所驱使，其倾向性也相应地各异。从这一点出发，我从我的十一位有积极分子倾向的访谈对象中选出四位来做特殊的描述。我之所以选出这四位，是因为他们的个性差异最突出，其积极性表现的模式也各有不同。尤其重要的是，这四个积极分子对于权威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取向。既然以后我们将要讨论在积极性与权威主义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我尤其想考察一下这些年轻人在其积极分子角色影响下对于权威的不同态度取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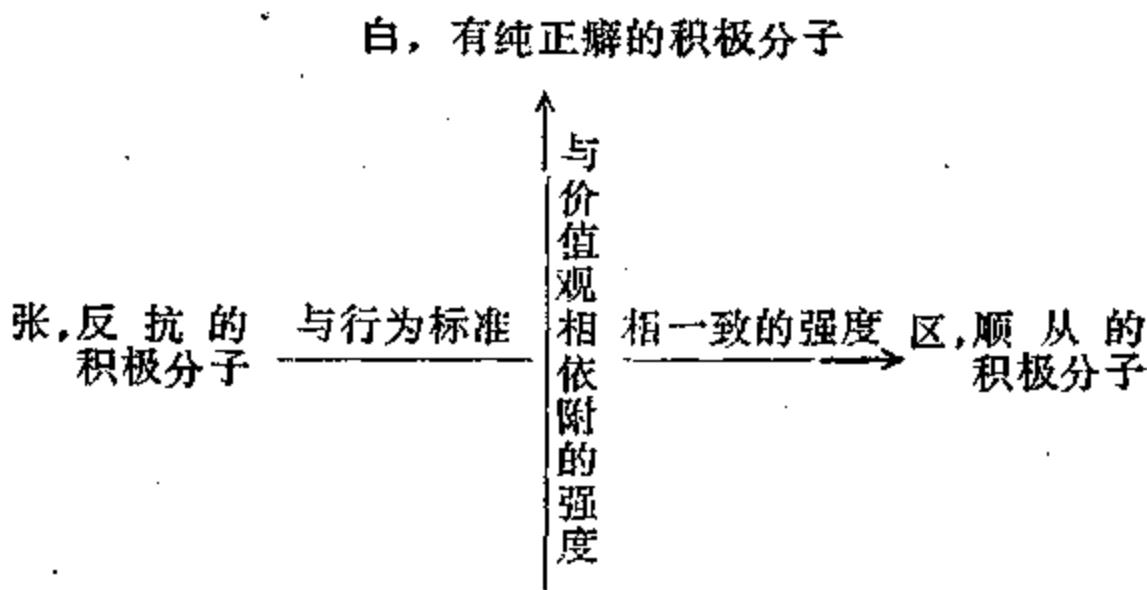
我所选择的四个访谈对象是：区、白、张和邓。他们在积极分子的不同倾向类型上的区别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他们中每一位都代表了一种纯粹的固定类型。为了便于直观，我将冒昧地为他们贴上可以记录的标签。区是一个“顺从的积极分子”(conforming activist)。她委身于那一套价值观，她的先入为主的倾向是忠实地履行普遍的行为标准。她毫不动摇地站在权威一边，极为忠诚，毫无异见。白是一个“有纯正癖的积极分子”(purist activist)，他按照对一个积极分子所要求的行为标准去做，但他对那一套价值观的掌握

却是宗教式的，他激情勃发，以至于迫及于人，他无法忍受普通积极分子身上带有的人类弱点。他全身心地投入，毫无妥协地坚持其理想。有一种更高信念支配着他，如果他确信有人违备了那一套价值观时，即使是权威人物，他也能无所顾忌地进行批评。张是一个“反抗的积极分子”(rebellious activist)，那一套价值观已经内化于他的心中，但他却反抗权威，并且反对那些权威所强加的行为准则。他拒绝承认把是否服从官方的行为标准作为评价积极性的公正尺度。邓是一个“讲求实用的积极分子”，他忠于积极分子的行为准则，并且接受了那一套价值观，但在感情上的投入却少于区、白和张。在观察他的行为准则时我们看到，在保持他的努力并不违背其自我利益这一点上，他是四人中最仔细的一个。

我对这四个积极分子的描述并非要提出一个对于可能存在的积极分子的类型的定论性的划分。进一步讲，在他们成长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并没有人始终与这些大为简略的描述相一致。只不过通过对于他们与一套价值观的关系以及其行为模式的总结，我们可以确认这些积极分子行为的不同类型。

以上我们所提出的这四位积极分子的不同特性可以略示为下图：





邓, 讲求实用的积极分子

对于上图这两种关于真诚的积极分子的衡量尺度, 只有对于积极分子行为标准的相符程度可以通过其外部行为观察得到, 而其内心的信念却难于准确测量。这一点并不奇怪, 热情的、顺从的积极分子区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选作“正式的积极分子”, 担任了职务, 同样毫不奇怪的是, 反抗的积极分子张一直停留在“未被承认的积极分子”队伍中。有些偶然的则是我们例子中的另一位, 邓, 他只是在他中学的最后一个月才被吸收加入共青团, 在此之前, 他一直和张一样是一个“未被承认的积极分子”。可是, 白, 象区一样, 在中学里就当上了共青团干部。通过选择区、白、张和邓作为个案研究,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成对的例子来研究“担任职务”的和“未被承认”的积极分子的不同的角色和环境。这些不同性是有重要探索意义的, 我们将可以看到, 因受到不同地位的影响, 他们的行为有很大的差异。

我所感兴趣的并不是成熟的积极分子的特征或积极性,

而是，这样四个非常不同情况的孩子是如何成为不同类型的积极分子的。这四个个案研究还将相应为我们提供一个机会来做一些细节上的讨论，并且，通过不同的角度，来讨论中国政治社会化系统是如何构成的。这四个孩子的故事将为我们展示这一系统为了自身的需要是如何制造出那种紧张气氛，以及受其支配的年轻人所面临的困境，它还将为我们展示这些压力和年轻人的困惑对他们自身性格的影响。

在本书每一章的第一部分，我将对所有城市青年在成长的各个阶段所面临的政治社会化的机制进行分析。在每一章的第二部分，我将通过这四个青年的具体例子，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描述五十年代的小学，六十年代早、中期的中学，1966—1968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及他们后来的醒悟。

第二章 小学的政治教育与性格构成

“我加入少先队是在1955年6月1日，这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来到消防队大楼举行仪式。我的心跳个不停。仪式很圣大，很庄严，学校里所有的少先队员都去了。由少先队员组成的鼓号队击着鼓，在鼓声和少先队队歌声中，老少先队员为我们戴上红领巾。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动感情的一次，我把这当作我的政治生活的开始。我还宣了誓，誓词中最重要的就是“时刻准备着”和“奋斗终生”，这几句话是必须要记住的。但在那个时刻，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早已铭刻在我心中。当然了，说实话，那会儿连共产主义是什么我们都都不知道。”

白的谈话，1976年，香港

就象白在这里表述的，小学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尽最大的力量灌输给学生对于党的依恋感情。对于学校系统的行政人员来说，要在五十年代取得这件事情的成功显然是困难重重的。1949年中国城市“解放”时，绝大多数教师还没有把

自己的教育工作和党的目标结合起来，而且正相反，他们是在“小资产阶级”师范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如果他们曾经受过培养的话）。党的教育工作者所要做的不仅仅是重新组织课堂讲授的内容，与此同时，他们还需要训练一大批新的教师队伍，以实现党所许诺的大众基础教育。这项任务的范围可以通过以下数字看到：根据1950年的统计数字，当时中国有2900万小学学生，但到了这个年代末的1959年，小学生人数已增加到9000万人。

这么短时间内小学生人数增加了三倍，政府意识到不可能期望由农村教师提供的教育有严格的管理。于是由此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中国教育系统的分化，国家只集中精力致力于改变城市教师的思想和工作。这种努力在五十年代的教育杂志上有所反映。

3、党的教育与杜威主义

学校系统所要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具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特征。一方面，是自觉的忘我，对集体的服从；而另一方面，却是主动、果断与创新。教师的工作就是使孩子们毫无冲突地适应这两种相反的要求，并形成其信仰。

和苏联的儿童心理学观点一致，中国的教育杂志强调儿童性格单一，需要重视和“培养”。传统教育方法所广泛采用的体罚和斥责被完全禁止了。体罚被认为窒息创造力并会引起孩子的憎恨和不讲道理。由于恐惧惩罚而表现的被动顺

服被认为仅仅是表面上的顺从。

新的教育方法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观点，指出，学习应当从孩子们对周围环境的观察和接触开始。因为根据人的本性是可以塑造的这一前提，儿童被认为充满着需要正确引导以使其发展的潜力。

可是，初看之下，当局对于儿童创造力的看法还是有自相矛盾的地方，这一点可以通过政府尽力根除杜威理论影响的努力看到，对于教育来源，尽管中国的大众思想还停留在孔夫子的概念上，只有约翰·杜威，美国著名的自由教育家，他的哲学在中国的非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得到很大的普及。在五十年代中国的教育杂志上，杜威的观点受到了经常性的逐字逐句的批评。

中国人（还有中国人的先生，苏联）所采用的许多教育学概念与杜氏教育哲学有一致之处。例如，无论是杜威的还是共产党教育工作者的教育学著作，都把矛头直接指向那些窒息儿童个体发展的传统教育实践。按照杜威的说法，应当赋予儿童实行自我启蒙的责任和机会，学习是一个主动过程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别人的经验。死记硬背被认为是学习中的敌人。杜威相信，儿童通过自己主动实践学到的东西可以鼓励他们做事的热情。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概念表现出某些一致的地方。

杜威还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儿童自愿地坚持某种价值观，与此相对的过份顺从不过是出于对权威的恐惧。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杜威也相信，教育应当致力于促进与社会目标相一致的个性发展。杜威和党的教育工作者都声

称，教育者绝不能把学生的智力作为评级分类的标准。但是，除了这些广泛领域的一致性以外，观点上的分歧还是存在的。尽管这两种教育学派别都致力于对儿童潜力的培养，但杜威的教育思想却与党的“社会主义新人”概念的第二部分有所冲突。这部分的内容是：面对集体的需要，自觉地牺牲自我。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中国也批评了杜威的“通过做来学”的观点。杜威的实践理论提出应当叫儿童最大限度地开始从他或她的环境中获得知识，成人的指导应当是有限的。儿童被鼓励在课堂上自由活动，每一项学习都通过他或她自己的方式进行。应当鼓励儿童去发现符合自己天性的兴趣和发展道路。杜威相信，儿童经过在没有成人的过多干扰下独立地动手做一些事，通过自己无意识的正确感觉和正确动作，有可能发展一种对于其动作后果和有关基本道德概念的正确理解。

对于中国教育当局来说，这种教育理论是不能容忍的。当他们提到儿童的“实践”时，指的是一种活动，而这种活动的目的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它还带有实用性。例如，通过孩子们在生产线上的劳动可以帮助学校赚钱。更重要的是，党的教育工作者把杜威的关于孩子们可以在课堂上自由活动、通过个体方式学习知识的这种作法看成是不能忍受的混乱。他们相信，在系统传授知识，尤其是道德和政治价值的过程中，成人的权威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角色。他们确信，儿童的学习必须从权威给定的“正确概念”开始，他们必须学会对权威的顺从。这种训练应当在早期开始，保育院的孩子们就

应当学会抑制自己的想法和意愿，按照给定的方法去做。小学生则被教给如何控制与约束自己的行动并每天对这种控制与约束的好坏进行反省。杜威的观点被认为是对这种必不可少的自我约束的破坏。

创新是受到鼓励的，——但这也仅仅是在规划好了的界限之内。这一点可以通过教育当局对于孩子们的美术课的看法得到说明。1952年，有两本小学美术课本受到批判，理由是允许孩子们在绘画中有太多的自发性和随意性，这被认为是削弱了教师的指导作用。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美术课上，教师画什么，学生就画什么，毫无变化。一直到现在，美术课仍然还用这种方法教授。

简言之，美术课上学生自发的表现没有受到任何鼓励。在西方的小学校里，孩子们的色彩缤纷的美术作品自豪地展现在教室的墙壁上，这正是孩子们内心世界与个性的自发表现，这种情形在中国的小学里是看不到的。不仅仅是作为自我表现的艺术在中国得不到认可，这种单调乏味的教学方法本身似乎还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于中国的教育工作者来说，与其说学习应当出于兴趣，例不如说应当出于责任。教育的各种目标可以在教室里着重装饰的一角——黑板报——上看到，那上面钉着按照传统方式写出的范文，有一些精心复制的画面，再就是这一段时间内学校所进行的政治运动的特殊宣传。

中国的教育实践与杜威主义截然不同，进一步讲，这种不同尤其表现在诱导学生的方法上。杜威一直反对在学生中使用竞争手段来刺激学习。与此正相反，在中国的教育系统

中，孩子们之间的激烈竞争却受到推动，这种竞争不仅仅是在文化学习上，更多的则是在政治品行的表现上。孩子们被吸引参加少年先锋队，但这意味着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候选人竞争也包括少先队干部和共青团员，这是积分子中最积极的。

4、政治教育的组织

要求孩子们通过竞争来表明他们坚持了正确的价值观在很小年纪就开始了。所有的儿童读物都充满了带有道德说教的故事。一旦孩子们学会了阅读，老师就要教给他们遵守道德的或政治的教训。为了让学生更加牢固地掌握政治课的内容，学校为高度组织化的积分子们创造了一个范围广大的活动领域，儿童的政治积极性正是根据参加这些活动的热情来检验。

每个星期至少要组织一次两小时的少先队活动，或者组织兴趣小组，或者为学校义务劳动，或者做歌舞演出。为了训练孩子们的社会自觉性，他们被组织起来到老年人家里去做家务劳动，或者为国家植树。邻居的孩子们则组成小分队，节日期间去慰问军属。他们还到大街上阻止人们随地吐痰。

加入到这些少先队积极分子中来看起来是一种殊荣，而不是做这些劳动本身。因为少先队被描述为一种政治上的先进分子组织。为了保持住这一形象，当三年级孩子们有资格加入组织时，所吸收的少先队员也只限于那些表现最好、热

情最高、和学业最出色的孩子。这样，大批新的、表现好的孩子就充实到组织中来。到了四年级末如果还在组织之外，那就是一件很难堪的事了。胸前没有红领巾会使一个孩子象一个被遗弃了的罪人一样。这一点需要强调，到了小学的最后几年，入队的决定权已下放到孩子们手中，加入组织必须经过班上全体少先队员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我们看到，学校系统就是这样清醒地利用同辈集团压力来奖赏顺从行为和对表现不好的学生施以惩罚。

为了增强纪律性，积极分子通常被编成严密的组织单位。每一个班是一个中队，由学生担任中队长和副中队长，在少先队中队内，按照教室里座次的安排又分成若干小队。

小队最重要的作用是为孩子们学会进行小组讨论提供一个场所，这种小组讨论是在每周学校范围的政治报告之后进行的。在这些小组中，每组大约有12个左右学生，每个孩子轮流发言，讲述他或她的观点，但这所谓“观点”；不过就是那些早已被教会的大话。通过小组讨论，孩子们可以学会什么是他们应该持有的正确观点和态度，以及如何最好地把它表达出来。如果在讨论中出了岔子，有谁把从家里学到的非正统观点说了出来，就会受到小组里其它孩子的批评。

教师们可以利用这种小组会来暗示哪些调皮学生有不规矩的行为（一般不公开点名，以免使孩子丢丑太大）。表现好的学生接受老师的暗示，每个人轮流发表看法，说出诸如“毛主席说我们应该帮助同学，为什么这里有人和我们不一致”这样的话。在小学里，年轻的积极分子仍然还是跟着老师的步子走。如果没有老师在场或者经过老师的鼓动，他们

往往对于批评别的同学这件事不知如何做才好。但是，到了高中阶段，这种小组会就往往没有老师到场了，比较积极的学生差不多已经完全代替了老师的角色，他们对落后的同辈施加压力使之顺从于规定的行为标准。

在小学校的班级里，建立了不止一种学生组织，就象一只手套的几个手指一样，它们结合在一起发生作用。这些学生组织提供了多种手段，通过这些手段，同辈集团可以成为他们自身政治社会化的推动者和监督者。例如，与少先队并列的还有班委会，由六到七个班干部组成，他们分别负责劳动、学习、娱乐等。在班委会之下，座位前后相接的一列学生成小组，小组长负责这一排学生的日常活动，这些活动包括早上的队列和学习小组。在每一个班里，差不多都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担任这种或那种组织的组织者或领导。通过这种方法，孩子们从小就学会如何充任两种角色：领导者和服从者。通过很复杂的渠道他们学会做到一方面是接受命令的一员，另一方面又自己发布命令。

这种严密组织化的积极分子系统效果突出。大量学生按照对他们要求的观点和行为模式行动。但是，学校系统的巨大成功却使教育者陷入困境。中国的教育理论无助于发展学生的创造力和自我动机行为，而是把对集体和权威的铁的纪律与竞争化的顺从行为作为教育系统的主要目标。了解到他们教育计划中这种相抵触的一面，党的教育工作者决定，在中国最年轻的一代人中要有一批人在创造力和独立性方面加以特殊培养，以“避免课堂教学的限制。”因此，他们就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一小批按照苏联模式特别精心设计的少年宫

上。一些没收来的公寓被改建成少年宫，挑选来的孩子可以在课后参加自己感兴趣的各种小组活动。就是在这里，“杜威主义”得到了运用。

有一篇关于少年宫的文章指出了少年宫的目标：

“儿童的求知欲很高，但兴趣并不相同，如只依靠课堂教学是不能满足的，而少年宫却协助学校满足了儿童的要求。……使他们从感觉到今天是少年宫的主人，发展为对国家、社会的主人翁思想；使他们从独立地、创造性地开展各项活动中，形成他们独立地获取知识，和认识世界以及独立地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这项计划的进行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那些从各学校选来参加的孩子——就是那些曾做过少先队领导和被认为是虔诚的少年积极分子的孩子——他们行为的服从与态度的顺从差不多已经趋于定性。少年宫的指导教师很沮丧地发现，这些选来的孩子对于目的在于发展他们创造力的安排，无论是制定自己的计划还是加入小组活动，都显得没有热情。与此正相反，有一小部分并不是学校推荐，而是自己要求来的孩子，反而显出更大的兴趣。而且对他们，计划也更容易进行。

学校当局抱以期望的年轻一代中的精华在接受自我表现和独立主动性的挑战时显出很不适应。这也就是“列宁主义”教育学的矛盾之所在：学校当局既要求孩子们驯服于权威，却同时又要求他们保留一些创造力和主动性。由于这一

系统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对顺从的需要安排的，所以创造力就被窒息了。我的所有访谈对象都在某种程度上经历过这种冲突，只是有的意识到了，有的却意识到得比较少。下面的四个个案研究将揭示这一困境。

5、区：顺从的儿童积极分子

区，三十四、五岁的样子，是一位很标致的女士。没有念过很多的书，但人很聪明。初中毕业以后，作为“可以教育好的青年。”她在农村过了十年的农民生活。由于这种生活经历，我的绝大多数访谈对象文革动乱中在大街上所经历的心灵上的冲击在她身上表现不多。她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兴趣和掌握都很少。她有一种惊人的能力，对于当时中国的那些文件、社论、标语、口号，既能在心中接受和记忆，又能逐字逐句地复述出来。作为农村里的土干部，她的职责就是把这些口号转述给农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她的语言技巧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发展，并形成了她自己独特的语言习惯。

作为访谈对象，她是妙不可言的。在我的访谈对象的叙述中，受到现在的感情与理解的影响，总有某种程度的失真，而在这一点上，她的“失真”是最少的。讲她的故事时，她能够活灵活现地将人带回到她生活过的每一件事情中去。这倒不是因为她特别擅长讲故事，而是其它方面的原因起了更大的作用。这原因就是她常无意识地把自己从现在分离出

来，而生活在过去的某一时刻，就好象她正在重新体验她那还没有完全耗尽的感情。例如，在讲她的故事时，她如此地沉醉于她的兴奋之中，以至于突然之间她的语调也变得和北京的广播一样了，同样高的调门，声音急促、庄重、有力，而且雄心勃勃。我确信她之所以会自然而然地变成这样，只是由于她对广播所宣传的价值观深信不疑而完全内化的结果。

谈到她自己时，她同样也难得完全敞开心扉。她讲到了她的一些难以启齿的计划，讲到她对权力的追求，以及讲到因为诚实导致失败时她的震惊。这种自我谴责的主动性，看来似乎是她因追求作一个优秀共青团员而养成的习惯。通过她，我们有可能对那些成功地从积极分子角色需求中摆脱出来的青年人的内心状态获得一种难得的体验。

区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里六个孩子中最年长的一个。她按官方划定的阶级背景成份是“知识分子”，因为她的父亲是一位医生。在政治上，他的父亲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但在思想上却是一个传统主义者。是做父亲的让他们背唐诗和中医处方；还是他，甚至在上小学以前就让他们每天练习中国书法和绘画。“我们背了又背。他总跟我们讲我们在香港的堂兄是如何的好，要求我们象他一样。我们一定要拿到博士学位，成为教授或工程师——这是上等人的标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国家做出贡献。我的父母觉得接受教育是一生中的关键。只有接受了教育，才能更好地做事，才能帮助别人和帮助自己。”在这种父母期望的影响下，区在很小年纪就抱定了学业有成是“光荣的”这种概念。“甚至还是一個小姑娘时，我就想出类拔萃，受教育，争第一。”

这种在教育上成功的愿望持续影响及她整个在校阶段，甚至一直到她的成年这种想法也没有改变。在香港，尽管经济拮据，区还是为学位而奋斗，白天在大学里念书，晚上去听中医课。她的例子不是唯一的。所有我的十四位访谈对象都是在这种成就取向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而且，在香港，尽管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已三十出头，但如果经济上能允许，还是希望能接受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倒不是觉得有必要获得一种资历，而是要实现他们这么多年没有实现的梦想。

区的父亲并不是马列主义者，但区提到他时说：“他倾向社会主义，不喜欢香港。”七十年代中叶当区决定离开大陆时，遭到父亲的反对，倒不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做有危险，而是因为他认为“那种社会（香港）是毫不足取的，是人吃人的社会。解放后我回到大陆来，就是因为不喜欢那样的社会。”

七岁的时候，区进了小学，学校座落在她居住和他父亲做医生的厂区里。她知道，和周围的小学校比，她的学校是最好的，但更好的学校是在城里。甚至还在一年级的时候，她就渴望做得好以便日后能进入一个最好的中学。

在五十年代，并不象文化大革命以后的那段时间，中国的学校系统一直强化这种精神。无论是从国家政策还是从小学自身利益出发都鼓励小学生努力学习，以便能在初中入学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这是学生未来的需要，同时也可以提高小学校的名声。无论家庭还是学校就都鼓励驯服，对老师和当局的尊崇，诚实、俭朴、关心别人、谦逊、自我约束、讲卫生、忍受艰苦，以及强烈的爱国心。

她的父母没有教她，而是经她的老师强调的是“热爱毛主席”、“忠于党”，以及“向革命先烈学习”这样的思想。除此之外，尽管她的中产阶级父母本身对党没有什么感情依恋，但说他们在子女面前对这种教育提出怀疑是没有理由的。他们知道，他们的子女出生在一个与他们自己成长起来的社会迥然不同的政治系统中，而且他们认为他们的子女能够把新的政治价值铭刻于心是最好不过的事。在我的访谈对象中，有两个家庭的的确确想要对他们的子女强化这种价值观。事实上，通过许多个案都可以看到，甚至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受到当局政治上不公正的待遇，他们也没在子女面前吐露一丝一毫对政府的不满。只有一位访谈对象，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因为偷听了家里大人的谈话，接受了一种与国家规定相反的态度。这种观点他掌握得太多了，以至于有一次在班上，他开玩笑式地表示了和那种经由老师反复宣讲而趋于统一的关于党和革命的确定观点的相反意见。

学校的课程是与“阶级阵线”保持一致的，这是政府有意提高工人、农民、下层这些以前先进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政策。小学课本中充满了对于工人农民的颂扬之辞，孩子们被教给“农民伯伯和工人叔叔创造了世界”这样的观点。孩子们应该向工农学习，学他们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对社会的巨大贡献，还要牢记解放前他们受到的非人的待遇。

可是，当孩子们在学校组织下来到农村时，他们被农民的“落后”和不讲卫生惊呆了。有一个访谈对象说，写作文

时她会毫不迟疑地写出“长大后我要当一名工人或农民”这样的句子。但她知道，“我从来也没有真正地想过是不是我想做一名工人或农民”。她真正的理想是做一名舞蹈演员。对于工人农民的赞扬丝毫也没有减少她对她父亲的职业——中学教师的尊敬。实际上，就是学校也在教给他们“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样的思想。与此相似，区想做一名医生，文艺批评家，或者作家。事实上，我的所有访谈对象所想往的未来不是大科学家，就是某种专家。

工农受到赞美，但中产阶级父母们并没有觉得自身地位受到威胁，他们更没有改变对自己子女的期望。在五十年代，家庭社会化与国家社会化所鼓励的价值观是相同的，而且这两者是互相强化的。中等阶层家庭环境里长大的孩子在他们成长期里只知道唯一的一种价值系统。没有一种可以阻止他们受积极性吸引的相反的价值观存在。

有必要把积极性与野心和自负的程度联系起来考虑。这种野心与自负是从少年期形成的自信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的。在我的访谈对象中，差不多每一个成为积极分子的人在少年时期都有过值得骄傲的经历，有的成绩突出，有的聪明过人，有的是男孩子中最棒的运动员，有的则是女孩子队中的小美人。区也是如此，进入一年级不久，她就已经清楚她是班上最出色的。

我的水平比班上其它同学高得多。糟糕的是我不能跳级，我记得老师都很懒。他们总叫我指导别的同学，甚至所有学生作业都叫来批改。我是骄傲的，这使我以后作事

时遇到许多麻烦。我被惯坏了，总是有一种优越感。

不仅学业优秀，她的能力是多方面的：

我是尖子、高材生，很有名气，……通常学习好的学生都是书呆子、骄小姐，难免体育上不行。我不是这样，我什么都行，我象是个猴子，擅长运动，擅长唱歌，擅长算术，擅长随便什么。我的作文经常钉在墙报上。

另外，她还得益于她是一个招人喜欢的小姑娘。（提到少年时魅力的，并不止区一个，还有好几位，甚至还有男孩，都带着一些骄傲提到这一点。）就因为这个，她得到成年人的偏爱，并且享受着她同辈的艳羡。

她是老师的宠儿。几年之内，她就被老师挑选为校级少先队队委。更体面的一件事是她多次被老师选为市级少先队积极分子，这在学校里是唯一的。她声称，她是厂区的名人。当申斥自己孩子时，母亲们总是拿她的聪明勤奋作样板，“你看人家区医生的女儿多聪明，可你就那么蠢！”应当指出，还是有一种东西削弱了她的自信心。在我的访谈对象中，没有人比她更懂得社会地位的意义。

区在小小年纪就对自己的社会地位那么敏感是有环境根源的。她和她的同学们是同一家工厂雇员的子女，工作和生活都在同一个厂区内，绝大多数都是“蓝领工人”的孩子，有一些，象区，属于中等阶层家庭，还有一些则是工厂里领导干部的子女。由于生活在一个居住区和工作单位连在一起

的封闭厂区內，彼此都知道谁是谁，住在那里，彼此的生活水平和父母职位也都显而易见，所以孩子们可以很容易地把每个不同家庭的地位加以类分。就象区所观察到的：

工人们的住处又小又脏，而领导们却住的很宽绰，至少比较起来如此。我家的住处比起来是中等的，家里总是干干净净。工人们的子女穿的很寒酸，很脏，下课后要回家烧火做饭，而且学习也很差。领导的子女穿的好，社交广泛，他们也更自负，觉得比其它孩子优越，而且老师对他们也更客气一些。他们只自己一起玩，是班里的貴族。

那么区如何呢？“我属于中等。但我的情况有点特殊，我的家庭对文化和教育更重视，这是一个特殊之处。”由于夹在地位差别极大的两类人之间，她的优越感和自卑感同时得到了发展，她看不起工人子弟，但又感到她的父亲不如那些领导和干部。如果不是在学业上成绩优越，她觉得她会被那些干部子弟看不起。事实上，使她能够与优越的干部子女比肩而立的学习成绩反而给她带来更大的刺激，她要通过自身的努力超出其它同学。

对区来说，每一次个人的成功，都是她自我意识的加强，也进一步唤起了她对名声和夸赞的追求；成功地巩固了她在老师眼中的确定地位，同时她要取悦于老师的心情也更迫切了。她逐渐具备了作一个模范学生的所有条件。

要做模范学生，区就得比那些好学生还出色。她还需要成功地成为一名积极分子。作为一个好学生，她是称职的，

她勤奋、顺从、安静、尊敬老师、严守校规，值日时扫地、擦黑板，从不偷懒。但是，要做一名积极分子，就要自己主动去做更多的事。当我问她怎样才能成为积极分子时，区以自己为例做了解释。

积极分子要为班里做一些事，例如，就象我做的那样。我学习好，但不象班上有些同学不关心落后同学，我帮助他们学习。这样，在我的学习小组里，学习差的同学成绩有所进步。劳动时我拼命干，在菜园干活怎么脏我也不在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发现班上有同学遇到困难，我就把它告诉老师。班上东西坏了，我帮着修。有一次我发现老师总是用手代替教鞭在黑板上指划，我就回到家里找出一些木棍，为学校里所有老师每人做了一条教鞭。那时候我的确是野心勃勃的。

区的积极表现的确成功地吸引了老师的注意。她被老师选作班上的各种干部职务，她被推到一个更高的位置上，甚至有些名不符实。区在很小年纪就成了一名“担任职务的积极分子”。

担任职务的积极分子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一架“桥梁”。每星期有两到三次，少先队的和班上的干部与老师一起讨论一周的活动，讨论的主题是班级讨论、班里发生的问题，甚至也有关于个别学生的情况。学生干部的职责是向老师“反映班级情况”。这样很自然地担任职务的积极分子就获得了一种特殊身份。由于能够直接与权威人士（老师）

对话，在学生眼中他们就获得一种仅次于老师的权威地位。

但是，由于他们的位置本身不可避免地要求学生干部对其属下学生采取一种家长方式管理，这就引起了其它学生的愤怒。干部的这种既是一名同学又与权威有特殊关系的双重角色，导致了冲突。在学生中间，发展出两个“集团”，一个由担任职务的积极分子组成，另一个则是大部分普通学生。我问一个访谈对象他怎么看积极分子，他回答：

噢，我觉得他们傲慢得很，他命令你上课时把手背到后面，等等。

问：“但那是他们的责任”。

答：“那会儿我们不管这套，那不关他们的事。”

在一些个案中，任何一位对学生干部表示哪怕最微少的依恋的人，都要受到普通学生们的惩罚。

面对权威和同辈集团这两者，一个学生干部需要小心翼翼地周旋于其间，通过弥合这一裂痕来化解矛盾。但是，这种平衡工作是难于奏效的。在中国的教室里面，学生干部和一般同学之间的那道巨大鸿沟几乎永远存在着。

区尽心尽力地按照对学生干部的要求去做，她极负责任，并且事无巨细地向老师汇报她的同学的每一件小的过失。天性所致，使她无法保持那种平衡感，所以她就完全摆向了作为老师的小助手的角色。逐渐，老师和校领导的表扬对她来说就变得更重要了，相比之下在同辈中的人缘反显得无足轻重。只是到了现在，她才悲叹于她朋友很少。那会儿她

所联系的只是“层次较高的孩子，只和程度高的在一起”。但是，就是在这些人中，她也找不出一个知近的朋友来。

还有一个访谈对象，象区一样是一个校级少先队干部，通过另一种方式摇摆得更厉害。他小心翼翼从不告班里同学的密，除非实在难以控制，他也从来不在老师不在时命令同学安静。“不管怎样，我不想把和其它孩子关系搞坏。通常，干部们受到同学们的抵制，但我却例外。我是干部，但我和别人相处的很好”。不仅如此，对担任职务的积极分子的那种起模范带头作用的要求对于他来说是一种不舒服的压力。这使他不能象一个孩子一样行事。“在学校我不得不把自己表现为其它孩子的楷模，但一旦我回到家里，我就使劲撒野，我需要放松。”“那你是怎样撒野的？”“我混在邻居的孩子之间，捉迷藏、打弹子、下棋”。如果这些活动被当成是“撒野”的话，那么就可以想象得出对学生积极分子的管束有多么紧，在学校里他们要表现得象成人一样的认真和严肃。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反映了这种情况，一个疏懒的、毫无野心的男孩，只是因为在职的学生干部太不得人心而被同学们选为班长。他惊讶地发现，在他被选上以后，他的朋友们就疏远他了。“事情就那么自然地发生了。你不得不和他们保持一段距离，他们也小心翼翼地和你保持距离”。他宁可恢复到一个普通学生的地位。“因为在那个位置，你的同学想做的事情你不能去做。”这就和区不一样了，这两个男孩子把同辈集团的一致性看得比积极分子的奖赏更重要。

年轻的、担任职务的积极分子的角色本身就是一个无法

解决的矛盾。孩子们接受的指导是，要做一个好干部，就需要谦逊，利他、关心班里同学的困难。但是，这一系统的运行却需要积极分子出头露面引人注目，成为公开指定的学习标兵，“被举上天。”所有这些只不过满足了象区这样的积极分子的虚荣心，刺激了他们出于个人自我利益的欲望，并鼓励了他们的骄傲自大，这一切正好与所期望的利他主义相反。从头至尾，区对同学的优越感以及她争“第一”的野心就一直与她做为少先队干部的使命相悖。她很难使自己象一个真正的积极分子一样友爱地对待同学。她只讨得了他们的敌意。在整个少年时代，区确确实实地意识到，尽管她有可能摆脱自己的狂妄自大，但这必须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否则是无法动摇的。“于是我就特别固执。有时我成功地对别人表现出极大的善意，但有时我还是对他们不好”。

出于保持她的模范积极分子地位的需要，区甚至采取了一些与一个真正的积极分子不相称的手段来保住她的权力和声名。由于人缘不好，班级选举使她大为焦虑，按规定班里的七位学生干部应该由全体学生民主选举。但在实际进行中，差不多总是由老师“指导”学生们选出她所垂青的人。经常是由老师提名，学生们举手表示通过。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学生们对老师的选择提出异议，坚持选出他们更喜欢的人。

区回忆说，“举行表决时，我仔细观察看谁没有投我的票，我恨他们，哼！哼！”为了保住她的权力，她建起了她的小集团。当她和她朋友圈中的“层次高的”朋友闹别扭时，她就突然对工人子女友好起来：

我是少数派，但我尽全力和他们（她以前的朋友）作对。这把他们气疯了。他们想把所有人都拉到他们一边，但我不会让 them 这么做，好几个人都被拉到我这一边来。我想我们是有四个人，其中三个是工人的孩子。我是这么做的，他们受人欺侮，所以来到我这边，我给他们好处，帮他们学习，对他们表现得象好朋友一样。我们几个人组成了一个小集团。我学习好，名气大，这样我能吸引一些孩子到我这边来。

尽管年龄还小，但她已经非常明显地意识到自己超出她的同辈之上。她的手段与成年干部把人抓在手里作为摆布对象的做法如出一辙。

到了五年级和六年级，尽管她本人还有她的老师都努力争取，但她的同学们还是坚决拒绝提名由她做班长。尽管如此，她还是一直担任着重要的校级少先队干部，因为这一位置的选择权在老师的手中。

按当时的标准来看，区是一个很红的积极分子，因为她如此严格地按照积极分子的行为标准去做，并且公认对于学校的干部老师如此忠诚。但是，如果不提她的信仰而只讲她顺从的动机，那就会觉得她是假积极。实际上并非如此。她的顺从行为伴随着对官方价值观的强烈的感情依附。我之所以说“强烈的”依附，是因为孩子们对于权威的最初概念似乎更多地来自影响而非认知。西方的情况表明，尽管西方的基础学校中政治社会化实施适度，但孩子们还是“在确实了

解政府是什么之前就学会了爱政府。”所以，中国政治社会化的情形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只不过比起西方来，中国更加强有力罢了。除了在一些少见的个案中，家庭政治社会化盖过了正规的国家政治社会化，就一般而言，官方的政治社会化还是能够引起强烈的、实实在在的反响的。

当问到他们在儿时对于小学里教给的政治价值和象征的态度时，我的所有访谈对象，尽管清一色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都证实了这一点，尽管他们并不完全知道党是什么，但他们还是爱它。他们恨国民党，恨蒋介石，恨美国人，也恨资本家和地主。现在他们承认，那会儿他们这么做只不过是出于一种模糊的，局外人的感觉，因为他们绝大多数人都从来也没有真正地遇见过那些“可怕的、丑恶的阶级敌人”。他们敬仰人民解放军，渴望有一天能照故事书中的英雄那样去做。他们明白等他们长大后要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分子，并且模模糊糊地懂得了他们要为国家和集体牺牲个人目标。他们都声称，他们满怀热情地参加了大跃进，并且对他们所成就的价值坚信不移。

作为孩子，除非受到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的蓄意冲击，他们不会做他想。这里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检验不同的孩子对于这些价值和信仰的掌握程度，并且想看一看象区这样的积极分子对于官方价值的内化是否要多于其他孩子。

少先队员的红领巾被赋予这么多的光荣，神奇与象征，以至于孩子们对于红领巾的态度分布就可以提供一种可靠的标记，我们看到，在对红领巾“绝不能马马虎虎”的训诫背后，隐藏的是态度的严肃与真诚。当我问区少先队员的红领巾是

不是有什么重要象征时，区带着差不多完全是孩子式的热诚，一口气作了回答：

它是红旗的一角，由先烈的鲜血染成。这就是我们如此珍爱它的原因。如果你把它弄脏了，他们会责骂你。不能把领巾戴反了，要是把它弄丢了，那就会挨无数次的批评。有一次我把领巾弄丢了，老师一次又一次地问我是怎么丢的，但我拒绝回答。我是倔强的，我对我自己说，我丢了红领巾，但那又怎么样呢？你不停地问我又是什么意思呢？为此老师罚我站，我站了好久。有好几个星期都不许我戴新的红领巾。喔，老师发这么大的火，她把我罚了这么久。我是个好学生，但因此就变坏了！我在学校办公室前哭了一次又一次。最后，在一次盛大的、令人难忘的仪式上，我又得到了一条红领巾。

区把红领巾看成是神圣的，就因此，她第一次准备不把权威放在眼里，但这也是她在小学里唯一的一次。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她确信她自己的悔恨心情本身已经对她的罪过施加了公正的惩罚，老师的做法太过分了。

到了小学的高年级，同学们，尤其是男孩子们，已经不把红领巾看得那么重要。它有可能被弄脏、揉皱、塞到口袋里。到了五、六年级，差不多所有孩子都入了队，这时候做一个少先队员看来已经没有太大的价值了。在一所学校里，作为高年级的标志，红领巾被弄得越旧越脏就越时髦。在许多男孩子眼中，红领巾不再是用先烈的鲜血染成的圣布，它

成为不情愿地服从于成人权威的标志。有几个访谈对象回忆说，那会儿他们都开始拒绝再戴红领巾。在一个访谈对象的班级里，同辈集团压力如此之强大，以至于如果不是老师和学生干部从中作梗，班上就几乎没有人再戴红领巾。在小学校里，让学生干部守在学校门口拦截那些没戴红领巾的学生，把名字记下来交给老师，这种现象并非不普遍。要是没有这种干扰，几乎没有可以使一些男孩子顺从。男孩子们不戴红领巾，原因是他们唯恐被人嘲笑为象总是戴着红领巾的女孩一样胆小。有一个访谈对象观察到，只是到了六年级，因为要进入一所好的中学必须要有老师的好评语，他和他的朋友们才减少公开的反抗。

简言之，并非所有的孩子都象区一样对少先队那么上心，她差不多是带着一种宗教虔诚信仰它的：

少先队是一个非常好的组织，这就是为什么谁都全心全意喜欢它的原因。喔！入队仪式是那么令人难忘，我甚至无法恰当地向你描述它。我曾经参加过少先队代表大会，这在你的一生中都很难忘。成年领导亲切地与少先队员谈话……那些日子是多么美妙！所有的组织——党、团、和少先队——都好极了。它们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都有一种巨大的战斗的力量。

有人会说，只是因为她作为少先队干部所享有的地位和声望才使她对少先队评价这么高。但是，通过她的言辞，甚至是现在的，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这种情形背后的

动机非仅如此，官方的价值和信仰深深地吸引着她，她对于权威和组织的信任是毫不动摇的。可以说，是她的地位和她的信仰互相强化，使她比一般孩子做得更为顺从。

到小学的最后两年，区遇到了两个新问题。一个是她的智力水平已经落后于班上一些更聪明的同学。尽管她的学习成绩依然在班里名列前茅，仍然能够藉此看轻班里绝大多数同学。但是，她的成绩只是凭借着下苦功夫和死记硬背才维持了原来的水平。“死记硬背”是当时中国的一个特定词汇，用来形容许多孩子采用的不理解的记忆方法。她承认，那些和她竞争的男孩子不费多少努力就达到了很高程度。而且如果他们花的时间再多一点，肯定会比她好。他们学代数新课比她快得多，只“因为他们是男孩子”，或者这只是对她而言。区的弱点在于缺乏探索精神，这正好与她的顺从倾向一致。由于她的努力靠的是单调的，甚至是强化的死记硬背，她开始连周末都牺牲掉，用在家里学习。

第二件使区苦恼的是她的毫无光彩的阶级成分。大一些以后，她越发对此感到自卑。阶级成分好的人的光荣使他羡慕。甚至在小学时，她在填表时总是毫不迟疑地写上他的两个叔叔和婶婶的名字，因为他们是干部和党员。她为她父亲出身不“红”而感到羞愧。到了六年级的最后一个月里，她甚至开始憎恶她的家庭，这是因为她把她没能被选作免试进入初中的人选的原因归咎于她的家庭背景的缘故。（不久证明是她错了，因为那一年这种对好学生的优惠被完全取消了。）她开始不理她的父母，并因为他们的阶级背景而看不起他们。

我之所以看不起他们，是因为与革命干部和工人们比起来，他们的思想太陈旧了。不管什么时候买东西，我父亲总要讨价还价，我恨他这样。小学五年级时，我还注意到他有时低三下四地向上级献媚。上初中时我没和父亲出去过一次；下农村以后（初中毕业以后），我也很少对他讲话。

在三个最重要的社会化的工具——家庭、同辈集团、学校或国家——中，区有效地摆脱了家庭和同辈集团，只单方面地接受着学校和国家当局的政治社会化。

6、白：有纯正癖的儿童积极分子

白是我们的担任职务的积极分子的第二位。他生于1941年，是我的访谈对象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他也是这些人中唯一一位喜欢作乡下人打扮的人。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已经到香港四个月了，但他仍然穿着一条肥大的裤子，上身是一件大出两号的制服，脚下一双黑色的中国布鞋。象这种不伦不类的装束，我的其它访谈对象是不敢冒险在香港大街上穿的。因为他的偏狭，他的笨拙，和他的落伍，他成为朋友圈内固定的嘲笑对象。但是，与他的外部表现相一致的是他的精神世界，从他的表现中我们能看到他深受“无产阶级”和纯正共产主义的影响，蔑视物质与世俗的传统。他一直迈着中国

农民式的八字步，——这是他在中国养成的走路习惯。

白笨拙的身相掩盖了他的背景。他是访谈对象中唯一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他智力敏捷，对马克思主义熟读精通。他阅历丰富，见多识广，这使他有能力把理论与国家和基层的政策联系起来。这种能力在我的其它访谈对象中是极其缺乏的。

离开中国以后，他对于政治的兴趣并没有熄灭。他继续参加、组织研究小组，对现代中国政治的发展进行分析，并为香港的杂志写文章，到后来，甚至他自己也编了一本杂志。与区不一样，他并不盲目崇拜正规教育，——毕竟他曾经是中国名牌大学的学生，——但他经常提到他的学习和自我约束，他怕自己堕落下去：“是的，你必须让自己过有规律的生活，让自己每天在规定的时间内读一定量的东西。不然的话，你就会变懒，那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了。”

在我的十四位访谈对象中，白的生活史是最令人感兴趣的。他所经历的各种奇遇差不多象小说一样。最出色的是，他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能烘托起每一种场面的气氛，讲述许多微小的细节。他记忆非凡，每一个具体的名字和时间都能详细说出，这一点他甚至超过了区。但是，在关于他自己或他的内心世界的描述上，他就不那么令人满意了。我想这是他那种积极分子类型性格的缘故。这一点以后我们还会讲到。

白的家乡在中国的北方，那里共产党、国民党和日本人都曾经统治过。白在家里排行第四，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他的父亲是一个超出观念意义的爱国者，参加过国民党和共

产党的抗日活动。他有一些土地，按照白的说法，在土改时他的家庭被划在富农和上中农之间。在谈话中，不等我发问，白就急切地告诉我，他的家庭没有剥削过任何人。他们只有过一个雇工，那也是给他几块地让他自己耕种。他的父亲和姐姐们都亲自下田耕作。尽管现在他已经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政治系统里，在这里家庭财富是骄傲的资本而不是罪恶的标记；但很清楚，他的维护家庭“纯洁性”的需要还是出于他仍然保持着的孩提时代的价值观。

当土改的浪潮席卷到他们的村庄时，同白家作对的另一家族控制了土改工作队（这一家族中有几个人很早就入了党），并利用土改的机会来摧毁日益扩大的白氏家族。白家设法逃到了南方。共产党赢得内战胜利时，白的一家正在广州，囊空如洗，忍饥挨饿。他们不得不求助于难民救济处，他父亲从那里得到一些钱可以摆一个小摊，两个最小的孩子也被送进了孤儿院。这就是为什么白的出身会是小商贩，以及为什么白并非孤儿却在孤儿院里长大的原因。现在他能够有条有理地叙述他的家庭史，但在他的整个童年时代，对此却只有一种断断续续的印象。他记得蹒跚学步时曾是他祖父的掌上明珠；记得白氏家族突然衰败下来时，他成年的叔叔们遭到沉重打击，号哭不止；他还记得他们的逃难；记得听说他祖父被人吊起来开膛破肚；记得他和他的姐姐们开始在街头游荡时他的种种感觉。他这种支离破碎的印象保持了许多年。一直到上初中，他父亲才觉得有必要对他讲述他们家庭的历史。在这以前的许多年中，他父亲一直都在避免向他灌输不满情绪。

在孤儿院时，白很少见他的父母，一般是几个月才见一次。这就是说，有六年的时间他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生活的。在这段时间内他逐渐长大，他的社会化几乎完全是由国家机构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时间以前白从他的家庭中接受了什么样的影响？尽管白的父亲只受过几年正规教育，但白所受到的家庭影响与区的相比并没有多大差别。从白的叙述看，他父亲有才能、肯钻研、懂道理、务实，工作努力，有经商头脑，并且还是一个深受儒家伦理观影响的正派人。

象区一样，白是一个招人喜欢的孩子。因为他聪明，更重要的因为他是家里最大的儿子，所以他得到父亲的垂青。对他父亲来说，女儿是不算数的。他对孩子极为严厉，要求他们品行端正，学业优良。五岁时，他已经会写字，并且还能在算盘上做乘除法。进孤儿院时，他对他的学习能力充满自信，而且那时候他已经具备了一些社会伦理观念。

孤儿院有自己的小学课程计划，因为他们是半工半读。孤儿们要自己负责一部分自己的费用，所以与普通小学不一样。他们每天劳动、上课各三小时。在这里政治教育与区所上的学校没有什么区别，但我们可以看到白在孤儿院封闭环境中与区在厂区中所形成的积极性的类型有何不同。

白在孤儿院六年，头三年是老师的混乱与学生的对抗，后三年则是老师的改良与学生的和谐。解放前孤儿院掌握在国民党手里，白进去时刚解放不久，生活还很艰苦。他的叙述是真实的。他们的食物很粗糙，由于老师是从国民党手中接过来的，对孤儿毫无怜悯之心，所以打人是家常便饭。孩

子中有百分之九十是孤儿，年龄大小不一，性格千差万别。从少年犯、乞丐、到象白这样“有教养”的孩子，什么样的都有。根据白的回忆：

吃饭时没有人缺席，但到上课时孩子们却翻过墙到外面去玩。老师很凶恶，二话不说就打人耳光。你知道，这些孩子中有一些早已习惯于在大街上自己谋生，而且年龄也已经不小了。他们很顽固 也很有力量，经常跟老师打架。

白本人并没有加入到这些人中去。“受家庭影响，在学校我总是很听话，所以我从来也不挨打。”他为人谦和，讨老师喜欢。尽管从未得过第一，但学习成绩始终排在班里的第五、六名。和区不同，他对他的同学充满了同情心。

有一天学生们爆发了长时间的骚乱：

孩子们的不满已经压抑得太久了，所以一旦发作起来就没有什么可以制止他们。学校的办公室被团团围住。突然有人大喊：“攻！”学生们抄起砖头竹棍，桌椅板凳，把它们投向老师。

很多老师受了伤，最遭恨的一位还被打断了骨头。白因为太小没有能参加，但他是完全站在学生一边的。这是因为，首先，他们的粗暴无礼只是针对那些喜欢打学生的老师；第二，他在那个年纪已经看到了老师的实际行为与他们所宣扬的价值观并不一致：

书上说不能打别人，可老师却为什么打人？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大人打小孩是没道理的。因为我本人从来也没有挨过父母的打，所以当学生们回击时我是站在他们一边的，更何况这些学生还是我的同学和朋友。

由于这种经历，他们不可能象区那样把权威人物看得那么神圣。“这给我一种正义感。一直到最后我始终感觉有需要反对的东西存在。这是我的一部分。那些年的影响是巨大的。”通过他对童年时代诸多事件细节的回忆，我们看到对白来说似乎永远存在着一种超出权威之上的真理和绝对价值。区和他正相反，对她来说，价值与权威是一回事，并没有什么区别。白不会为了要造反而蔑视权威，但如果言行不一的现象出现在权威人物身上，还是要遭到他的反对的。

直到那次骚乱的一年以后，上级派来两位解放军军官临时对孤儿院进行管理，这时孩子们的处境才得到缓解。白回忆了两位解放军干部对孤儿们最初的怀疑所表现出的耐心：

这两个军人和我们一起玩，一起听课。他们席地而坐，和我们吃在一起。喔！老师们都特别吃惊！入夜，他们两个在孤儿院里巡视，为孩子们整好被子。对孤儿们来说，他们梦寐以求的来自成年人的关怀全都表现在这里了。这两位解放军还总是想方设法提高孤儿院的物质待遇，比如说，伙食水平就提高了。当他们最后走的时候，许多孤儿都掉下泪来，他们觉得解放军就象他们的父母一样。在我

的记忆中，那天的情形还清晰可见。

区和白都对干部表现出极大的崇敬，但两人的出发点却并不相同。白对解放军持久的崇拜基于一种稳固的感情经历，这是他对他们的工作方式、耐心与同情心的追忆，绝非是他们作为干部或权威人物的地位令其如此。相反，区对干部的崇拜都是建立在掌权人物具有光荣与名望这样一种浪漫谛克的概念之上。

在这以后几年孤儿院的情况发生了显著的改善。老师们对孩子们表现出较多的同情心。学习空气变浓了，业余时间也被组织起来见缝插针地进行手工劳动。就是这样，根据白的叙述，他们还是比区的学校自由一些。在正规学校被劝阻和禁止的事，他们却可以做。白学会了打弹子和抓蛇，还和朋友们一起去游泳。前面我们提到过的那个男孩因为在普通小学里当干部，所以不敢在学校打弹子，只是在回家以后才“撒野”。这种情况在孤儿院里是看不到的。因为在孤儿院里，孩子们做什么事情都在一起：吃、睡、干活、学习、玩耍，一切都在老师的眼皮底下进行，所以不可能出现双重角色。

不管在孤儿院还是在普通小学，手工劳动还不仅仅意味着经济效益，他们认为劳动本身就是一种美德，在少年的整个发展中都至关重要。但是，在孤儿院里手工劳动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在区的和其它访谈对象的学校里却不是这样。相应地，两处的效果也就大不一样。根据白的叙述，一旦种下的东西有了收获，生产出的东西也卖了出去，他们看到了他们的劳动获得了确确实实的报酬。因为他们在经济上贡献是看

得见摸得着的，这就使手工劳动看起来很自然，而且还表现为一种个人的成绩。一直到现在，白仍然带着坚信不移的口气支持学习与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政策。从他的叙述中我们看到，手工劳动不仅已经成为他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也已成为孤儿院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自己种菜，自己收割。我们自己的产品自己核算，按市价的一半拿到学校里的小卖部出售。施肥、喂猪或做其它事情时，我们总要和数字打交道。因为有许多实际实践的机会，我们的数学和珠算都非常好。自然课是一位农民为我们上，他教我们怎样施肥：这是燕麦，你们应该施这种肥！要施这么多。在正规小学里，这些东西你教了他们也不懂。可我们却懂。我们的教学大纲大大简化了，能到地里学的东西我们就到地里去学。

在城市正规的日校中，尽管所有的公开声明都极为重视劳动，但实际情况往往相反，手工劳动从来也没有被放到和文化学习同等的地位上。最多，一个班给一小块地进行管理，但有时地实在太小了，根本无法耕作，只能在上面比划比划。孩子们有时被带到工厂里，但也只叫他们干一些轻活。有一个访谈对象回忆道：

我们对在我们那小块菜地里的劳动并不怎么重视。谁也不管会不会长出菜来。施肥的时候也马马虎虎，——觉得差不多的肥就向地里施。每周在老师带领下我们到那块“班

“地”里活动两次。我们很喜欢在地里干活，许多时间都在那儿打发掉了。

在区的个案中，我们已经讨论了她的同学们的家庭不同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如何导致她对于社会等级上下差别的敏感认识。在白的孤儿院里，没有家庭或者说不存在家庭差等，在这方面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在老师眼中，那里的孩子们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上的差别。但是，说孤儿们不知道他们之中的阶级差别并不等于说他们没有阶级觉悟。“阶级觉悟”这个词我理解它在中国表示一个人对自己属于被压迫阶级的认识。通过他们的自身经历，更重要的，经过老师的反复宣讲，孤儿们认识到他们本身就是过去那种被压迫阶级的集中表现；此时，白也“从同学们那里接受了这种感情。”那两个解放军曾经把孤儿们比作“祖国的花朵”，他们觉得这是真的。白和孤儿们渐渐骄傲地把自己看作是“国家的孩子”。象他们一样，白学会了对把他从贫穷和饥饿中解救出来的国家、党和毛主席表示报恩感情。在中国，“恩情”这个概念表示一种需要回报的赐福与恩惠。在需要的时候，孤儿们就应当用牺牲自己个人来回报国家的“恩情”。白观察到，班里的大多数学生都希望能上初中，但是，到六年级时，突然决定他们要开始工作，自食其力，他们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项决定。这是他们报恩的一种方式，——可是，如果不准许区或其它正规学校里聪明的野心勃勃的孩子进入名牌中学，他们就会大为不满。白用“驯顺思想”这个词来描述他的同学。在中国，白与他的老朋友们保持着关系，他们中有

一些人现在在工厂里当着班组长或下级干部。对白来说，他们是真正的积极分子：

他们非常听话（他确信在这里我没有把“听话”和“红”混为一谈），不惹事生非，不告别人的密。不是那种人（这是白现在对“红”的定义）。他们人老实，靠的是手艺和干活卖力气。他们的感恩、报恩都表现在这每一天之中。他们爬不高，最多能当到“蓝领”工头，这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怎样投机，不懂得怎样做一个假积极分子。

在小学里，白还没有接受担任职务的积极分子的角色。他觉得没有任何必要去做他同学的模范。上课时在课桌后读打仗小说这样的事非常普遍，而白却经常公开这样做，全不把老师的权威放在眼里。来自家庭和学校的几次冲击曾推动白采取区的方式去追求个人的抱负和名誉。但事实上，白几乎总是班上巨大年龄幅度中的小字辈，他在班里的形象是受宠的、贪玩的小弟弟：“我从来也没能有机会出头露面，指挥周围的人。”而区，她的角色从一开始就是大姐、班干部、和纪律监督人。

可是，自己已经掌握了许多积极分子价值观。他对国家的感激之情远远超过了区，国家的恩典对于他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可区却只能从国家的宣传中接受这种思想。同样，在对那种集体精神和热爱劳动的价值观的接受上，白的内心冲突也明显少于区，这是因为后者不得不经常进行着一种有意识的、反反复复的，却又是徒劳无功的努力来抵制自己在积极

性表现中的一己私欲。

7、张：反抗的儿童积极分子

当我开始和张的谈话时，他已经在香港生活四年了。他是我早在1971年就认识的那几个前红卫兵中最健谈的一位，那时候他就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那会儿他刚刚离开中国，却已经在开始根据中译本研究弗洛姆(Fromm)和弗洛伊德(Freud)。到1975年我们的交谈开始时，他已经能运用弗洛伊德的概念来描述他的早年岁月。这样我就面临着一个问题，由于这几年阅读的干扰，会使他在心中对自己过去记忆重新组合。

在我的所有访谈对象中，张是接受西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最多的一位。在许多方面，他表现得象一个聪明的、由西方教育出来的、越战时造反的大学生。他多年大量而广泛的阅读，以及他参加的香港新左派和托洛斯基主义者运动，使他接触到了各式各样的新的观点和新的表现方式。到这些谈话进行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已经脱离了“教条的马列主义集团”，因为他“已经成为一名人道的马克思主义者。”

可是，根据他的谈话和他朋友的证实，十年前还是这同一个张，却是广州最出名的中学红卫兵领袖。到现在为止，他的热情，他的摧毁一切现存制度的冲动，以及他的不假思索便会跳入政治灾难的漩流中的天性，都一如既往，毫无改变。部分地由于天性和他在中国时的积极分子类型，张是数

千名来自中国的青年人中唯一热诚地试图在中国之外举起“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旗帜的人。尽管他始终清楚这种努力毫无意义，并且也不会有结果，但对张来说，积极参与政治已经成为他存在的一种需要，他生活的一个大目标就是“继续革命”。他象一个“职业革命家”一样生活，找一个固定工作对他来说毫无兴趣，他无意于在香港社会出人头地，在他来的那个社会主义社会里，他也同样如此。

自我约束对于区和白来说是一种重要美德，但张却拒绝如此。在中国，学校着力“培养”自我约束精神，积极分子被教给的是要抑制自己的感情和个人爱好，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把自己完全献给集体、国家和革命。但张不管这套，无论是儿时、青年时期，还是现在，他一直随心所欲地做事。现在，他过着一种自我放纵的、完全没有规律的生活。尽管一次又一次下决心，但他还是节制不住挥霍，而且不停地借钱。看来他是连自己的反都要造，根本不肯让自己变好。

前面曾经提到过这点，由于张熟悉西方社会科学，由于他对心理学感兴趣，以及由于他长时间地浸淫于其中，他讲他自己的故事时总是带着自己的分析，不过这种几乎全部是弗洛伊德式的。通过叙述来重新体验儿时的情绪（区最擅长于此）对张来讲并不容易。下面的引文是他插在回忆中的典型的自我分析：

我母亲是一名普通女工。她属于不得不出来工作的那一类，她很能干——我说能干是指她是一个工作的女人。我想我通过一种渠道继承了她的性格。在一般情况下，受到

父亲过多压制的孩子会倾向于发展一种孤僻的性格。但是由于母亲教养的影响，我仍然还有一些温情，作为结果，我的性格并没有朝反社会方向发展。

在我的十三位正规教育只到初中的访谈对象中，张的智力水平最高，读的书也最多。他也是唯一一位用马列原著作武器进行斗争的访谈对象。象白一样，在批评中国时，他也能摆脱感情而付诸理智。但是，与白不一样的是，他的兴趣更多的是在纯理论上，而不是理论与实践兼而有之。他从未当过干部，也从未深入过农村，在他身上没有象在区和白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的个人意义上的对农民和“群众”的兴趣和关怀。讲到共青团和党时，他也没有白和区那样的热情。他从未入团。在香港，他参加了政治示威。但是他既无兴趣又无耐心去做基本的组织工作。除了他不受约束的天性以外，他还缺乏经验，因为无论在中学还是成年以后，他都从未当过干部。他是我们的“未被承认的积极分子”的第一个。

解放以前张出生在广州。他的父母一直很穷，他母亲不识字，父亲也没上过什么学。母亲做过店员，在快要生他的时候被解雇了。他的父母无可奈何地在街上摆起了小摊。“这就是为什么一提到旧时代老人们总是充满憎恨之情。”经济困难导致的挫折对张来讲一样会引起悲哀。父亲和儿子从来没有和睦过。

一生下来我就是家里的累赘，我总生病，父母不得不为我花很多钱。我们太穷了，这就是为什么小时候他恨

我。……我父亲说张家的儿子没用，因此他整天打我，有时叫我在祖宗的牌位前跪一整天。他待我不好。也许因为我懂事相对较早，也许因为我性格倔强，甚至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就和父亲发生了多次冲突。他尤其恨我，可他却对妹妹好，这是因为她生在解放后。他认为张家的儿子不好，可张家的女儿却好。

我们看到，张是作为一个倔强的、独立的孩子长大的。可是，他的独立并不完全是她反抗的结果，它还是他的社会阶级与邻里环境的产物。按照官方的划分，张的家庭属于“中产阶级”成份，再具体下分就是“职员”，这是因为就在刚要解放的时候，他父亲得到了一个工作，是在一家工厂的仓库里做管理员。虽然成分上属于“中产阶级”，但他的家庭却从来没有过中产阶级的门面，他的父母也从来没有用成就观念来推动他们的孩子。其实，他的家庭中更多的是工人阶级的味道。他的父母都是干活的（他母亲在大街上卖香烟），他们的注意力更多地被吸引到设法支撑这一越来越大的家庭上，而不是想为孩子们提供一种“适度的”教育。到了四年级的时候，他的作文被老师评价为已经达到初中水平。就在那一年，班主任建议他的父母他应该跳两级直接去上初中，但他的父母拒绝了。

要不是他的早熟，张很可能导向少年犯罪。他在学校里逞凶，而且在街上打群架。他在课上捣乱，不听课，和老师吵架，骂老师，甚至还打老师。据张说他这么做是出自内心的冲动，不管是喜欢的老师还是不喜欢的老师，他都这样

做。“对那些我不喜欢的老师我当然要撒野，但对那些我喜欢的老师我却还是如此。甚至有一种奇怪的心理——我没必要撒野，但我却选择了这样做，我的撒野是毫无道理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学校的价值观已经有效地内化于他的心中，因为他已经知道他这么造反并不正确。张已经到了临界点却并没有越过去，他只是在警戒线的边上徘徊。我们看到，造反、完全放松自我控制，以及玩火的冲动，贯穿了他整个青春期，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

在学校里他有资格造反。尽管他经常捣蛋，但他那股聪明劲还是叫老师赞不绝口。他的造反立刻成了吸引注意力的手段，他急于表明，他要做好就做好，要捣蛋就捣蛋，全凭他愿意。其它的访谈对象们宁可通过顺从来吸引老师的注意，但张却选择了反抗的方法。他因为敢于挑起骚乱而赢得了一些同学的赞许，而他在学业上的出色表现又引起了另外一些同学的尊敬。到了五、六年级，他在学业上的成功甚至赢得了他父亲的尊敬。他开始带着他的儿子去工厂里下中国象棋，因为他所向无敌，所以小张为老张在工厂里带来了名声：“他需要那个，你知道，他在单位内没人注意。”

无论区还是张都看不起他们的同辈，而且两人都没有知近的朋友。但是，两人自大的表现方式却不相同。区因为要和权威保持一致所以疏远了其他人，而张虽然留在同辈集团一边，却又和他们保持距离。白非常赞赏的集体精神和团体的共同感情在区和张身上一点也见不到。从表面看，区试图“表现”这种精神，这是因为她真想按照党所要求的行为标准去做。但实际上，她不“属于”集体，她总觉得比别人

高。和区相反，对于顺从那套行为标准，张丝毫不感兴趣。

那种一对一对的东西，诸如自私与忘我，骄傲与谦虚，个人主义与集体精神，令区大为困惑，而张却处之泰然。但是，可以肯定他接受了教给他的基本政治理想。大跃进期间，在加速创造一个理想中国的兴奋和喧闹声中，他受到了感染，觉得精神振奋。他开始每天读报纸，如饥似渴地贪读着报上报道的国家奇迹般的成就。但是，政治知识丰富并不等于积极性。他对于国家进步的关心也仅仅转化为他日后在学业上的成功。因为他读了报纸，所以他能够回答所有关于时事的问题。

对于权威和官方的行为标准，不管他是造反也好，轻蔑也好，通过自己的方式，在他心中还是内化了一些国家的价值观，而且与区和白的一样深。有一点他和白很相似，他也不认为价值和权威是一回事。尽管张的价值取向与国家的价值观一致，但是由于他没有表现出顺从，所以没有被承认。到底一个孩子该怎么做才能表明他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呢？是通过在心中内化那套价值观，还是通过对学校当局的要求积极地顺从？在张的政治表现中，有守规矩的一面，也有反社会的一面，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表现得很“出色”。在手工劳动、组织能力和关心同学方面，他显得非常突出。他没有兴趣在公开场合表现出他比他的同辈强。获得一个最聪明和最捣蛋的名声他感觉很高兴，但是他并没有进一步的愿望去追求能够从学校当局那里得到的权力和声望。四年级时，由于一种不知道的原因，暂且不论他性格中几乎可以预想的反复

无常，他突然变得驯服起来，对此感到欣慰的老师作为奖赏让他当上了校级少先队队委。但他毫不珍惜这种荣誉。就在这一年，他又变成了老样子：“我不在乎，我告诉他们我不想干了，我仍然捣蛋。”

后来，他又再一次地顺从于权威，很简单这是出于一件不情愿的事。当被经济环境驱使去做违背他的价值观的事时，他感到苦恼。这一段大跃进以后严重经济萧条中的插曲，表明了他对于那套价值观的内化是如何之深：

三年困难时期，我家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于是我把我的小人书拿到街上去为家里换钱。我还在黑市卖食物。例如，我的母亲花到每只三角或四角买来鸡蛋，做熟后再以每只五角钱卖出去。那些日子许多人都这么做。我带着妹妹，在街上摆出鸡蛋，有的时候整天都卖不掉一只。挨饿真不好受，我就是在那会儿长大的。在感情上，我很混乱。一方面，我不能帮家里，家里的日子实在太难熬了。我母亲每月只能挣30块钱，并且她还有肺病。但另一方面，在我们的社会里，黑市买卖是犯罪。为此我在学校受到批评。当学校在麦克风里广播我的名字，说“某某在黑市卖东西”时，我觉得无地自容。我羞愧极了。我是少先队员，我爱我的国家，我觉得我好象对它犯了罪。所以，当他们批评我时我觉得我的心在流泪，我难受极了。但是，事后我还得帮助家里。所以人们会说我的儿童时代是非常复杂的。回到黑市后，我和那些游荡的人拉上了关系。刺伤我的是那些小资产阶级或教授们的孩子，他们永远也不

会明白这些。他们永远也不会有这种经历。

在普通时节他会蔑视权威，破坏规矩，不把那套行为标准放在眼里，但是当学校当局的指责触及到了他的内心时，他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在学校里，教给孩子们的是对中国的革命家们的颂扬、对工农的尊敬，和对过去的剥削者与不赞成革命的人的斥责。象在中等阶级家庭或者是在白的孤儿院里，儿童是在受到保护的环境里长大的，他们要崇拜“好人”，远离“坏蛋”。但是，由于是在一个贫穷的工人阶级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张甚至在孩提时代就见到了社会的底层，他是能够接受这个社会的现实的。他能够接受对于政治和革命的不同看法，甚至对于那些可以算得上是“反革命”的言论和行动，他也能够接受。

张对于他父亲“跪拜在毛主席像前感谢毛主席给了我们这样的好生活”的最早记忆，在我的访谈对象中任何一个人少年时代的记忆中都无法与之相比，这就是他对于“阶级感情”最深刻的体验。但是，张并没有白的那种“阶级觉悟”，这是因为他对于他曾经是被剥削阶级这一点并无深刻体验，同样他本人也不会向党表露感激之情。他的父亲对于革命的态度是随着经济情况而左右摇摆的。张通过他的邻居们观察到：“实际上许多工人都和我父亲的想法差不多，就是，只有当他们从中获益时才会说共产主义是好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张的父亲咒骂共产党，帮着散布那些在下层社会里流传的象“共产党要完蛋，国民党要回来”这类谣言。在这

段时间里，父母教育水平较高的其他访谈对象很少能听到这类抱怨，他们的父母很谨慎，只让子女接受官方对于国家不幸的解释。究其原因，一方面他们要使他们的子女保持对现行政治系统的信任，另一方面，则是惧怕子女在无意识之中公开讲出违禁的话，给全家都带来麻烦。

张对于他父亲的“反革命”观点表现出极大的克制：

我一句话也不说。我反对他说的那套，我总觉得国民党是可怕的。但是，我也没跟他作对，不管怎样他是我的父亲。此外，家里也实在太困难了。所以我就让他讲。我觉得很难在这件事上指责他。

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张对于党和毛主席的信任并没有动摇，但同时，他也并没有同他父亲在政治上的“落后”决裂。相反，区能够面对面地指责他的父亲是“反革命”，甚至仅仅因为她父亲出身不够“革命”，就遭到她的蔑视。在张身上没有自卑感，他也不为出身于一个社会、经济地位都很低的家庭而感到难堪，他从未希望他有一个社会地位较高的父亲。他从未抛弃他的家庭：“我从来也不指责老人，我可怜他，一直到最后，我也没有看不起他，我更不恨他。我想这大概是出于我的自信心吧。”当他看到比较富裕的同学在物质上的享受时，他也很少感觉到难以忍受。可是，区则不然，她承认她曾经追求更好的穿戴。与此同时，张也没有象区那种从课本和儿童杂志学来的对于无产阶级的盲目崇拜，他从来也没有过象区那样的浪漫谛克的感情。有

一种变化发生在张身上，就是他已经使自己脱离了原来的那个社会阶级，更多地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知识分子。

到了报名上初中的时候，张选择了一个离家只有五分钟距离的二类学校。因为怕会受到自己过去表现的影响，他没敢报更好的学校。但是公平地说，他身上也没有象区那样的非要进入名牌中学不可的野心。如果他有此心的话，他就会在行为上有所收敛，就象另外几个访谈对象那样，这样就能从六年级的老师那里得到一个较好的评语。但是，他无法真正放弃他那种固执的独立感，哪怕是为了日后的成功，他也不肯屈尊于权威。

8、邓：讲求实际的儿童积极分子

邓是我们的第二个“未被承认的积极分子”。别人介绍我认识他时，他刚刚到香港仅几个月。在他个人身上发生的变化很明显，就在我们谈话的几个月之间，他的话题变了又变。一开始，他饶有兴趣地跟我讲起有关政治行动方面的事。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开始打趣地跟我讲到如何才能赚大钱。到了这一年的年末，他已经完全放弃了这些政治方面的谈话，绞尽脑汁想通过商业活动在香港占一席地位。

十年以前，邓是和张齐名的红卫兵领袖：是他们两个领导着广州的造反红卫兵。到香港后有好一段时间，在他的老“战友”中他仍然有相当的号召力，并且他也依旧把自己看作是他同辈的政治领袖。半是出于怀旧感情，半是出于他

自己所声称的理想主义，当他最终决定放弃政治领袖的自我形象时，还是踌躇再三，充满了内心的斗争。他把他最终向香港物质主义诱惑投降的那个短暂的自我怜惜的时刻称之为：“我的末日已经到来了”。但是，邓，一个曾经是讲求实际的积极分子的人，他的理想主义能够达到什么程度，是值得考虑的，他这种类型的积极性的表现将是我们探讨的一个问题。

一旦作出了决定，人类关系中的那种唯利是图的典型形象就在邓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除了金钱，他在香港社会里再也见不到什么别的东西了，讲起他赚钱的计划来，他也毫无愧色之色。他曾经有很强的自我约束精神，现在他又把这种精神集中于获得他在香港经济阶梯上攀登所必要的实践技巧与知识上。没有其它的访谈对象学起英语来象邓这样如饥似渴，因为他明白掌握英语是他取得成功的首要条件。和区不一样，她选择耗费时间的正规学业课程是想要在新的社会里满足她的上大学的野心，而邓，他宁可选择更方便、更直接的道路，这在香港意味着他要开始自己的商业活动，成为一个资本家。

和邓进行交谈是困难的。他喜欢居于控制地位，总想让谈话适应他的口味，表现出他依然是主宰者。邓很聪明，也读过不少书，但他总是急于表现自己，让自己看去比实际上更博学。问到一些敏感问题时，他也是遮遮掩掩的，他不喜欢别人探究他的内心思想。他喜欢表现出他现在的玩世不恭，也正是这一点使他成为一个不成功的访谈对象。但是，熟悉他的人说他一直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并非玩世不恭。从外表来

看，他的这种内心的变化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开始的。

邓生在解放前两年。在那个年龄，另外三位访谈对象都是出众的聪明和成熟，但邓不是。在小学里他学业不佳。他成熟得晚，对知识的爱好和对学校所教的那套政治价值的感情依附都极少。作为结果，他对于这种政治社会化过程的记忆非常模糊，对于这类问题的回答也很简略。他最生动的描述是他在小学低年级时的多次打架，其中几次他能回忆起最微小的细节。他对儿时的回忆是这样的：“它毫无光彩，毫无美丽之处。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没有理想。什么也没有。非常无聊，对任何事我都没兴趣。”邓把这一切归咎于缺乏优越的天赋，但是观察者通过回溯他的经历可以看到他成长起来的客观环境实在是不利于他早期智力和情感的发展。他的儿童期教育是由一个幼儿园和五所小学完成的。每一次转学，他的学习或生活环境的变化总是伴随着自身的调整，这种调整是困难的，他几乎没有得到过来自父母或父母身份的人的关心和鼓励。

邓在三个儿子中排行第二，他的父母都受过较高的教育，被社会主义政府聘用为“技术干部”，在自己的工作单位里有一些地位。但是，按官方的标准，他们的阶级成分属于中等，为小资产阶级，具体划分则为“职员”。在儿童的阶级背景还不是那么重要时，填表时邓有时填上“技术干部”，有时填上“职员”。在经济上，他的家庭很宽裕，邻居们的水平也都差不多。从邓现在的分析来看，他的父母“专”而不“红”：“我记得小时候父亲是他工作那地方的重要干部，但他却不申请入党。我的父母信奉中庸之道。他们

不是积极分子。积极分子是踩着别人往上爬的人。”

邓的父母对子女抱有厚望，但却在他们身上花费时间极少。他们被工作以及许许多多下班后的会议和政治学习缠住，没时间辅导孩子，没时间跟他们谈话，甚至没时间和他们一起在家吃饭。邓还能记得，那会儿他经常在他父母工作单位的食堂里吃饭。简而言之，在邓的家庭里，过家庭生活的时间并不存在。邓被送进一家整托的幼儿园：

我的父母没有给我带来多少温暖。有时星期天他们接我出去，我高兴极了；但是，由于他们在单位里特别忙，所以总也不来接我。他们要是不来我就不吃饭，等下一周他们来时，我躲起来不见他们。我发脾气。我变野了，甚至星期天也不想回家。星期天我会把住处弄得乱七八糟，只是因为周围没什么人。……我们的关系怎么会亲密？大家在一起的机会是那么少。

绝不能忽视他语调中的不满。另一个访谈对象，父母也是“技术干部”，同样给孩子们的时间太少，他也形成了相似的不满情绪。在幼儿园里邓变得难以控制，不停地撒野。他成了同辈中的霸王，他的记忆表明，无论是孩子们还是老师们，没人真正喜欢他。当他的女老师把他的表现报告给他父母后，他受到责骂，并且还挨了重重一顿打。但是，由于他好斗的性格，也由于他缺乏来自无论家庭还是学校的教养，这一切对他毫无影响。

小学阶段，邓有两次被送走，因为那会他们兄弟三个要

轮流被送到北方的祖父那里去住。一、二年级他是在那里渡过的。对于这一阶段，邓只有断断续续的记忆，——他在街上打架而且不愿意学习。以后，他又回到了父母的身边。很快他就遇上了麻烦事，一个是他讲话的语调和这里的孩子们不一样，另一个就是这里学校的教学大纲和他过去学的东西接不上。第一个学期，所有功课他都不及格。而且，作为一个“北方佬”，他的口音成了孩子们取笑的对象。对此，他只有一个想法：用拳头对付他们。于是他每周都要打两次“大仗”。从他的叙述来看，用打架来回击别人的进攻已经成为他生存的手段，成为他的生活观。有两位访谈对象的情况跟他相似，他们也是在两个地方上的小学，他们也同样体验到了在中国儿童身上的强烈的地区偏见，但他们从未遇到过如此极端的孤立。邓观察到其它外省的孩子如何低三下四地屈服于广东同学的控制而把他孤立了。邓本人，尽管从不造反，但却很顽劣。作为结果，他一次又一次地挨班里同学的打。他抱怨他的父母：

他们的道理是，你不打别人，别人就不打你。于是他们就臭骂我：“别再象你在幼儿园时那样捣蛋！”但是，事实上从那会儿以后我已经象一根木头一样了。我没再捣蛋，也没再固执。

他抱怨父母对他缺乏同情。作为逃避的手段，他开始旷课了。

看来学校所教的政治价值一点也没有渗透到他的思想

中。“他们教我我就听着，仅此而已。”没有别的比他对少先队的态度更能显示他对于那套政治价值的格格不入了。到了三年级他的大多数同学都已经入队时，邓因为经常打架，所以不让他加入。他对自己说他不在意，他不愿意有那些打他的人有的东西。

到了四年级，他终于被告诉说他可以加入少先队了，入队仪式几天以后在放学时举行。这种入队仪式被好几位访谈对象看作是他们少先时代最难忘的时刻，但是，邓却把它忘记了，入队仪式他没有参加。对于老师们来说，这种事是闻所未闻的，这是一个孩子对于少先队表示的最大的污辱。他的父母马上就被找来了，邓受到来自老师和父母的劈头盖脸的斥责。可是，他受到学校政治社会化的影响是如此之少，——他对于加入少先队的“光荣”的理解是如此之少——以至于他一直搞不清楚大人们为什么会这么大惊小怪。

邓的母亲很晚才认清她儿子面临的问题，她把他转到一个较好的学校，并且腾出时间来为他辅导功课。连他自己都吃惊，他居然通过了期末考试。这样，他开始有了对自立能力的自信。五年级时，他转到了第五所小学。这时候他的广东话已经说得很流利，他独自寻求自己的兴趣，开始自己阅读。他的作文甚至开始得到老师的好评，他把从阅读中学到的新词全都摆到作文本上来了。

就是这样他也依然孤立，和同学，和老师都没有密切的关系。在这样的环境里关于集体精神的教育对他毫无意义，那些故事书里的说教，诸如对你的同学要好，别人有困难时去帮助他们，对别人要友好，义务劳动时不要偷懒等等，这些

对于邓发生不了什么影响。但是，象任何正常的孩子一样，他希望被别人接受和尊敬。五年级时，一次他与别的孩子的争吵被劝止后，他生发了对少先队员的羡慕，尤其是少先队干部：“他们有一道、二道、三道，我却什么也没有。”到了六年级，他终于被承认了，但这已经很晚了。有几个星期他感到安慰和骄傲。但是，对于依附在少先队员形象上的那套神圣的政治价值，他还是那么健忘：

入队不久，我就不想再戴红领巾了。尽管到最后能入了队我感到幸福，但我还是想表明我对红领巾毫不上心。我的父母对我的想法很清楚，他们说：“你曾经丢掉过这种‘光荣’，现在又有了，可你为什么不好好保护它？”没办法，我只得在出门时和回来时把它戴上。我的弟弟很早就入了队，在我的影响下，每天上学去走到离家较远的地方，我们俩都把红领巾摘下来塞到口袋里。有一次我这么做被父亲抓到了，但是，就是在那以后我也还是拒绝戴它。

到小学教育快结束时，邓已经达到中等水平。他很孤僻，但没有发展到反社会。对于学校当局，他没有那种浪漫谛克的尊崇，也没有把它们看得那么值得敬畏，他也没有什么兴趣通过积极努力来赢得他们的表扬。虽然如此，他也没有象张那样对权威造反。虽然那套政治价值他内化的极少，但他也不反对它们。对于他的社会经济背景，他既无优越感，也无自卑感，这是因为他从未开始交任何朋友，因而也就无法把自己和别人进行对比。长期被少先队排斥在外，使他觉

得自己是圈外人，他没有贬低自己，反而采取了吃不上葡萄就说葡萄酸的这种态度。他已经开始了野心，而且他的野心在变大。

他正在开始吸收一些政府的道德观，他是从一个“非正规的渠道”得来的，也就是说是他通过自己阅读小说得来的。他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一个老共青团员》，这本书对他的触动非常大。“那书上说人们应当为党和革命献身。读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值得崇拜的精神，我觉得人们应当象这样做。”邓的行为没有离经叛道，他只不过在接受政治社会化方面成熟得晚。他生来就没有经历过区、白、张共有的对于那套政治价值的强烈感情。如同实用主义构成了邓的积极性特征，区、白、张在少年时代的强烈感情也为形成日后他们的积极性的不同类型奠定了基础。

第三章 青春期的政治社会化

当青少年走过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的时候，他们常常受到日益增长的压力，这种压力要求他们扮演一个时髦的积极分子的角色。学生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愈来愈认识到一个好的政治履历对他们进一步升学深造会有很大帮助；而且，在1962到1966这五年期间，党的高层领导要学生们做积极分子的要求变强了。这个时期，正值这一代学生成长发育的时期。

领导阶层对学生加强要求决非偶然，同苏联的公开决裂便是原因之一。还在1963年，中学生们就被指定学习党中央文件，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罪行。此外，通过报纸社论，党的领导还开始呼吁全国的青少年坚决抵制可能出现的腐化堕落现象。在青年杂志里，这种忧虑作为一个事关重大的道德问题被反复重申：

“国内外的阶级敌人贼心不死，妄图利用青年人在阶级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幼稚无知、缺乏经验和锻炼，以及阶级警惕性不高这些弱点，散布资产阶级流毒，逐渐摧毁青年

人的革命斗志，腐蚀他们的灵魂。臭名昭著的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甚至在他气息奄奄之际，仍念念不忘地强调要用‘西方文明生活方式’来腐蚀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三代’，通过这种手段来达到他们‘和平演变’的罪恶目的，从而使社会主义倒退回资本主义。”

为了避免这种危险，学校借助大众传播媒介，逐步开展政治教育。在学校课程表上的课外活动栏中，增加了一项所谓的“阶级教育”，充满感情地回忆革命传统，宣誓忠于党和国家，以及追忆旧社会穷人受到的剥削与压迫，都属于“阶级教育”的内容。在党的领导下，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被神化了的形象联系起来，要求青年人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他们自己是真诚的积极分子。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探查区、白、张、邓四位青年人如何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接受了政治教导；又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他们的耿耿忠心。我们也将观察他们分别遇到的激励与窘境。不过，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切，我们必须首先考察一下学校当局借以鼓励和支持积极分子行动的工作和机构。

9、小组

和小学一样，教育者通过精心组织的竞争和管理极严的学校环境来约束青少年的行为。不同的是，在中学，还利用

小组讨论来达到这种目的。

在每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时间，大约总有十二名左右的小组成员按照规定聚在一起，自由交换思想，提出个人在政治上或生活上遇到的问题，或观察到的别人的问题，批评落后的思想与表现，表扬好人好事；目的在于依靠同学之间的善意相助，引导学生步入正途。

但是小组并不意味着是一个紧密团结的集体，它的内部也有对立和斗争。这是为了防止同学中非正规的模范控制整个小组，同时保证友谊和情面不致影响批评和自我批评。小组里的积极分子的行为，通常都是在小组带头人的压力下同学之间相互竞争的产物。

为了鼓励这种竞争，小组被授权可以提名“三好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与劳动积极分子的候选人。到学年末，这些光荣称号都被载入获得者的档案，对于他们升大学有直接的好处。这种诱惑，再加上被安排进各个小组的爱打小报告的积极分子的存在，使得小组讨论充满了官方钦定的高调儿，任何相反的意见在这里都休想提出。

下面，最好引录一位亲身参与者的叙述，来说明在小组讨论中与众人保持步调一致的重要性：

我们将要去农村两周左右帮助农民进行收割。出发之前，我们开了个讨论会。会上，每人都必须发言表决心。你得说明你是如何坚定地准备锻炼自己，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向他们学习。

问：这岂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把同样的话重复个不

休吗？

答：是的。而且每次下乡之前都得开同样的会。

问：这么说来，你们只消把该说的话记熟就行了？

答：噢，其实只要一张嘴，那些话就自然而然地涌到嘴边上了。

不过这并不表明他们对那些豪言壮语的价值有丝毫怀疑，因为他继续说道：

当时，我在思索如何提高自己的认识……一切教育都把重点放在这件事上。因此，每个人都要努力寻找自己的错误与缺点。每个人都认为深入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是再正确没有的。……当时还有这种倾向：人人都强制自己只从好的一面看待农民。但每次从乡下回来，经过一番思考，我们发现除了忍辱负重的品质之外，农民显得异常自私。我们有些人私下里谈论起这一点，都觉得惊慌失措，无所适从。要是谁碰上了个乐于助人的农民，他就会到处夸耀，因为他确实是通过自己的经验发现了农民身上的美德。

从农村回来后，还得再开个会，汇报他们与农民同劳动的过程中学到了什么：

那种会非常程式化。每个人都这么说：“以前我很懒，不爱劳动；这次劳动之后我感到……如此这般，如此

这般。都是些千篇一律的高调。”

问：人人都说一样的话吗？

答：当然。

问：没有人说出不应该说的话？

答：那是不可能的。除非右派分子才会那么做。

问：有人尝试过吗？

答：从来没有。

从这儿可看出两种后果：一方面，经常性的逢场作戏使得学生们学会了“一张嘴，那些话就自然而然地涌到嘴边上来”的本事，而集体的压力又使他们不得不照着这些话去做；另一方面，这一切都是以公式化、虚伪以及言论自由的销声匿迹为代价的。

10、阶级教育

鉴于学生们没有亲身体验过解放前的艰苦生活，从1962至1963年开始，要求他们参加“忆苦思甜”会。学校请来在旧社会挨过饿吃过苦的老工人老农民，让他们为学生讲述他们过去的悲惨经历。但是许多学生在这种场合会感觉十分矛盾，这是因为，在当时众人的压力下，它实际上变成了鼓励学生竞相表现积极的又一个机会。一名女子中学的学生这样回忆道：

我们围坐在老人身边，泪流满面地听他讲述过去的事情。然后，我们和着泪水咽下了用树叶草根做的忆苦饭。我们红肿着眼睛，把它全部吃光。我是那么受感动，我哭了又哭！

所有的学生都在哭泣。当时的气氛是这样的：如果你不哭，别人就会认为你缺乏阶级觉悟。因为有这种压力，忆苦会实际上变成了一次表演。那些女孩子用不着哭得太响，她们只是发出“呜呜呜”的声音；她们也许确实被感动了，不过根本达不到那么深的程度。要是她们没哭，也许还意味着她们是真心的；可是一哭，就显得假了……不过，我却是真地受到了感动。

开过忆苦会后大约十天之内，大多数学生都变得更加积极：在教室里保持安静，连走路都规规矩矩；在宿舍里做好事，象帮着别人挂蚊帐，替同学铺床，诸如此类。可是等过去这一阵子，就又都恢复了原样。嘿，那才真叫滑稽呢。

11、共产主义青年团

共产主义青年团为积极分子的大量出现提供了比小组讨论和忆苦会更加广泛而有效的途径。但是，要到高中才能充分感受到团组织的影响，因为学生必须年满十五岁才有资格申请加入这个挑选十分严格的组织。一般来说，初二时每班只有两三个团员，整个年级团员的数量才刚够组成一个团支

部。这样，共青团对于大多数初中学生的事务，作用不大显著；而中学生的年龄又已不允许他们继续做少先队员，于是领导权就集中到了经过挑选的班干部手里。

在比较好的初中，多数学生都希望升入重点高中，所以到初中的最后一年，注意力转向了团组织。学生们都明白团员身份对于升学很有用处。一个学生说：

在初中的最后一年，同学们忽然全都对入团感兴趣来了。要知道，当你填升学志愿表的时候，总有一项叫做“政治面目”，即考察你是团员还只是普通群众。但却没有“班级职务”这一栏。一旦你入了团，“共青团员”那几个金光闪闪的字就雷打不动了。党是先锋，团员是党的助手，不是吗？

当学生们升入高中以后，每个班都会有足够数目的团员，组成自己的团支部。团支部有权发展新团员；通过行使这种权力，团员可以影响普通同学升大学的机会。在多数学校里，学生们都有意表现得十分积极，迫切希望取得团员的好感。

申请入团者必须请一个或两个团员担任他们的“入团介绍人”。为了让自己的诚恳与忠实在他们政治上的提携者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必须敞开心扉，同介绍人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谈心。他们应就困扰着自己的问题征求介绍人的指点帮助，不管这些问题是个生活上的失误，还是对党的某些政策不太理解，抑或属于一时的疏忽大意，如睡过了头，

耽误了某次早操，等等。

除了谈心之外，申请人处在被展示的位置。他们必须不断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时刻流露对同学的关心。带头做好事，争取优秀的成绩，劳动时努力肯干，开会时积极发言，并毫不留情地做自我批评。此外，他们还必须“紧密靠拢团组织”。

下面是白的叙述，反映了白所在的团支部在吸收新团员时考虑到的种种因素。当时是1961年，白正上高三。团支部决定发展一名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学生入团。这是极不寻常的，尽管那时对阶级界限的划分还不十分严格。

那个家伙还有点儿虚伪。在发展会上，我们这些团员正襟危坐，对他的虚伪进行了最严肃的批评。我们指责他每做一件好事，总要去引起别人注意。不过总的说来他还是不错的，至少在班里他能够帮助其他同学。他虚荣心强，挨批评主要是因为这个。

问：那么这岂不是要被称做“假积极”了吗？

答：“假积极”是指“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而他当面背后都还算是表现好的。只是他无论做什么事，都把求荣誉放在第一位。我们直把他批评得汗流浃背。他十分害怕，唯恐我们不通过他。

最后，虽然知道他动机不纯，团支部还是批准了他的申请，因为他能“紧密靠拢组织”。那么“紧密靠拢组织”又意味着什么呢？白继续说道：

它意味着和团员加强联系，多递政治思想汇报。”“加强联系”的意思就是多和团员谈心，多和他们在一起，经常向支部汇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从根本上按照团支部所说的话办事。任何对团组织不理不睬的学生都被看做是怀有敌意。他们申报大学志愿书上的评语肯定好不了，因为这些评语先由老师写过，然后还要交到团支部由支部成员鉴定。

有趣的是，那些申请入团者内在的动机——意识形态上的严重缺陷，这种缺陷经常被非团员们轻蔑地称作“假积极”——却居然被团支部忽略了，唯一的条件就是必须“紧密靠拢组织”。这六个字理所当然地决定了只有那些愿意无条件服从由团组织规定的行为准则的青年才可以被吸收，而这里所说的团组织，从它组织结构的统一来看，是国家的团组织；国家的团组织通过团支部来行使权力，团支部成为班级教室里一切行为的至高无上的仲裁者。

如果对申请人个人声称的阶级出身有所怀疑，团支部可以请校团委查阅学生档案，或者索性前往申请人的父亲所在的工作单位，调查其家庭的历史背景。在中国，这番程序被称为“搞外调”，它对于当事人来说事关重大，因为说不定连当事人自己都不了解的家庭出身和历史，将有力地影响他一生的命运与前途。个人与班里老师都无法接触档案，正因为如此，一个非团员学生说，“你觉得团支部对你的一切都了如指掌，而你对团组织一无所知。”白本人就是一名团员，他

曾半开玩笑地说他所在的团支部：“呀；我们就象神秘书的操纵者。”这话于无意中道出了部分实情。

老师对于团组织发展新成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力，除非他自己便是校团委的重要组织成员。不过，他可以为那些他认为比较合适但却被团支部忽略了的学生说两句好话。在我进行抽样调查的一个班级里，团支部成员主要由出身好的学生组成，他们吸收的新团员也只限于家庭背景相似的同学；老师试图干预，结果发现他除了和团员们闹得僵持不下之外，一无所得。

支部有时会从学生当中选出一定的“发展对象”。支部成员主动接近这个被认为适合发展入团的学生，而不是等着他来靠拢团组织。这样的学生一般来说都是出身可靠或是曾经表现异常积极却一直没有公开提出申请的。

1963年后，阶级界限划分得更加严格了，团员越来越多地来自出身好的学生，中间阶层的学生所占比例相对减少。这些中间阶层的学生，尤其是职员阶层的子弟，和资本家家庭出身或其他出身不好的学生不同，那些人久已习惯了不平等的待遇，而他们在学校里却是一向受宠、样样顺遂的。此刻他们眼看入团机会减少，不免感到苦恼，但他们全心全意地信仰现存的政治制度，不顾一切地期望加入这个先进组织——青年团。结果他们便表现得更加积极，以此来作为对划分阶级界限的回报。至于那些本来就出身不好的学生则恰恰相反：他们几乎全然被挤出了竞争的行列，对入团机会的看法比较现实，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退出了做积极分子的竞争。

在1965到1966年期间，正值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夕，党的领导为了抚慰和减轻中间阶层和出身不好的学生的沮丧情绪，提出了一项新的政策，可以简明地概括为一个口号：“有成分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但这句口号是可以任意进行解释的。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对如何识别真诚的积极分子自有一套不同的标准。就这个问题爆发的争论，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学生斗争的一个焦点。

一方面，共产主义青年团为领导者们提供了一种有力的手段，激发起了青少年争做积极分子的热情；另一方面，这种因入团而引起的竞争在学生中间播下了不和的种子，特别是由于掺和了阶级界限问题，学生便被分成了可能对抗的阶级阵营。

12、模范教育

虽然许多学生因入团竞争和阶级界限问题被搅得心神不宁，但他们绝无政治上的不满。他们都带着负罪感积极行动。为了对此进行鼓励，政府树立起一系列英雄形象，号召青年人以他们为榜样，而不是放任自流，听凭青年人去崇拜自己选择的也许是有害的偶像。这些官方钦定的模范人物都以完美得近乎神化的面目呈现在人们面前，目的在于帮助青少年从他们自身的革命潜力出发塑造一个理想化的典型。试图和英雄人物竞赛的年青人被认为是付出了最大限度的努力。

从书本里和杂志上，青少年接触到相当多的英雄模范，其中真实人物和小说人物兼而有之。有两种类型是特别为政府所推崇的。第一种是战斗英雄和革命烈士。这种英雄形象充斥五十年代青年文学读物。当时，中国刚刚结束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抗日战争、国内战争与朝鲜战争，对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辉煌胜利记忆犹新，而外国侵略的威胁尚未消除；因此，党自然要极力培养爱国主义情绪，并使这种情绪为革命斗争服务。通过学习战斗英雄，青年人不仅可以了解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的传奇般的历史，而且必须认识到，他们不应辜负革命前辈的流血牺牲。

第二种类型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英雄。跨入六十年代，烈士的传记逐渐为和平时期脚踏实地从事普通生产劳动的新模范人物所取代。在这些英雄人物里，雷锋是最知名的。1963年3月，《中国青年》杂志，号召开展向雷锋学习的运动，显示了他作为模范人物的特殊地位。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向雷锋同志学习”这几个大字，就刊登在杂志的扉页上。正因为党中央选定了雷锋做为全国人民学习的典范，我们可以断定，在所有模范人物当中，雷锋最完美地体现了党要求青少年必须通过学习获得的个人品质。

雷锋是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由于受到地主的剥削压迫，他的家里人因饥饿和疾病相继去世，最后，他的母亲也自杀了。六岁成为孤儿，四年以后，他所在的村子“解放”了。雷锋对党给他带来的巨变无比感激，他成了一名积极分子，后来又参了军，入了党。1962年他因事故死去，年仅二十二岁。他死后，人们发现了他的日记，其中部分日记

立刻被发表、出版，但从未出过全集。

在雷锋的日记选里，每页都记载着他对毛主席、对党和人民群众的感激之情。雷锋在写到党和毛主席时，就好象他在同他们进行直接的个人对话。他下了一个又一个决心，要毫无保留地献身给共产主义事业。几乎每天都能在他的日记里发现这样的情感流露：

今天早晨起床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昨天夜里我梦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今天，我对党有说不完的话，表示不完的感激，还有无穷无尽的决心，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在入党的那一天，他写道：

啊，我的心是多么激动！它一会儿也平静不下来。
啊，伟大的党！伟大的毛主席！多亏了您我才开始了新的生活。当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时候，是您救了我，给我饭吃，给我衣穿，还送我上学念书……在您的不断培养和教导下，我从一个穷孩子，终于成长为一名有知识有觉悟的共产主义战士。

雷锋是完全大公无私的，他丝毫不谋求个人利益，更不怀疑自己的信念。他是正义的体现。但更重要的是，他成了感激，忠诚与信仰的化身。

随着对毛主席个人崇拜的形成，雷锋的榜样再好没有地

说明了青年人应如何接受毛主席的教育。雷锋在日记里摘抄了大段大段的毛泽东语录；每逢生活上思想上碰到难题，就将写下“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的日记。下面一段话非常细微地表明了这位模范英雄是如何学习《毛泽东选集》的：

每天夜里，雷锋都要挤出时间，不知疲倦地学习。就这样，他终于读完了毛选四卷和报纸上登载的毛主席的全部文章。毛选第四卷他读了不下两三遍，其中部分文章甚至读过六七遍。象《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将革命进行到底》，他都是读过无数遍的。读后他还写过许多心得体会。

雷锋这个榜样的含义对于学生们来说十分清楚：在阅读毛主席的著作时不应存有任何怀疑。毛主席的话都被当成信条接受，独立思考是没有份儿的。正确的学习方法是反复阅读，最好能够背诵，并把毛主席的一切著述都当做不证自明的真理。这种靠死记学习真理的办法在中国并不陌生：许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沿袭此法，解放后也未将它丢弃。但是，直到六十年代，这样的学习方法才与政治教条紧密联系起来，并以如此形式主义的方式出现。

向雷锋学习的运动比其他一切号召都更加刺激了“好人好事”的产生。在日记里，雷锋记叙了他有意找机会做下的桩桩好事；这些好事，都被他当成了为人民服务的途径。在火车上，他经常以一名普通乘客的身份，扫地，擦车窗，或为其他乘客送水。下面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叙述了当其他

战友都去看电影的时候，他如何度过星期天：

今天是星期天。我没有出去。我为排里的同志洗了五套床单，替一位战友补好了毯子，还帮着炊事员洗了六百棵洋白菜，打扫了宿舍内外，还干了许多其他零活……总之，我做了一个战士应当做的一切。虽然有点累，但我很高兴。同志们都很惊异：谁把我的床单洗得这么干净？另一个同志惊讶地问：“谁把我的破毯子拿走了？”他不知道我已经替他缝好了。我感到做一个无名英雄是最大的光荣。从今以后我还要做更多这样的小事，少说些漂亮话。

雷锋的死决非壮烈之举：一辆卡车在倒车时把他压在了轮下。他只是一个平平凡凡但却鞠躬尽瘁、尽了他最大努力的普通人。但正是他所做的一系列好事，有些人认为很微不足道的，却被当成了革命事业必不可少的基石。他甚至从未想到过要成为什么带头人或引人注目的英雄人物，默默无闻地生活，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教导，仅如此做他已经感到了极大的幸福与满足。他要为革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永远随着齿轮转动的锯齿。他曾这样谈到一颗小小螺丝钉所能做出的贡献：

个人在革命事业中所起的作用好比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有了这些紧密团结、毫不动摇的螺丝钉，机器才能够轻快地运转，发挥它的巨大威力。螺丝钉虽小，用处却很大，我愿做一颗螺丝钉。

总之，党和毛主席所需要的理想社会主义者，正是这种具有大公无私的牺牲精神、甘愿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埋头苦干的人。在六十年代，党就开始推出这种宣传主调。当时，正值好工作越来越难找，而毕业生人数却大大增加。对于大多数中国城市青年来说，找到好工作的可能性很小，领导人鉴于这种情况，大力开展向雷锋学习的运动，旨在缩小期望和减少失望；这个运动的意义之一，就是宣扬做一个平凡的锯齿、从事普通的体力劳动是多么“光荣”。

雷锋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涌现出来的模范人物里最突出的一个。在一本影响十分广泛的青少年读物里，同类型的其他英雄也得到了逐一的介绍。书里介绍的十一位英雄人物都和雷锋一样，出身于穷困的劳动人民家庭，出生后没几年，全国就解放了。他们的阶级立场全都十分坚定：对共产党、毛主席充满感激之情；愿意完全彻底地献身革命。其中四人是解放军战士，但其他七人差不多都是普通工人。他们工作起来都极为努力，忠于职守，并为自己能够很好地履行责任而感到由衷的骄傲与自豪。他们十分自信，决心克服一切物质上的困难，不因自己是体力劳动者而觉得任何懊丧与羞耻。（只有一个模范人物，一位妇女，据称曾产生过怀疑和自卑情绪。）他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学习毛主席著作，并不断督促自己提高无产阶级觉悟。继雷锋之后出现的英雄模范人物全都以他为榜样，和他一样，都是光荣的螺丝钉。

学校里，包括大学，开展起了轰轰烈烈的运动，要求学生们向雷锋同志学习，充当无名英雄，通过从事平凡琐细的

劳动达到做好事的目的。但具有讽刺意味同时也无可避免的是：这种劳动很快因学生们的相互竞争而受到了歪曲。学生们一心一意想入团，然后借此升入大学，而雷锋所做的好事恰好提供了具体可行的准则，团员们正是依据这些准则来评判那些渴望成为团员的申请人的政治表现的。写日记，将日记传阅——尤其是要拿给团员们审阅——以供大家进行公开的批评，成为显示积极的一条重要途径；偷着帮助班里同学缝补、洗濯衣服和床单，默默无闻地擦玻璃、扫地，也可起到同样的作用。青少年积极分子常常不得不绞尽脑汁，想出种种新花样来超过竞争对手。他们争着琢磨做什么样的无名好事才有可能被同学发现。学习雷锋分明意味着迫使青年人比以往更加热诚地投入到积极做好事的活动中去，不管心里怀着何种动机。

对于那些聚集了来自全市各区的学生、声名很大的寄宿学校来说，以上描写的情况尤其真实。那里的学生一天到晚都处于彼此的监督之下，总是置身于竞争的气氛中。据一些人回忆，在“向雷锋同志学习”运动的压力下，出现了很多人投机取巧、让人哭笑不得的把戏。比如，“一天晚上，大概都十点钟了，所有的人都在宿舍里，一个学生装做睡着了，突然高喊：毛主席万岁！”这是为了证明他的阶级感情是如此之深，竟至在梦里还念念不忘对毛主席的热爱。

因急于给团员留下良好印象，避免别人批评自己落后和缺乏集体观念，学生们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十分小心在意。我是不是把该换洗的衣服收起来，免得让班里同学“偷偷地”拿走替我洗了呢？我该在我的“私人”日记里

写些什么呢？在忆苦会上我该不该大声哭出来呢？为了表现积极，我是不是必得有意避免从餐桌上的大锅里舀上一片肉呢？下次和负责帮助我的团员谈心，我该谈多少心里话呢？——青年人觉得他们被逼上了一个舞台，必须时刻不停地进行表演。有些人觉得他们的诚实因此受到了挑战。他们都确信自己的虔诚；但与此同时，他们无法驱除那种负罪感，即：当他们表现十分积极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在追逐个人利益，是虚伪的。

于是，在那些更富反抗精神的学生中间，逐渐滋生出一种欲望，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清除这些卑下的装腔作势，做出一些违反常规但却真诚可喜的事情来。我对之进行调查的几个学生有一天终于鼓起了勇气，打破了团支部立下的“革命”行为的准则。其中一个学生大胆地在教室里贴了一张大字报，宣扬说不见得只有重复雷锋做过的那些细枝末节的事才能成为革命者，还有远为重要的大事等着人们去做。另一个学生，在期末考试前夕，带着一伙同学爬到山上，在那里背诵诗歌，观看日出，消磨了整整一夜时光。这些学生都希望彻底摒弃教室里那种小仁小义的积极表现，他们想用真诚、光荣而浪漫的方式来说明自己的忠贞，但却不知从何做起。他们不时流露出来的固执而不合群的举止，引起了班里的骚动，召来了团支部的批评。很显然，他们的入团问题碰上了困难。

13、英雄人物与死亡主题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英雄模范身上，有一种最能吸引和诱发这些青年的想象力的品质，那就是他们毫不犹豫地情愿光荣牺牲。虽然这里不是前沿阵地，让他们有机会证明自己的忠诚，英雄故事里却反复强调说这些英雄人物时刻准备以身殉职，为革命事业和人民群众献出宝贵的生命；而且大多数这样的模范也的的确确牺牲在了他们日常劳动的岗位上。上面提到的十一位模范人物中，九个都是年仅二十余岁就在水灾、火灾中因抢救同志或国家财产死去的，他们是甘冒生命危险的。雷锋是极少数死于事故的英雄人物。不过，这个事实也正说明了在有生之年做出的贡献已足以奠定英雄的称号，不一定非得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要你心甘情愿地做螺丝钉，你就有可能成为雷锋那样的英雄。

话虽如此说，死亡主题仍是刻划英雄人物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调查过的许多学生，虽然正当风华正茂的年龄，却都对“死”考虑过不止一回。而人们本来还以为，在当时和平的经济建设时期，仅提倡大公无私的艰苦劳动本身，已经满可以起到号召人民群众献身革命的作用了。因为不管怎样，在这种和平年代，一个人终其一生，又能碰上几次大灾大难和必得献出生命的机会呢？但是某些人们显然觉得仅凭那些平凡单调的事例来教育群众是不够的。于是便不断出现诸如此类的报道，描述普通的人是怎样跃入熊熊火海，或投

向滔滔洪流，来保护或抢救集体财产，借着一死成为英雄。

下面是一个描述英雄之死的十分典型的例子，记叙了两个好朋友在装满汽油的卡车着火时，为阻止火焰向四周工厂蔓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小郎比小韩提前一步赶到。只见卡车已变成一片火海。卡车后面装的汽油全都着火了，只有六七罐还没烧起来。做为共产党员，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紧紧连着他们的心；眼看着一桶桶汽油烧成这个样子，他们无比心疼！… …两个青年工人只相互交换了一眼，就毫不犹豫、齐心协力地冲上前去。小郎用手一撑，再一个腾跃，跳上了卡车，抓住油桶滚烫的边缘，用尽全身力气将油桶推下车去；小韩在卡车的另一面，他刚刚翻进车斗，就听一声巨响，卡车爆炸了……

这就是死的方式。一个人应该生为人民生，死为人民死。既然人总不免一死，那为什么不献身革命，死得更有意义一些呢？我调查的一些学生就是实实在在持这种观点的。比如说区吧，她初中毕业奔赴农村扎根的时候，是这样看待死的：

对于英雄模范来说，死根本算不了什么。要是到了必要的时候，我想我也能做到这一点：象死于灭火啦，死于防洪啦，为救人或修补大堤而死啦，等等。死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降临，就连拉板车说不定也有危险呢！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小车一翻，就能把人压在下面。所以就得活着

干，死了算；趁活着拼命干。不惜一切代价。实际上，当时不正是这么回事吗？你得活到老，干到老，甚至不惜将出生命。“为了革命拉车”，这就是那时灌输给人们的思想，还有什么“小车不倒只管推”。要是你决心把自己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你就得干。如果需要，就献出生命，反正到最后也是个死……那时候我真傻，有一次着火了，我这么个女孩子居然一直爬到了屋顶上。大火把屋瓦都烧着了，屋顶已经开始塌落，只剩下大梁和椽子还没毁。我却不管三七二十一爬了上去！现在想起来危险极了，可爬的那功夫我根本没意识到“危险”二字。我的心是红的，你要知道，一心只想当英雄，这就是当时的心理状态。还有保护防洪大坝的情景也十分壮烈。小伙子们都跳入水中，手拉手形成一堵人墙堵住缺口。再有台风袭击之前，我们到田里抢收麦子，要不然庄稼就可能全部糟蹋掉。这是另外一种壮烈场面了，从头到尾跟打仗没什么区别。

总而言之，向人们头脑中灌输这种死亡哲学的主要目的，还在于非常自然地据此推论出生之哲学：对死的恐怖轻描淡写，而对死亡的社会价值则极力夸大，那么生命对于个人来说就不再是一种私有物了。连死亡都丧失了其中的个人因素，那么生命当然也可如此。具有这种死亡观的人会更容易地服从集体精神和集体意志。有趣的是，我们倒要看看，其他三位被调查的学生到了后来是如何看待这种生与死的哲学的。

14、英雄人物与个人主义

除了前面所讲的那两种充当青少年楷模的英雄之外，青年杂志和读物还推出了第三类英雄：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从中国历史上的名人，直到伟大的外国科学家、军事家、理论家和同时代的革命者，都包括在内。其中，毛主席是最受青年人尊敬的。有关这些英雄的故事经常强调他们的个人才能，强调他们的机智与勇敢。因此，在前两种英雄人物——战斗英雄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英雄——与这类英雄人物之间存在着一种决定性的差异，即：后者凭借着他们的个人品质与人格力量，推动了历史的车轮。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没有被中国当局规定为学习的对象。就拿毛主席来说吧。他是以慈祥的父亲的面目出现在人民面前的；在对他的狂热崇拜里，他被称作“伟大领袖”、“舵手”和“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但是从来没有被当做向之看齐的典范。

这样，鼓励青少年追求个人成功就为鼓励他们追求个人利益提供了余地，而“个人英雄主义”在党的教育里是尤遭嫌忌的，官方提倡的英雄主义乃是要求人们投入到集体中去。与之密切相关但大家全都心照不宣的事实是：那些伟大的英雄，特别是革命英雄如毛主席这样的人物，都是因为他们通过反传统的、甚至从根本上来说是叛逆的行为推翻了现存的制度，才成全了他们的伟大的。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种创造性和叛逆性是绝对不受欢迎的。此刻，“革命”二字

意味着循规蹈矩，克服一切不合潮流的个人想法，把自己彻底献给党和毛主席，心甘情愿地过一种平凡、普通、按部就班、埋头苦干的生活。“革命”成了反叛的反义词。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对毛主席只能崇敬，不能效仿与学习。

但是，有些青年人通过个人阅读，的确走上了效法伟大的历史英雄的道路。几个接受调查的学生，恰好选中了毛泽东青年时代富于叛逆精神的形象，为自己的个人主义和献身革命进行辩护。一个青年人选择的偶象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他对于标准政治行为规范的态度。处处向雷锋看齐会被当做“表现积极”，但是公开效仿青年时期的毛泽东身上的某些叛逆方面就会导致与学校里正确行为的仲裁者——团员们发生矛盾。

在我所调查的学生当中，有些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直与对革命的忠诚远远高于那些纠缠于鸡毛蒜皮的小事的积极分子，有意模仿毛主席年青时加诸自己的严苛的体质锻炼。他们的锻炼程序要求他们必须具备十分坚强的意志和毅力，从而树立起一种与众不同的形象，显得他们比其他同学，尤其是团员们，都更能吃苦耐劳，也更加真诚。他们自认为这种对意志的磨炼是为将来的某个艰巨时刻做准备的：当那一刻到来时，他们可以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而不是象雷锋似的仅仅做人家手里的“驯服工具”，一颗小小的螺丝钉。文化大革命很快就能给他们提供这么一个盼望已久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大展宏图。暴力与死的冒险，对于他们来说将成为一次解放的经验。

区、白、张、邓四人，各自以他们不同的方式，为服从

集体、献身革命、做英雄和壮烈牺牲这些问题感到过深深的苦恼与矛盾。从下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得知他们都分别崇拜什么样的英雄，效仿英雄身上的哪种品质，又是为了什么这样做，这将是十分有趣的。

15、区：顺从的青少年积极分子

如我们所知，区十二岁从小学毕业时，是非常驯服的；她真心献身革命，政治上是积极分子，无论和同辈人还是和家庭都很疏远，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后来虽年龄增长，但区依然是区：她的思想、性情与志愿都没有改变。她是学生干部，自然得比别人更加积极。她的弱点也仍然存在，但她已经开始十分清醒地做出种种努力，培养自己克服缺点战胜困难的能力。

还和在小学时一样，区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远远超过了大部分其他同学。她所在的那所市郊中学被许多人认为是相当不错的学校，但区却心高气傲，觉得这只是一所三流中学，不能满足她的水平。在区的班里，百分之四十的学生来自农民家庭，还有百分之四十是工人家庭出身：中等阶层人家的子弟虽然少，但最好的学生里有一多半却还是他们。

1964年以前，在推选班干部的时候，优异的学习成绩仍然是比好的阶级背景更为重要的因素，所以区的政治地位没有受到任何挑战。她既驯服听话，又表现积极，再度深受老师宠爱。但由于她和同学疏远，她又一次落选班长，做了学

习委员。她把全部热诚，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帮助同学提高学生成绩当中去。她花时间帮落后学生补习功课；她制作小卡片，促进同学们的俄语学习，因为俄语是所有课程里最难学也最不受欢迎的。她甚至把男女同学们都组织起来，一起去探望生病的同学。对此她感到特别骄傲，因为在中国的中学里，异性学生很少彼此说话，就更不用说为了显示集体精神，凑在一块儿去看望有病的同学了。

区继续怀着极大热情阅读革命小说，并一丝不苟地按照青年杂志里的话去做。“那些话自有它们吸引人的一面：比如制定行动计划，谈论学校里的活动，谈论青年人应该下乡锻炼自己和怎样做个好学生。”她之所以要读杂志，就是为了寻找满意的答案，了解什么才是最正当的积极表现。她从不问“为何”；她最关心的是“如何”——如何尽她的最大努力达到规定的标准。

她对于跟上国家的政治潮流不感兴趣。如果偶而读报，那是为了作业需要，或是为了满足政治课老师的一点小小要求。归根结底，她说，“在政治考试时你用不着对时事政治了如指掌就能答出那些题目。”对她来说，最关键的是知道在政治上应该如何去做，而不觉得非知道政策的内容。

在初中，政治课并不比其他科目重要，政治考试拿高分也不一定意味着表现积极。在对成绩方面的声望十分重视的学校，校领导甚至鼓励学生不惜牺牲政治课的学习来把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到其他课程上。在有些学校里，学生们是把政治课贬低到与音乐课和体育课同等的地位。我所调查的学生们一般来说都认为这一科目很容易通过。只要记住老师所讲

的内容，读几篇指定的文章，再背几个日期，到考试的时候用合适的文字把它们反馈出来就行了。

虽然对政治不感兴趣，区却绝对信任党，信任毛主席，并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存半点怀疑。她心甘情愿地（尽管不免经过一番内心斗争）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象我们已经看到的，她早已打好了十分浪漫的念头：如果一旦出现为国牺牲的机会，她要义无反顾地冲上去，就和她读到的那些英雄人物一样。

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有意培养自己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区确实这样做了，但是遇到了困难：部分原因是由于她非常羞愧地意识到她不是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她在参加忆苦思甜会或扮演悲剧角色时根本哭不出来，这使她受到很大震动。如今，她这样回忆因自己哭不出来而感到的强大的社会压力和自身无休无尽的苦恼：

我怎么能在哭不出来的时候硬哭呢？那时我在一个宣传队里演出。眼泪就是流不下来。别人就会因为这个批评你，说你缺乏阶级感情，虽然当时不过是在演戏。我自己也很生自己的气。我觉得我缺乏阶级感情大概是受了父亲的影响吧。

长大一些后，她明白自己为什么哭不出来了：

过去受压迫阶级受的苦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又不是我的父母或祖父。毛主席是对的：我缺乏那种阶级感

情。

问：你的那些出身“好”的同学怎么样呢？他们哭不哭？

答：哭不哭不是关键。他们受到了感动。要是没有共产党，他们可能还在受苦呢。而我们是没有这种顾虑的，所以我们也就不那么在意。的确非常有关系——我是说——这个“阶级感情”！

区在培养“无产阶级感情”时也许确实遇上了困难，但她和父母划清界线时却十分轻易。她想尽办法要清除这种政治上的“原罪”，她把它当成自己缺乏阶级感情的根源。还在孩提时代，她就为自己有这样的父母感到耻辱；上初中以后，她对他们更为蔑视。她几乎不和他们讲话，在做什么重大决定的时候也不征求他们的意见。在入团申请会上，当着几十位同学的面，她斩钉截铁地与父母划清了阶级界线。她公开宣布：从今以后不但不许他们腐蚀自己的思想，相反，还要帮助他们改造灵魂。

区没有和地主、资本家直接打过交道，但她与其他接受调查的中等阶层出身的学生一样，对他们怀有千真万确的恐惧。这种针对“黑五类分子”产生的阶级仇恨受到政府的鼓励：区自己也竭力培养这种仇恨。区第一次面对面地接触这些人是在她初中毕业后到农村落户的时候。村里的地富反坏分子全被召集起来，站成一排，供新来的学生们仔细辨明，使他们在今后的生活中不致认错发泄仇恨的对象。在那几年里，区对待他们的态度是轻蔑掺杂着恐惧。

为了公开表示阶级立场，区和其他许多学生都避免和出

身不好的同学过于接近。区十分清楚她自己是缺乏“无产阶级感情”的，她由此推断那些家庭出身还不如她的学生很有可能对政府怀有敌意。她和其他团员在这些学生的入团问题上异常苛刻。与此同时却极力接近出身好的同学，以求加入他们的阶层。小学里，对于孩子们来说无关紧要的出身问题，到了初中已经引起每个人的的关注了。

区在努力培养无产阶级世界观时面临的最大考验，就在于她一直采取屈尊和施恩态度来对待工农家庭出身的同学；这些学生一般来说学习成绩都不算好，也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在理智上她相信党的教育，认为工人农民是最革命的阶级，是他们创造了历史，并维持着这个世界，他们的子弟自然具备父辈的美德。但在感情上她无法接受这些理论。她从小深受家庭影响，同时学校也不断强调应该取得优秀的学习成绩，所以她仍然梦想着将来做个专家之类的人物。她推理说她对于工人农民所能做的贡献就是“帮助他们提高认识”，这是她根据个人看法对党的路线所做的一种施恩性质的错误理解。

对于区这样一个心怀抱负的信徒来说，仅仅表现积极已经不够了。上初二那一年，在老师的鼓励下，她申请加入团组织。她谈到她的理由：

入团是光荣的，受人尊敬的，如果你是团员或者党员，你就有许多获得权力的机会。没有权力能干什么呢？你怎么能单枪匹马地取得成功呢？我想做一名革命接班人，也就是说，当干部，但是要没有这些政治资历的话，

你怎么能出人头地呢？但我并不全是为了名利。我的解释是：如果身为组织的一员，我就能在这个组织之内工作。在国外你事事全靠自己，入团之后就有了靠山了。团结就是力量，你可以和大家一起工作。团员时常开会，听取指示，还有互相讨论的机会。

获得权力地位是区迫切希望入团的最主要的动力，她十分明白这一点，因此也就首先提出这一点。为了替自己辩护，她小心翼翼地补充了两点理由：1、团结就是力量；2、入团是为了更有效地工作。但是，她对中国意识形态最为重视的目的——“为人民服务”——却闭口不谈。在她眼里，本来应该是手段的倒成了最终目标。我不是想暗示她对“为人民服务”不感兴趣；但忘记提到这个目的可决不仅仅是由于口误。好几次她被问到同样的问题，每次名与权都被放在首位。政府的权威能够有效地弥补个人的弱点，区对它有很强的依赖性。如果能成为现存政权的一份子，她也就得以分享它所带来的一份权力，为了这一点，她愿献身于这个组织。

区的最终目的是成为“革命接班人，也就是说，当干部”。一个中国青年对“革命接班人”这几个字的解释足以说明他对于权力和现存政权的态度。从语意上分析，“革命接班人”这一术语可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般来讲，人们普遍认为它意味着新一代接过老一辈的班继续干革命。除了区和白，我所调查的学生中没有一个是把获得权力与地位当做它定义的一部分的。事实上，当我问到他们对这五个字作何

解释时，他们全都甚感惊异，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术语原是极简单易懂的哩。

区对这几个字的看法，说白了就是“当干部”，表明“革命接班人”在现存政治机构中是既有权力又有地位的。而区的理解比起大家公认的解释反而更为接近毛主席在1964年提出的官方定义。在对党的干部所做的指示中，毛主席对“革命接班人”特别提出了五项要求：

- 1、必须锻炼成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 2、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大多数和世界人民大多数服务的革命者。
- 3、必须学会团结大多数，和大多数一起并肩工作。不仅要团结赞成他们的人，也要善于团结反对他们的人。
- 4、必须学会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掌握好的工作方法，听取群众的意见。
- 5、必须谦虚谨慎，防止骄傲自满。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有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和缺点的勇气。不能掩盖错误，把功劳全归于自己，把责任全推给别人。

第一条和第二条都是泛泛而谈，凡是尽心尽责的普通人都一般都能做到。大多数接受调查的学生都误会了“革命接班人”的真正意义：他们把重点放在这头两条上，认为这是与他们心目中真正的积极表现相符合的。而区却恰恰相反，她对于“革命接班人”的理解来自毛主席的后三条要求。虽然那时还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她已经学会从一个富于进取

心的干部的角度上看问题了。“干部”与“群众”是不相容的实体：一旦当上干部，你就不再是群众中的一员了；从此以后你的任务就是朝着“引导”和“团结群众”的方向努力。这正是区交付自己的使命。

区知道自己的弱点。她非常自觉地做出种种积极努力来克服自己的缺点，严格要求自己，虽然并不总是成功。在所有接受调查的学生里，她是唯一一个从初中起就开始严肃认真地锻炼自己的人。

当她提出入团申请后，她对自己要求更严了。因为当时班里还没有团员，她选中两位老师做她的入团介绍人，按时向他们交“思想汇报”。比起谈心来，她更喜欢这种方式，因为她说她受不了他们面对面地批评自己，她是一直习惯于只听表扬的。不过她对于她的两位介绍人十分信任，还是诚恳地就自己的问题与苦恼和他们进行了交谈。

我谈到我最近的表现，我无法解决的问题，我的苦恼，我的无法与同学合作，还谈到我做为学习委员，没能成功地开展工作，一些学生考试不及格，我觉得我得对此负 责任。还谈到我怎样觉得骄傲自满，没有听取老师的 意见，结果惹得老师生气，以及我没有尽到职责，等等，等 等，

问：你们没谈过更理论化、政治意味更强的东西吗？

答：没有。我这人很实际。我十分操心我能做到些什么，我没做到什么，总在考虑这些问题，总在不停地衡量——用尺子仔细地衡量。

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区对自己实行的严格要求主要牵涉到行为的正确与否，例如处好与老师同学的关系。她知道在同学的眼中她是老师的“走狗”。她把充当自己入团介绍人的两位老师当成唯一的朋友。尽管她发誓要和同学们搞好关系，她的竞争心，她要超过他们的欲望，都使她交不到朋友。她屡次十分轻蔑地谈到同学里的那些积极分子，她认为那是和她竞争的人。

她记日记，但不是雷锋式日记。如她自己所说（说时她微露窘色），日记是非“无产阶级化”的，里面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她的日记成了她最亲密的伙伴，她在日记里写下自己的各种思想感情。班里没有可以信任的朋友，和家庭又关系疏远，记日记成了她发泄个人情感的唯一方式。有两次她把日记拿给她的入团介绍人看，因为她相信如果更深入地了解她，她们就可以更好地指导她。这固然反映了她性格中坦率的一面，但她也承认，她的举动“有些不诚实”。她的日记里既记下了她最隐秘的思想，也记下了她所做的一切好事。她觉得说不定有一天她的介绍人会读到它的。

她渴望做个循规蹈矩的学生，总是担心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和当局的赞许，这使她成日忧心忡忡，经常受到自我怀疑的折磨。她加强自我修养，主要是压制她的各种自发行为。不过这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的。在强大道德力量的冲击下，她迫使自己克服自身不高尚的一面，她的行为变得反覆无常。她的热情或冷淡，慷慨或自私，坦率直白或斤斤计较，宽容或嫉妒，谦虚或骄傲，都要看她自我控制的程度如何。道德

教育一开始使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弱点，继而就要求她自觉地去克服了。但在做这种努力时，她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为那些成功地压抑了自己弱点的人精心设计的奖励制度只不过起到了使弱点抬头的作用：因为当她为了自己的热情善良受到表扬时，她目空一切的意识更加增强了；她的宽容待人总是为了维持她那么嫉妒别人来争夺的特殊地位；她的谦虚换来的夸奖激起了她的骄傲之心。象区这样迫切希望受到奖励的人被这个制度自身的矛盾羁绊住了。

正当区为了这些天天都有、没完没了的思想斗争而苦恼不休的时候，她碰上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个大难题：到底是自愿申请扎根农村呢，还是继续升学深造？前者是很光荣的选择，而且可以使她因有机会表现对革命的忠心而获得满足；后者则是她一直视为理所当然的出路，但却会给她带来“假积极分子”的坏名声。区颇有些进退两难了。

在1963到1964年间，政府准备派送大批青年人去扎根农村，其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以往。每到学年末，校领导都要动员应届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志愿申请扎根农村。当时有一句口号：“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或是准备下乡，或是准备继续接受更高等的教育。这句口号并没有流露政府的偏好，但实际上，继续升学仍是最优选择。学校就这件事是这么说的：“努力学习。多学知识，将来就可以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但如没能升学，也不要灰心。到祖国最需要你的地方去，到农村去，在那里同样可以做贡献，而且更光荣。”可是，不管那些志愿下乡的人能获得多少荣誉，含义都是十分明确的：这仍是第二选择。

上级加强了动员学生接受第二选择的努力。他们被要求写保证书。于是，宣布他们愿去农村与否便成了中学生们，尤其是那些已决意考大学的学生们的一个最大的矛盾。对于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来说，思想上的负担相对要轻一些，因为他们对升学把握更大。必须清醒严肃地面对这个选择的学生，是成绩中等和家庭出身不好的那些青年人，他们知道自己升学的希望渺茫。不过，每个人都有失败的可能。我所调查的学生里，虽然大多数人都学得不错，但确实做到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尽管他们很希望上大学，他们表示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也愿意扎根农村，锻炼自己，同时也为祖国的发展做贡献。

动员班里同学志愿申请下乡成了团支部的主要任务。区做为学校里最突出的积极分子之一，很出色地执行了自己的任务。她安排那些已经下乡的前几届毕业生回母校做报告；她还亲自去农村了解知识青年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能做出的贡献，然后回到学校汇报她的观察所得。她带头当着全校师生庄严宣誓，志愿献身农村。后来和区一起奔赴农村的一个男同学回忆说，同学们都觉得她慷慨激昂的宣言极有说服力。他自己是怀着激情去的，这和区积极热情的演说不无关系。

但是区对下乡的真实态度是什么呢？

问：你是不是觉得你必须去？

答：实际上我是考虑要去的。既然下乡是光荣的，我干嘛要害怕呢？我就是这么想的。

问：你真觉得你会去吗？

答：实际上我心里觉得我能够升入高中。

问：这么说来，你还是认为你是不必非得去的？

答：嗯，如果我没能去成的话。要是我不能升高中，我就准备下乡。不过那时我以为我是肯定能升高中的……

但是她没有通过。当老师把这个坏消息平静地告诉她时点，她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由于过份自负，她犯了一个战术上的大错误：毕业生只允许报考四所学校，区又只报考了市里最好的四所，而这四所好学校是唯出身最红或最为出类拔萃的学生才敢于报名的（在我所调查的大多数学生里，其中颇有几位在学习上大概比区还要出色的，连他们都没有这个勇气，报考那四个学校的任何一所）。但直到如今，区仍拒绝相信她的判断失误是她失败的原因。相反，她宁愿幻想她是因为家庭背景才名落孙山的；这是个既不丢面子又减轻自责的借口，使她不致认为她的失败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最后，区还是申请扎根农村了。她去农村并不是因为别无选择。她本来可以和许多人一样留在城里，第二年再考的。但她违背父母的愿望，没有这么做。她用中国的一句成语形容自己的处境：“骑虎难下”。她已经那么诚恳地立下了做好“两种准备”的保证，又那么积极地说服别人也发了同样的誓言，现在如果反悔，就难免落下个“假积极”的名声，贻笑于他人。她感到她必须使自己“踏过这道艰难的门槛”，维护她的积极分子形象。她再次——这次是以失败典

型的身份号召其他落榜者——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宣布了自己的决定。

我说话时声音很平静，不带多少感情。归根结底，这不是件十分光荣的事情。我心里觉得很不舒服。我怎么会失败的呢？我的分数一直这么高。我还是团员，当时到底能有几个团员？……我的心已经罩上了一层阴影。

毕业班一百多个没考上高中的学生里，只有十二人申请扎根农村；区是其中唯一的团员。她渐渐安于自己的处境，说服自己相信在农村也照样能够获得特殊的荣誉。而且，做为唯一的团员，她还承担下了照顾那些非团员的责任。她决心干一番事业，“一方面为农村建设做工作，一方面也为自己挣得光荣。”事实上，在志愿去农村的申请人里有三个学生比区享受更大的光荣，他们是只有“一颗红心，一种准备”的，和区不同，他们都考上了高中。

在离开的那一天，为他们组织了场面很大的送行。全校师生在喧天的锣鼓声中来为这些十六岁的孩子们送别。区在回忆他们充满了浪漫主义、理想主义但不知怎么又有些复杂的感情时说：

在火车上，我们一边流泪，一边唱歌，
“在晴朗可爱的春天的早晨，
列车把年轻的朋友推向远方，
为了把我们亲爱的祖国，
建设成美好的人间天堂。”

我们大家一路唱，一路哭。不管怎么说，以前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家。而且，谁知道前头等待我们的又是什么？火车开动的时候，我的心也微微颤动了一下。我的眼眶湿润了，但我知道责任重大。做为同行者里唯一的团员，我得照料大家。见他们都在哭泣，我便带头唱起歌来活跃气氛。

16、白：有纯正癖的青少年积极分子

白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积极分子。他是直到上了高中、入了团以后，才得到“积极分子”这个称号的。但如我们所知，白在童年时代就表现出了积极分子的征兆。所有那些区有意培养但只获得有限成功的品质——对党的感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集体的团结一致，对集体生活与劳动的热爱——都是潜移默化在白的性格里的，虽然他还只不过是个少年。但是，从党的标准来看，仅有这些品质远远不够。它们是“自发的”和“无意识的”，如果得不到正确引导，变不成“自觉的”积极行动，就很容易蜕化变质。若要研究一位仅有积极思想倾向的男孩子如何成长为“有觉悟的社会主义青年”，白提供了很好的例子。

1956年，他升入中学。那所学校并不很好，主要因为它刚成立，学生们甚至不得不在开学后的头几个月帮着结束教学楼的施工。学校成立时间太短，规章制度不够完善，学生的水平也都在中等以下，教室里经常一片混乱。在这种粗暴

野蛮的环境当中，白很快学会了打架。到上初二时，他已经赢得班上打架能手之一的名声了。他若口袋里不装满弹丸，是决不冒险出校门一步的。

对于他这种年龄的男孩子来说，打斗是家常便饭。不过，白虽然很为自己那些早熟的业绩感到得意，但还是立刻又告诉我他决非扰乱社会的捣蛋分子。他有声有色的讲述他那充满了打架拼斗的初中生涯，每一架都细细讲来，不漏过一拳一脚，同时每一架都附带上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到最后，他精疲力竭的听众就自然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甚至还在那么小的时候，他就已有着很强的正义感了。从他的叙述中得知，他很少寻衅闹事。他打架或是为了保护弱者，或是因坏名声很响的强敌向他挑战被逼无奈所为。他的对手都被描述成招人嫌的、专门调皮捣蛋的顽童。他不得不时常为了打架做公开的检讨，但他的形象并未因此受到损害。

在那些年里，白还表现出了另外一种品质，即很强的责任心。大家既已承认他具有劳动能力和积极性，就选他做班里的劳动委员。随着1958年“勤工俭学”运动的开展，白所在的班参加了一项校内竞赛，内容是通过繁殖一种细菌来生产氮肥：

所有的班都得干这件事。但其他班的学生都很懒，没有把化学药品按适当的剂量调配好并搅拌均匀。你可以想象一下，到底能有几个人愿意揽那种麻烦。但我特别严格。我一边指挥同学们，一边亲自用手来搅拌药品，因为用棍子拌药效果不够好。不知怎么，同学们都很听我的话，

也开始下手搅拌。我走来走去，发号施令，要眼看着大家给药品配好水。自来水里面有氯，能把细菌杀死，所以我坚持让大家用井水。我把全班分成若干小组，每一小组由一个男生一个女生组成，免得大家嘻嘻哈哈地不认真。后来我们繁殖的细菌被拿到全市展览。啊，那实在是棒极了！

在上初中的最后一年，他又显现出一种新的品质，即：具有很强的自制力。在中学，他不仅学会了打架，还变得满口脏话，差不多一开口就吐脏字。可是，受到1959年有关恢复社会法制秩序的“安全教育运动”的影响，他下决心要开始新生活。他克制自己，甚至在别人挑战时也不还手；而且，他还当着全班发誓，“从今以后决不再骂街”。还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足足有两星期他没敢说话，迫不得已开口的时候，他就一字一字往外吐。

不过，他没有什么政治“觉悟”。他对政治课不感兴趣，觉得这门课“枯燥”、“空洞”，他只是贪婪地一心阅读革命题材的小说。因为家里太穷，买不起书，他就趁每天午休之际，跑过马路，到学校对面的书店里站着看。他崇敬党，崇敬毛主席，无比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是这种热爱就象他今天所说的那样，不过是“一种自发性质的爱，没有经过头脑的思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冲动与感情”。

他尊敬共青团组织，把它当成抽象的存在。但和他的许多同学一样，他无心入团，因为班里唯一的一个团员被看做班里最大的“马屁精”。

在父亲的影响下，白渐渐地视上大学为十分自然的事

情。他想做一名中医，或者当个伟大的科学家。等到了该考虑入何种高中的时候，他只报考了那些提供普通教育的学校，对上职业高中的可能性没有多加考虑。显然他考得不错，因为他进了广东较好的学校之一，并被安排在一个重点班里：这是全校闻名的模范班集体，班里学生都是为“培养国家人才”特意选拔出来的。在新学年开始之际，校长亲自向这个班致辞，表达了对他们寄予的厚望。

白所在的班里，党员干部的孩子占学生总数的一半。无论从学习成绩上看，还是从政治思想上看，这个班都是非常先进的。班里共有八个团员，其中七个是干部子女。从开学第一天起，团员人数就已足够组成一个团支部了；也有足够的积极分子，在教室里形成积极向上的气氛。白对于身边进行的政治活动却不甚留意，他只关心如何才能搞好学习。不过，学期开始不久，就赶上全校师生帮助修建火车站，白因他的劳动热情与能力初露头角，很快吸引了班里团支部的注意。他成了“团员发展对象”。团员们奉命“接近”他，“了解”他。他们请他参加他们的活动，不断征求他的意见。他们还暗示他申请入团，后来，索性正式向他提出了这种要求。

最初白颇为摇摆不定。在五十年代后期，进大学还不象后来那么困难，因为那时高中毕业生的人数还没有增加。差不多所有的高中毕业生都可以在大学里获得一席之地，所以，学生们也就用不着为了个人目的而申请入团。白由于初中时的经验，对于团员仍怀有反感，团支部让他旁观“组织生活”也没有改变他的观点。事实上，他是看到了团员们所

受的严格要求才动心的：“就好象你每走一步都有人在评判你似的。”他最怕的是团里的各项活动会影响学习。他不象区，区把和政权有关的一切都看成是光荣的，自己也迫切希望分享那种光荣；白则不同，他最终同意入团是为了与政治觉悟得到提高毫不相干的理由：“上高中的头一年，我生病住了院。我一个人在医院里待着烦透了。哇，整个团支部成员都来看我，把我高兴坏了。他们对我那么好，我于是提出了入团申请。”

是集体的同志情谊深深地吸引了白。他提出申请之后，团支部给他指定了两位入团介绍人，通过他们，他改变了对团员所持的成见。他们对他的关心，他们为追求个人美德所做的种种努力，把他和团组织拉得更近了。不象区那样不愿赞扬她的同学，白提到两位入团介绍人时是把他们当成他思想上的引导者。他和他们保持着长期的友谊：

他们对我有很大影响。他们在我身上留下了很好的政治烙印。这是因为他们能做到言传身教。那种革命精神！我们甚至在大学里还保持联系，他们的信都充满了非常纯洁健康的政治热情。我把所有的信都留了下来，还在一些道德箴言下划了红杠杠，读它们时就跟读毛主席选集似的。啊，他们的思想才真叫健康！

正是由于这两位介绍人的影响，他才算严肃认真地开始具有“政治觉悟”了。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对于他来说真好象一次宗教信仰的皈依。那是一次新生，一种新的召唤：

入团以后，我的大目标是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我期望通过这个来更好地跟上党的步伐。因为接触到那些团员们，我懂得了许多事情，比如说应该怎样对待生活。人为什么活着？这成了一个具体现实的问题，引起我对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疾病以及遇到困难时怎么办这一系列问题的重新思考。生活更充实，更有意义了——不象从前，生活没有个目标。现在，不管我做什么，我都要考虑再三，或者找到有关书籍，看我该如何解决碰上的问题……我开始运用政治知识指导自己的行为，并自觉地学习新知识，象毛主席著作里面的。

他对集体生活的热爱终于在团组织的各项活动中得到了倾泄。个人主义极强的区，就从来没有体验到过那种团结一致的感情：

如果集体特别好，它就会把你吸引进去。你会觉得集体很温暖，所有的人都在关心你。在这样的气氛下生活是很有意义的。你整个人都会融入到集体当中。

他完全沉浸在团组织的各项活动里：办墙报；挨家挨户地劝说老太太们参加“市人民公社”；从思想上帮助班里同学（比如私下里指出同学不恰当的观点并说服他们改正）；和非团员同学谈心；象以前别人培养他那样培养新团员。他努力试图搞清每次运动的重要性，同时为了增加自己的政治

知识，开始仔细认真、从头到尾地阅读《毛泽东选集》，而这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说还是相当不简单的。在一个星期之内，他读完了毛选第一卷，结果发现只被团支部批评了一顿，责备他读得太多太快，没能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组织对人的要求一直深入贯彻到个人最琐细的生活小节和思想感情，不过白对此完全接受。事实上他喜欢这样做，他喜欢被严格地要求。他相信只有富于“组织性”才能把事情做好。同样，他也愿意严格要求别人，有时固执己见达到了命令式的程度。他开玩笑地说自己：“我简直有点儿——哈哈——象个法西斯分子，我强迫人家不出差错。”

入团之前，他不知道，也并不真地想知道同学的出身背景。但既已身为团员，他就得对每个同学的家庭情况都有所了解。他开始越来越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行事。他遵循政府的规定，在评价他人时把重点放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上，而不是他们的家庭出身上；但他往往对于出身不好甚或出身于中层阶级的同学心存怀疑。在谈话时，他尽力想给人留下他对待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也十分友好的印象：因为按当时所说的，经过教育他们也可以掌握正确的政治观点。不过他的态度十分明显，差不多等于是说：“这是个不错的小伙子，虽然他出身不‘红’。”

他很严格地修养自己的内在品质，在日记里记下了他最隐秘的思想——并且十分乐意地让其他团员都来阅读。这时雷锋事迹尚未得到宣传，写日记还是没有前例、不落俗套的。

那时我太天真，把心里想的都写了下来。团员们因为

对你已经十分了解，批评你的时候就总能说到点子上，嘻，那时我就喜欢这个。现在回头一想，真是傻透了。我把什么事都告诉了他们，任他们批评我，处置我。

白对自身的优点比区更有把握，又不象区那样斤斤计较，所以，他没有太因得失问题苦恼过。他在有意义的集体生活中找到了实现自我的途径，并在这种前提下，把自己视为一种道德力量。因此，他对“革命接班人”的解释既与区有相似之点，又有不同之处。做为团员，他们都有权对班里同学的活动加以管制。他们已经熟谙做干部之道，并对未来可能达到的职位怀有模模糊糊的野心。区把革命接班人与干部等同起来，白则有所不同——他认为革命接班人意味着别人可以向之学习的模范人物。他的理解固然把领导身份包括在内，但他并不认为革命接班人非得是领导干部。他承认，在他为报效国家所作的努力中，当干部的念头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他说，这是因为当时政府对毛主席规定的革命接班人五项条件所做的解释就是如此。不过，他很快缓和了一下语气：

我是说，那五条包含了当干部的意思，但并不意味着为了当干部而拼了命地竞争。不会出这种事，象西方搞竞选似的你争我抢，相互倾轧。不，不会出这种事。要不然就不符合那五项条件了。

对于区来说，她的最终目标就是当干部。而白则把个人野心

放在了次要地位。当问到做了干部可以获得多少个人利益时，白把它当成不相干的话题避而不谈：

啊呀，那时候我们根本不考虑个人利益，只关心如何为大家谋利益。如能获得个有权的职位，也只不过是为了给社会做更大的贡献而已。哪里能成天价考虑自己！就象西方人似的，一天到晚只想着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名利吗？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同……不管做什么，第一个念头就是为全班，为全校，为全国人服务。

雷锋自己已经十分富于献身精神和正义感，所以他用不着每时每刻约束着自己，提醒着自己，而这种自省正是区的日常功课。自从这方面来说和雷锋很相似。他有区所不具备的阶级感情和对党的感激。虽然没有被定为“无产者”，但他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出身十分自信，不致有区那样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自年龄长大一些后，因老师发现他家境不好，住房条件又拥挤，便准许他睡在学校教室里，并给予助学金，这更加深了白对党的感激之情。

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白和雷锋一样，也有一份很强的正义感。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品质正是白最需要加以克制的，因为它已发展为一种过于良好的自我感觉，认为自己比别人都更为正确。这样的观念自然导致了“主观主义”。中国意识形态认为，主观主义必会使人固执己见，以致无法正确判断形势，无法理解和倾听他人的意见，也就更无法与他人合作。白在团支部里是“极左”分子，他过于相

信自己的正确性，往往把自己的苛刻要求强加于人。吸收新团员时他投反对票的次数最多，甚至当大多数团员都已同意可以忽视一些小小的缺点毛病时也不肯通融。他把自己当成最公正的评判人。当所有人，包括团干部们，都埋头读书准备高考之际，他仍一丝不苟地开展政治工作。他对一个鼓励过别人投奔香港（当时正值1962年的经济困难时期，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结队越境）的同学作了一次个人调查，并使那个男孩子在公安局拘留了一周之久。班里的许多学生都觉得这未免过份。后来那个男生伺机报复，一场恶斗的结果，是他自己受重伤大败而归。这是他的严重失误。他做为一个团员，应该说服别人，而不能动手打架。他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只好口头承认了错误，但内心深处，他并不感到怎么内疚：

打架是不对的。但我相信我收集材料（调查那个出问题的同学）并没有错。他四处散布去香港的流言，还竟敢用弹弓在毛主席的相片上打了个洞；从公安局放出来后，他到处说我们北方人在白吃广东的大米（白祖籍不是广东），叫嚷着要“打倒北方佬”。我不得不拎着一把镐跟在他后面跑……团支部问党支部怎么处理。谁知道呢？校长说我揍得好！哈哈，他说那家伙活该。所以我没陷入麻烦……我不得不写了好几篇长长的检讨。不，我并没有真地承认我错了。所以我进大学后又和人打了一架，哈哈！

白把自己当成是为维护纯真信仰而战的斗士。正象区很

难控制住自己的骄傲一样，他也很难控制住自己强烈的自我正确感。他们都公开做保证，还按照程式写那种措词恰当、无懈可击、符合标准的检查，但就是无法改变自己的实际行动。不过，我们也不可就此得出结论，说他们做公开检讨不真诚。他们的确是很诚恳的，虽然他们听凭弱点支配自己，但他们的理智还是能告诉他们自己做错了。

到了学生们都象区和白那样升入中学之时，他们也都掌握了当众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技巧，这原是多年训练的自然结果。在小学，他们即开始写作文，写周记，遵守一套十分严格的道德模式（与此相似，香港与台湾的学生也必须写这种道德意味很浓的作文）。到上中学的时候，他们已知道了该怎么用词，该引用怎样的语录或口号来支持自己的论点，该怎么说才能让自己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听上去既不极端，又不刺激，而又足以使人信服。他们都已熟练到了那种程度，就象我们前面引用的一位接受调查者所说，“只要一张嘴那些话就自然而然地涌到嘴边上了。”这种中国式的教育方法不断重复使用高度程式化的道德训诲式语言，来培养青年人的政治、道德价值观，确实收到了很大效果。这种无休无止的灌输——拿白的话说，就是“照在你身上的、看不见的x光”——比公开的一致性更起作用。人们的日常讲话，表达方式，无不以一整套特殊的价值观为前提。

白不是任何人的崇拜者。他崇敬毛主席，尊重他的观点和成就，并十分严肃认真地试图遵循他的教导，但他从未把毛主席当成宗教崇拜的偶像。在高中，当他阅读毛选时，他把个人感想写在书页的空白上，就象阅读其他人物的书一

样。进大学后，他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在学习马列主义的时候，他也依然试图保持思想的独立性。教授们都小心翼翼地把马列著作当成不证自明完美无缺的公理，而白也不得不学会矢口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不足之处。政治上的真理还得通过熟记于心来进行学习。学生们得到的指导是必须从头到尾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七遍到八遍，这样书中的一些概念就几乎可以背诵下来；有些刻苦用功的学生则把书中的每一页都起码钻研了不下十五遍。自认为是很有独立见解的，他在读完第三遍后就告诉教授说：如果再读下去，他觉得对加深自己的理解也不会有什么帮助。毛主席在六十年代曾多次谈到中国教育制度存在的种种问题，他叹息说攻读社会科学的大学生写不出什么有质量的文章，因为他们不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毛主席没有发现，在对他不断升温的个人崇拜中，有意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定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也同样有碍学生独立思考的发展。

有趣的是白接受教条时表现出来的相对的迟疑不决，部分是由于他强烈地希望以青年毛泽东为楷模。在一本被广泛阅读的关于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书里，对于青年毛泽东的独立、大胆、非难权威的思想有大量描写，此外还提到毛泽东早期在所读书籍之空白处随手写下札记与心得的习惯：

在一本大约万言的书里，他（即毛主席）竟写下了一万二千字的批评性感想。而且，全书的每字每句都用毛笔标上了诸如圆圈、逗点、单线、双线、三角、十叉之类的记号。这在学习史上堪称奇迹。

有好几次白向我出示他在那些年里写在书页空白上的大量评语，以此引起我的注意。当谈到他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当成绝对真理时，他引用了毛泽东自己的话：

毛主席曾亲口说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依我看这八个字应该指导我们对毛选的学习，因为既然人人都可能有缺点、犯错误，你的书也未必完全正确。就算你的著作是伟大的，它指引革命走向了成功；就算它百分之九十九都没说错，但总还有百分之一的不足吧。

不过，虽然白对毛主席的教导存在温和的怀疑，但他从未对党的教导产生过任何疑问。因为他看来，“党是个规模宏大的组织。它能消除自己所犯的错误。所以党的指引永远是正确的。”他所说的“党”并不意指那些掌权的党内具体成员。当我们叙述到他的大学生活时，我们就会很快发现对于具体的党员他能够做出毫不犹豫的批评。在他的概念里，党是个抽象的存在，是超出于一般失误之上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尽管具有这样的信念，白却和雷锋不同，不愿意做一枚“螺丝钉”。他甚至批评雷锋缺乏宏伟抱负：

我知道螺丝钉精神是很可贵的，但在展望未来的时候，我觉得一个人应当分析他自己的能力以及国家有何客观需要，如果可能的话，应该不把自己局限在螺丝钉的位

置上。只有到了别无选择时才应当心甘情愿地一辈子做枚螺丝钉。雷锋却只肯做一个区区螺丝钉，根本不去想想还有比当螺丝钉更伟大的事。

和区及其他接受调查的学生一样，他坚信要是能当上专家，就能对祖国做出比当农民更大的贡献。努力奋斗考大学不仅能满足个人的愿望，在动机上也是无可厚非的。

但在上高中时，有一段时间白显然很乐意做一枚螺丝钉。他是团支部里最纯的“极左分子”，主动扮演着正义者的角色，受团支部这种极端积极的气氛影响，他开始十分真诚地号召学生们放弃高考的机会，志愿申请扎根农村。“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对于他来说已不够革命了。

白准备自愿去农村，他面临着一生中的一个重大关头。但他的申请未得到批准。校长亲临他们班，向他们解释说他们都是尖子学生，国家正需要人才，他们将来报效祖国的最好途径就是升入大学。白得到这样一番劝慰，便服从了党的决定。令他欣喜的是党的决定和他个人的志向恰好不谋而合，他象其他人一样，投入到了紧张的高考复习中。

白也许有一半相信自己的忠诚和他准备做出牺牲的宏愿，但是他肯定自始至终都知道官方报纸一再督促青年积极分子参加高考，让国家来决定他们报效祖国的最好办法。因此他明知自己不会下乡还要提出申请，大概是在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但在两年之后，他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他又一次申请退学，甘心放弃令人羡慕的前程，要求扎根农村。他把此事搞得尽人皆知，而当时也不是不存在批准的可

能。于是在同学们的眼里，他不仅是个极端分子，而且颇有神经不正常之嫌了。

这件事发生在1963年，正值大学生必须下乡参加反腐败的“小四清”运动之时。在编纂村史的过程中，白与村民们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他要在那扎根，并解释了这么做的原因：

我的梦想是改变那个村子的面貌，让那里的大队成为赫赫有名的模范生产队。因为那地方的气候与地理条件都不错，所以我盘算着实行技术革新，同时也为将来的机械化拟定了计划。我觉得那地方有很大潜力……我也知道我该从何做起。

这是个野心勃勃的计划。他一心想建设一个和大寨齐名的生产队。放弃读大学无疑是一种牺牲，但也决不能就此认为他的梦想是个人利益为服从集体利益做出的无条件让步。如果他成功了，他就会成为著名的模范人物。刘少奇把这种野心称之为“个人目标与党的利益的调和”；只要个人利益不是“只为个人打算的目标”服务，那么也不是必须绝对摒除的。

区和白一旦能够得到机会来表现他们的忠贞，并感到他们的行动不无成效、他们的聪明才智可以得到证明，他们都是十分乐意献身集体的。区总是在衡量自己的行为，因此对于她自身的反覆无常有所察觉：有时她相信她真地做到了公而忘私，有时又十分清楚自己的动机不纯。白则不然，他与区

比不太善于自省，所以他觉得自己是完全无私的。

区和白与其他接受调查的学生不同，他们属于另外的一类。他们是得到承认的积极分子，所以他们有比他人更强的政治荣誉感。他们有着很高的期望，要担当领导者的角色；他们也十分相信自己能在领导岗位上改变事物的面貌，组织群众干一番事业。此外，他们还把自己看成政府机构的组成者，这种想法是他们的团员身份造成的。团组织是未来干部的培训班。白并不认为自己所能做出的贡献来自挥起锄头埋头苦干，而是要做为一个精明强干的乡村干部，引导村民们获得光荣。

在田里，他们都学会了支配他人的技巧。他们十分明白在接触别人时要采用正确的态度，知道如何指出旁人的错误才不至于使人与己离心离德，何时该软，何时该硬，怎样开口劝人，又引用怎样的语录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不过，区虽然掌握了这些知识，却总是消除不掉她屈尊纡贵的态度，白也无法改正自己轻率鲁莽有时又难免专制的工作作风。归根结底，这还是因为他们的“领导”意识太强，总从“领导”身份出发看问题，感受不到手中无权的同辈们心中所怀的愿望与不满。

区和白都是最早入团的少数人之一。他们用不着再为入团做出种种努力。有些刻薄一点的同学说他们是被“拉进去”的。那些在他们之后入团的人就得拼命竞争，这种竞争必然导致焦虑、担心，对自己的怀疑以及各种不满。区和白谈论起他们所在的团支部时，仍用着因把它理想化而十分怀念的语调：团组织做出多少成绩啦，在对待同学入团问题上

多么严格啦，他们发起的活动是多么重要啦，他们怎样在会上分析非团员的情况啦，他们怎样启发别人的政治思想啦，又是怎样仔细地调查同学的家庭档案啦，等等等等。但他们很少提及某些同学对团支部所怀的敌意，对于那些因为出身不好而被视为低人一等的同学也没有丝毫同情心。他们对下列事实懵然不知，即：做为团员，不管他们批评非团员同学时多么温和，多么客观，多么正确，不管他们在吸收新团员时多么一丝不苟，不管他们自以为和群众是多么地接近，后者在他们面前总有如履薄冰之感；而且，不管他们在说教时是多么地充满善意，总有一些人觉得他们是在用施恩赐惠的态度来对待帮助对象。等我们谈到张和邓时，再来看到这故事的另一面吧。

区和白同是积极分子，在对待领导的态度上却截然不同。区总是服从她的顶头上司，白却不然。他一旦感到上级领导有虚伪之处，就立刻对他们产生鄙视，并出于自身具有的纯洁感而反对他们。他进大学以后，上中学时隐藏在极左面目下的正义感就以一系列叛逆行为的形式呈现出来。

1962年，白考入中国最大的大学之一，成为该校的经济系学生。能升入大学已经是很高的荣誉了，而选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专业就更是倍增光彩。学生们的阶级背景、政治历史都相当出色，班里的大约三十个学生当中有四个是党员，一半以上都当过团支书。白向我描述了在考入这所高等学府之后，举首展望，前程似锦，于是大多数学生都自以为成了重要人物。他们尽力摆出一副煞有介事的严肃样子，想让自己看上去显得尊重一些。

在大学里，学生们大都致力于达到这两个目标：一、入党；二、为毕业后找个好工作打基础。这样就必须搞好学习，并表现出政治积极性。学生拼命努力的结果，使健康状况受到了严重影响。

政治上的竞争不但激烈，而且必须绞尽脑汁。白回忆道，学生们所说的每字每句几乎都是马列主义标语口号。在团支部会议上，团员争相炫示自己的优点，企图压过别人。当时正值学雷锋运动的高潮。白有些轻蔑地谈起弥漫全班的虚伪气氛：

在学雷锋的那段时间里，班上流行起了写日记。但那些日记是写给别人看的，全是一些抽象空洞的言论，比如大学生应该很好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每天写几条言之无物的标语口号，就算是一天日记的内容……不，我才不肯把我的日记和别人交换着看呢。有些人故意借日记标榜自己，把日记交给团支部党支部。当我读到他们的日记时，我真想把它们一扔了之。简直虚伪透了。

最令他失望的是同志之间紧密团结与相互关心的程度已大大降低，而这本来是高中团支部最吸引他的地方。他不再开诚布公地向同学们剖白心思；不仅如此，他还企图借一系列不合潮流的行为向他们显示他是不屑于为个人谋私利的。当班里所有人都在努力给党支部留下良好印象以求入党时，白却有意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他是班里唯一没有提入党申请的。

开会时他也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对同学批评之尖锐已然超过了礼貌许可的限度。尽管受到其他学生的讽刺，他仍不断大谈他以前所在团支部的种种优点。当一个同学得了十分严重的肺病、没有一个人敢接近他的时候，他故意和他同吃同住，不管那位同学去哪里他都陪着，以此来责备其他同学，尤其是学生党员们。他旨在揭露他们对于有困难的同学缺乏关心，虽然开会时他们都叫嚷得很响，表示什么要关心他人。当全校都卷入学习雷锋“艰苦朴素”作风的热潮、人人争相穿出最旧最破的衣服时，白却穿了一套漂亮的新衣服招摇过市。这套衣服是他用自己的旧衣服和一位家境富裕的同学换来的，那个同学从来没穿过旧衣服，这次害怕挨批，不得已而与白交换。这样，白在破衣旧衫的人群里，把自己打扮得格外显眼：他正要借此来嘲笑那些人赶时髦的劲头。

在同学们看来，他一定是个相当讨厌的家伙。他总把别人搞得十分难堪，批评起人来也毫无保留。他的正义感为他树敌不少，后来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他成了党支部的攻击对象。

虽然他对大学里的假积极现象甚感失望，但他的热情并未随之熄灭。同年，他申请扎根农村。一年后，由于他坚持原则的缘故，他惹下了相当严重的麻烦，严重到足以影响他的整个前途。他的信仰面临考验，不得不做一个重要的选择。

那时正在开展全国范围的大四清运动，大学生必须下乡帮助村民“抓阶级斗争”，协助他们消灭经济困难带来的农

村地区普遍现象——腐化堕落。毛主席认为这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做法可以使学生们受到几个月的“无产阶级教育”。于是，1964年底，白同其他几名大学生，连同大约二十位公社级、县级干部一起组成了一个四清工作队，到中国北方的一个农村（生产队）开展四清运动。工作队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大学生则归干部领导。对于学生们来说，服从干部的命令是有好处的，因为工作队关于他们在农村表现的报告要递交给学校，对他们将来分配工作和前途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大学生们不熟悉下面的工作，理想主义的色彩比较浓一些。尤其是白，他对于干部们的粗疏大意很感不满，而他们对于阿谀奉承和各种小礼物的来者不拒也使他别扭。他想比别人都表现得更积极，尽量亲自下地和农民一起并肩干活，在空闲时间则组织当地青年开展一些鼓舞干劲的积极活动。他成了一颗“定时炸弹”。不过，直到他对工作队领导为从被怀疑的基层干部身上获得供词而采取的种种手段提出不同意见时，工作队其他人员才被他彻底得罪了。当时，工作队想在“斗争会”上威胁那些基层干部，靠大声恫吓的办法从他们嘴里得到一些经过夸张的招供，而正常的运动方针是不可这么做的。白还在学校时就知道劝导和教育才是使人坦白认罪的正当途径。但在当时，有一种全国性的极左倾向，每个工作队都想超过人家，揪出的四不清干部、查出的腐化案例越多越好，以此来显示他们的“巨大成绩”。

在选择新的基层干部来代替那些四不清的前任时，白和工作队的潜在矛盾终于爆发了。一些工作队成员强迫农民们

接受既缺乏群众拥护、也没有丰富农业经验的人做他们的村干部。白征求农民们的意见，感到这些得不到群众支持的干部会给集体生产带来不利影响。于是他站在群众的立场，担当起了反对派斗士的角色。他鼓动农民们拒绝工作队的决定，而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这种存在于工作队内部的严重分歧本来应该汇报给高一级的党领导，但工作队干部急于无声无息地了结此事，就企图迫使白在农民面前承认错误，自我检查。白面临着很大矛盾。如果他拒不服从，后果将十分严重。整个工作队恐怕都要因破坏了工作规定而陷入困境，包括他自己在内。他不想伤害工作队。但是当众检讨自己的所作所为就意味着背叛良心和当众丢脸。那天晚上，他夜不成寐：

问：你觉得苦恼了，是吗？

答：不，我读了一整夜毛主席选集。真的是在读毛选。期望能从毛泽东思想里找出答案。唉，那时我实在太忠诚了。我一页一页地从第一卷翻到第四卷，但一无所获。

问：你平常就用这种方法来做决定吗？

答：哦，是的，这还是从雷锋那儿学来的呢。
我常常那么干。

问：你的意思是说找出一句看上去有用的话……

答：不，不是那样。只是要抓住大意，看看毛主席是怎样解决问题的，然后把他的方法套用到我的处境上。特别是当主席解决有关路线斗争问题的时候——比如在开六

届六中全会和七届二中全会期间碰到的。他的思路很值得借鉴。在这次冲突中我相信我代表了正确的路线，我下意识地认为那些人在搞修正主义。那天夜里我读书到很晚……

第二天早上他找到了解决办法，虽然如果运气不佳的话，这种做法就可能毁掉他的整个前途：

吃过早饭后，他们让我去写检讨，我越想越觉得气闷。所以我就收拾起我可怜的一点行李，几本书，背上书包，上山向东跑去。我爬上大山的主脉，一直到了山顶。我思考了很长时间。“现在我该怎么办呢？”我想到这么几点：第一，我对大学生活已经感到厌倦了。我打算四处飘流，直到找个新的地方扎下根。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自己的家庭什么的。第二，我觉得那些党、团员和我都不是一种人。让工作队也尝一回苦头吧，我可受够了。这回该轮到你们了，谁让你们违反了规定呢！……第三，这也是我向群众说明我没有屈服的一种方式。要是我不见了，就表明我没承认错误，我坚持了我一向的主张。考虑到群众，我就觉得我没有损失太多。唉，不过离开这块地方让我感到很难过，我毕竟在那儿干了那么长时间，付出了那么多努力，流了那么多汗。离开它是很不容易的。但最后我还是走了。

这是个原则性很强同时也十分感情用事的决定。之后接

连大约有三个星期，他隐瞒着自己的身份，漫无目的地从一个县走到另一个县，从一座城市走到另一座城市。这么做的动机暗含着一个相当浪漫的因素：他一直十分羡慕毛主席在1927年徒步考察湖南省五个县城的举动；毛主席通过那次游历获得了不少第一手材料，并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白时常因他们这一代人没机会进行类似的考察感到遗憾。虽然满足这种愿望不是他的本意，但既已上路，他便学着毛主席当年的样子着手详细地写下了他的观察所得。他向来热爱集体生活，第一次感到暂时挣脱所有社会、个人、政治关系的束缚竟会这么轻松。

但在中国，对于居民身份有十分严格的控制，四处漫游是非法的。他在两个具有监狱性质的拘留所里度过了一个多星期。于是，生平第一次，他接触、经历了中国社会最底层人民的生活。他看见了乞丐、流浪汉，而他还以为他们早就从社会主义中国的土地上销声匿迹了呢。他被监狱看守关押过，也被拳打脚踢过。他还亲眼目睹一批批来自邻省的农村难民，男女老少都有，怎样因为旱灾而背井离乡，沿路乞讨，最后终于被集中在一起，给他们吃了一顿饱饭后，将他们装进卡车，遣送回了原籍。白心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念头：

我感到有必要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严肃的反思。我还有一些其他古怪的想法：为什么报纸上不报道这些事？为什么从来都看不到一则关于某地遭受自然灾害并出现难民以及诸如此类事情的新闻？为什么只报道所取得的成就

和大好形势？我觉得这种事应该报道，让所有人都感到肩头担子的沉重，让知识分子们知道国家还到处充满了灾难。让人人都努力苦干，争取进步，我当时十分迷惑。但可以说我只是微微有一点怀疑。我仍象毛主席所说：是一张洁白的纸，可以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

他被拘留所释放后继续漂流。在流浪过程中他染上了疾病，因发高烧和腹泻而极度虚弱晕倒在荒无人烟的小山上，被两个放羊人救了起来。人们发现他的身份后，用船把他送回了学校。在他出走的这段日子里，他和工作组的矛盾在对他有利的情况下得到了解决。几个工作组干部受到了惩处，农民们得到许可，按照白所主张的办法选出了村干部。凭着好运气，白要做一个纯粹的积极分子的愿望得到了实现。

17、张：叛逆的青少年积极分子

区和白都有充当积极分子的机会。我们已经看到，尽管有很多个人缺点，他们都能把政治价值内化为自身固有的东西，并遵守了各种积极分子准则。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心甘情愿地服从一个组织和这个组织的纪律。我调查的其他学生里，几乎没有再成为官方所定的积极分子的。他们也没能加入共青团，因为或是随着阶级界限的日益分明，他们的家庭背景彻底粉碎了他们的机会，或是他们没能驯服地按照团支部的要求去做。区和白入团时恰值阶级界限刚刚开始受到

重视，他们侥幸逃脱了一场激烈的竞争。张就是这场竞争中的一个失败者——也许，更多地是由于他的个性，而非他的出身。

张因为担心他在小学时的种种劣迹会影响升学，在报考初中时选择了一所离家较远的二流学校。只有学习成绩平平和家庭出身一般的孩子才上这所中学。他所在的班级偏偏资本家出身的学生所占比例又特别高：在大约五十名同学里，有二十来人出身于资本家家庭。

在上初中的头两年，他继续他的顽劣行为。他和老师吵架，不好好听课，在大街上和人动手，赌博。但他的成绩居然一直都很好，作文和政治分数尤高。他的象棋与书法也十分突出。

上初三时他经历了一次持续时间颇长的感情混乱。当时常刚跨入一个骚动异常的青春期初期阶段，这与肯尼斯·肯尼斯顿所记述的在战前一些处于同样年龄的美国中产阶级激进学生身上发现的类似情绪混乱正好契合。当然，中国美国的社会背景及社会化进程都不大一样，但在那些美国青年激进分子与富于叛逆精神的张之间，可以找到人格发展上的许多相似之处。肯尼斯顿对于充满起伏波折的青春期的描写，正好可以用来说明张的心理状态：

在短短几个月里，前青春期的种种好动现象就转变为喜好离群索居的新作风，与此同时还伴随着与人交往时的缺乏自信，道德上的自卑感，强烈的求知欲，和不时冒出的极端的宗教意识……还有些人提到他们对于手淫的焦

虑，他们的性狂想，他们对女孩的感觉……在青春期初期，还会出现异常鲜明的寂寞感、孤独感、隔绝感。有几个男女青年从十几岁起开始记日记，坚持了许多年，因为他们觉得“既然无人可以与之谈心，我就不得不和自己谈了”。他们宁愿求助于自己，也不肯求助于同龄伙伴，难怪乎这些青年激进分子都养成了保持多年的自我剖析的习惯。

与此相似，张也越来越明显地倾向于内心生活。他说得极少，想得很多。他把他的思考描写为“复杂的情绪”。他认为他的感情是超出于同龄伙伴的理解力之外的。他很清楚，他的同学们都觉得他很怪。在一个迫切要求人们成为集体的一部分的社会里，他感到自己被孤立了起来。他是在异常严格道德价值观下被教养大的，因此，他关于性的幻想不免让他十分苦恼：“当时我非常痛苦。我想我这人实在可厌极了。我还感到迷惑，茫然，觉得自己笨拙不堪。”他心中充满了激情，以至于一件最琐细的小事都能使他陷入激动状态。他必须表达自己，他开始学习写诗，来发泄自己的感情。他理想主义色彩极为浓厚，大量阅读英雄人物的传记。他还感到种种无法言传的渴望。

一些外在因素加深了张的感情矛盾。人们刚刚开始觉察阶级界限的力量。几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同学本来和张一样顽劣，而且毫不积极，现在忽然成了团员。学校还邀请了几位贫苦出身的家长到校“控诉阶级苦”。在出身不好的学生是如此之多的班级里，大家普遍对于政策变化有特殊的敏感。

张注意到，在他的同学里，那些平时十分活跃的变得沉默了，那些本来不很活跃的则一变而为加倍的积极，还有的看上去心事重重。

可以肯定，出身不好的学生所处的社会地位一直都不稳固安全。我所调查的唯一的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学生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学会了谨慎行事。做为社会上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向来安分守己，勤勉刻苦，负有沉重的自卑感，并且在政治上毫不积极，这是由于他们若想表现得积极一些必然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但因从小受家庭的文化熏陶，他们的学习成绩往往十分优秀。为了利用学习优势来保证光明的前程，他们在班里学得最刻苦，最用功。当他们亲眼目睹阶级界限对他们的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之后，他们不由得感到惊慌失措，焦虑万分。他们愈来愈紧地靠拢成一个小圈子，并时常在私下里口出怨言。

张的家庭出身不算坏，但同年他家里发生的一件事破坏了他家庭历史的清白无瑕。因为孩子的不断降生，张家日益拮据。后来，张的母亲又患了肺病，经济状况就越发窘迫。于是，张的母亲带着几个孩子去了香港。张的阶级出身虽然原本还算过得去，这样一来，就“抹上了一层黑”。他也开始和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一样感到紧张不安了：“我们都觉得和大多数孩子不同，是出身于另外一种阶级的。我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感觉，即：我们有特殊的命运，特殊的未来。”

随着学雷锋运动的开展，张注意到班里的中等阶层子弟和出身不好的同学，甚至包括入团可能性极为微小的学生，也都表现得比以往更加积极。张认为其中多数人都是假积极

分子。他可能是因为自己的焦虑而把别人虚假成分夸大了，但不管真也好，假也好，这种积极表现不断让他心神难安。他面对的首要问题是，他是否也该投身于这场竞争，以求使自己的未来得到保障？他初三毕业升入高中的那一年，阶级界限的影响更加明显了：大多数出身不好的学生都没有考上高中。如果张想进大学的话，就该立刻做出尽力争取入团的决定了。

为什么他会犹豫不决，似乎在政治上表现得积极一些是不应该的呢？为什么他比同学们都更加害怕“假”积极呢？张内心矛盾的根源在于他强烈希望做到一切表现都听凭自然；此外，他一点儿也不愿向权威和组织纪律低头。他是个积极分子，但只能按照他自己的条件。

张对政治十分关心，无论是对国内的、国际的，还是理论上的，他都有强烈的兴趣。他尽其可能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还每天都要跑到学校办公室，细读一份刊载不加删削的国外新闻、但发行量受到限制的报纸。他说这是因为“我对西方的新闻报道很感兴趣，不过‘兴趣’这个词用得不算恰当。我总是把中国放在第一位，我喜欢看到别的国家对中国的评价，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民族自尊心。”虽然在进行正式的政治讨论时他算不上积极分子，但他是如此“痛恨”苏联，有一次竟至在班里爆发出来，痛斥苏联的修正主义罪行，使人人都吃了一惊。对于他来说，只有富于远见的对政治的关心才是真正的积极。他对“革命接班人”的理解来自那五项条件的头两条，即：锻炼自己，为国家服务，认真学习马列主义。他从来没想到一个人必须在成为干部或担任领导

职务之后才能被看成是革命接班人。

他的爱国主义，政治价值的内化，都必须经受现实生活 的考验。当他母亲去香港时他本可以和她一块儿去。他的父母，尤其是他的父亲，竭力想说服他相信在香港他可能找到更好的出路。但他一口拒绝了，理由是“我不喜欢资本主义。再说我觉得离开祖国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他加强自我修养的方式与区和白都有所不同。区和白十分尽责地写日记并进行自我省视，他们用来衡量自己行为的标准是口号标语，毛主席语录，党中央指示和政府规定的行为准则，在整整一天当中，他们是否做了好事，如果没做，为什么？他们为什么把扫地的活儿留给了班长？为什么发了火？为什么不能做到和雷锋一样无私？他们严格要求自己成为党和主席的“驯服工具”。张也每天自省，但只在他觉得有那种内在冲动的时候才写日记。他判断对错的标准不是流行的口号或团的指示，而是——或者至少他主观上是这么认为的——他自己的良心。他的行为必须对自己负责。他感到他没有必要着意符合外在的标准。但既然已经具有一定的自我修养，张最终还是逃不过中国人所谓的“自觉性”。他有意控制住了自己叛逆性的爆发。

张非常刻苦的进行体育锻炼，生活也过得十分严谨有规律。在中国，人们很久以来就把发奋锻炼身体当成有为之举。早在本世纪初(即梁启超生活的时代)，中国人就对“东亚病夫”四字看得十分认真，获得强壮的身体已经列入文化改革的计划之中。如今，孩子们应该接受“德、智、体三方面的教育”这一概念，不仅在大陆，而且在台湾、香港的一

些老式学校里，都经常得到引用，已经成为套语。但只有在大陆，体育课才依然备受重视。如我们已看到的，政府积极提倡刻苦锻炼身体，以求培养学生们的意志和毅力，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多做贡献。虽然城里生城里长，但在帮助农民秋收期间，我所调查的学生们都经受住了体力上的考验，而一般来说，这是在“资产阶级教育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所无法胜任的。

与此相关，是被称为“艰苦朴素”的克己观念。中国学生的生活通常十分俭朴。勤俭节约被看做革命美德。赤脚是很普遍很流行的现象。穿皮鞋与其说让人感到骄傲，不如说给人带来耻辱。学生们也不敢穿颜色鲜艳的新衣服，怕人说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花钱买糖果零食更是要遭到白眼。

总的说来，中国学生普遍追求物质上的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有些人纯粹是为了随大流，也有些人这么做的时候非常认真热忱。张与一般学生相比，则简直到了狂热的程度。和他学习政治知识时一样，他毫不动摇地坚持体育锻炼，早已远远超出了他的同学们所必须达到的标准；而事实上，任何事情只要做过了头，就会被人目为不正常。

青年毛泽东的故事也给了张很大激动。毛泽东年轻时致力于身体的锻炼，生活也十分艰苦，毛泽东在冬天游泳，洗冷水澡，有意让暴风雨把自己浇得透湿，在荒野露宿，并进行令人精疲力竭的长途远足。在早期写下的篇文章里，毛泽东谈到他锻炼身体的目的。1、早在1917年，他就认为健康的身体对于挽救国家危亡是绝对必要的；2、抑制被他视为弱点的天然感情；3、锻炼坚强的意志，培养无畏的性

格。这激发起了张的丰富想象：强健的体魄原来是钢铁意志的首要基础。

我可以非常放荡不羁，不守纪律，但同时也能做到对自己要求异常严格。我努力要求进步，其他那些人在入团、做好事方面也表现的异常积极，但这里存在着质的不同。我读到毛主席青年时代的所做所为后深受感动，于是我也在冬天游泳，洗冷水澡，而这是许多人无法做到的。坚持不懈地慢跑——他们受不了，我却能忍受。你必须勉強着自己，努力，再努力。有时很苦，很难，但往往你只要再跑一步，就能增强意志，免得毫厘之差，遗恨百年。要是你放弃了，你就永远也达不到目标。下这种决心是很困难的，不过我把一切都理想化了，强烈地渴望着取得进步。和别人不同，我就象个正在锻炼自己的青年革命者。

他学习毛泽东年轻时为投身革命所做的种种准备。但是在张所处的时代，等待着他的又是怎样的革命呢？毛泽东从事的革命活动需要暴力、流血，反抗现政权，彻底改变社会和政治境环。而到了张生活的时期，“革命”一词虽然继续沿用，但它的内容已发生了变化。它意味着“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推翻现政权已经不是现阶段革命的任务，相反要服从政府的规定，消除所有不合乎潮流的个人主义倾向，把一切献给党，献给毛主席，心甘情愿地艰苦劳动，过普通人的生活，象雷锋一样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但张仍然拒绝接受雷锋做为

英雄模范。他认为雷锋是“驯服工具”，向雷锋学习的人则平凡乏味，不值一提。他心目中的英雄是毛主席和其他伟大的历史人物。他热爱毛主席的诗词与书法。他时常引用毛主席的话，不过一般只引用诗词里的句子，而不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与语录。是毛主席的浪漫主义风格和叛逆精神强烈地吸引了他，但毛主席关于“为人民服务”的教导却没有引起他的注意。毛主席是个集学者、诗人、军事天才、伟大的革命家于一身的人物；张也要为达到这一目标而努力。他深深地赞美伽里略不畏宗教迫害、坚持自己信念的精神；他也十分崇拜拿破仑的军事才略，他希望有朝一日天赐良机，借此证明自己也具备同样的才能。

张所追求的正是被政府斥为“个人英雄主义”的东西。他总怀着一种冲动，想按照自己的方式向自己也向其他人表明他所具有的革命品质。他从不期望得到组织授予的权力、地位与荣誉（这是区和白，尤其是区，梦寐以求的），只要他能按个人方式证实自己的价值就行。

张迫切要求表现自己，他那些富有叛逆精神的美国兄弟们在青春期迷乱过去之后也体会过相同的感觉。肯尼斯顿发现，在青春期初期的困难阶段过去两三年以后，他进行调查的青年人跨入了一个反抗父母的新阶段。他们认为父母过度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对他们放手不够，使他们无法成为他们自己，还试图控制他们的生活，计划他们的未来。对于张来说，强加于他的权威倒不是父母，因为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母就已管不了他了。但总有什么东西阻止他实现自我，这就是具体化为他的同学们的共青团组织。他们似乎总想控

制他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就象一堵墙，压得我喘不上气儿来。”虽然他对党怀有无限崇敬，但也禁不住有隐隐的阻力使他不想完全服从于它；

在写作文的时候，情绪必须是健康的，对吧？于是我的作文就总在赞美祖国有多么伟大，人民有多么伟大，党有……不，关于党的内容不多。不知为什么我就是不能用同样自然的口吻赞美党。我觉得如果要求得过份严苛，过份强加于人，我就偏偏没法子按着要求做，我就会感到做起来特别困难，还不知怎地感到虚伪和造作。但是祖国和人民就不一样了，它们是不同的。

要是就此断言他对社会制度不满，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他对党的政策的信赖从未动摇过。他甚至坚信他的献身精神比那些学雷锋的同学们都更为高尚、深沉和特殊。他为之感到苦恼的，是组织上要求的一致性。

当时，大家都已意识到入团对于进大学来说十分重要，但如果他想入团的话，“靠拢团组织”和学雷锋就是必要的了。张一直希望能够升学深造，到大学里学习文学与政治。他觉得这比下乡劳动贡献大。但是他应当放弃独立自主和大家求得一致吗？他应当准许自己卷入那些被他视为假积极的、琐屑微小的“革命”活动中吗？行为本身对他的心理影响并不大：归根结底，做件好事又有什么错呢？他感到不安的是行为背后的动机。他把班里同学争着学雷锋做好事的举动比做“抢食吃”。但最终他还是屈服了，他的表现符合最

低限度的要求。与此同时，他充分意识到自己动机的不纯：

我按时去见我的入党负责人，因为如果你不去，别人就会说你不积极。就芝麻小事征求他的意见是司空见惯的。特别是在学习毛著的时候。你得说许多诸如此类的话，象“今天我有个思想问题，但在读过毛选之后，我认识到了什么什么”等等。这是规定好的，人人都得这么做，我也得跟着学。我还作了许多这样的笔记，有时甚至一边和人聊天一边写。我感到非常难过，因为我不能问我真正想问的问题。我考虑过很多重大问题，象关于修正主义，关于国家民族，关于生命，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我觉得一个人只要诚实坦白就足够了。可他们问的是什么呢！你做好事了吗？你为你宿舍的同学洗衣服了吗？这真让人难过。除了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之外，我还必须在团员面前表现得象个小孩子。

有这种感觉的，张不是独一份。我所调查的学生里，有一半人都感到过同样的、迫使他们与集体保持步调一致的压力，以及对于这种压力的内在反抗意识。不过在他们中间，张是最感苦恼的。他觉得自己在装假，为了减轻负罪感，他尽力表现得非常积极。区只是有时会为自己感到羞耻，否则自我正义感极强，从来没产生过这样的念头。

不管学生们怀有怎样的情绪，在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会时，他们都能掌握一个合适的限度，使自我批评与个人的性情和阶级背景相一致，这是他们因长期积累经验而习惯成自然了。这样的会已经变得十分程式化，以至于在一般学生看

来，俨然可以定出一套不成文的法则。出身好的学生谈的是对党的感激，表示要尽最大努力报答党的恩情；出身不好的学生则主要检讨自己的错误，用现成的套话来控诉他们的思想如何受到落后家庭的影响，又如何下决心和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至于中等阶层出身的子弟，他们用不着做这么严苛的自我批评，只要大概讲一些介乎前二者之间的话就可以了。因为有了这样的非正式规定，那些觉得这种会纯粹是弄虚做假的学生逐渐习惯于公事公办地扮演自己的角色，就好象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死记硬背的程式似的。

与实际要求的微不足道恰好相对的是，口头表白必须极尽渲染之能事。积极不积极要根据你的语气声调、口头表白、所愿展示的自身生活细节和与父母“划分界限”的程度来判断。一个接受调查的学生嘲讽地说：“他们真是把自己贬低到走狗的地位了。”无论是他，还是张，都不愿意这么做。同时，这种会已经十分程式化，如果想象张似地进行一次超出标准的、真正坦白的公开自我检查，就会碰到另外一种类型的问题了：

有时，在开这样会的时候，我把我头天晚上私下所做的自我批评提出一部分，当然不能全都说出来。只讲一部分就够了。如果毫无保留的话就会暴露出和他们不一致的东西，而在当时所有的人都必须保持一致，就跟从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样。有时候我刚开始谈出一些内心的想法，当然都是不出格的，可就是那样他们也会觉得我这个人很怪，想得太深。我时常感到前后矛盾。

张还有一个特点，使他与标准的积极分子截然不同。严格说来，他缺乏“阶级感情”。我们已经看到，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对无产阶级革命不抱任何浪漫的想法，虽然他自己就是在那么一种社会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他从来不在乎区那么尽心竭力想要培养的“阶级感情”。他对“阶级感情”一词有他自己的理解。当他听到工人阶级出身的同学谈到他们对党的感激时，他这么想：

我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从我观察到的来看，他们呈现的正是人性中自私的一面，那种感激就意味着因为什么人曾对我好，所以现在我要对他好，这是一种自私，我就是这样认为的，与此相反，虽然可以说共产党没有使我在任何特别的方面受惠，可我心里清楚，我比大多数人都更深地了解它，我对党的感情上升到了理智的水平，不象他们那样狭隘、盲目，我甚至认为到了关键时刻，那时在看到底谁能对党更忠诚吧，我从来不去想“报答”不“报答”的。

另外一个中等阶层出身的被调查者也得出过同样的结论：那种阶级感情实际是一种虽还称不上自私但也绝对够不上高尚的情绪。但是大多数中等阶层子弟从来没有对阶级感情存在的合理性产生过怀疑。在生活中，他们虽然并不觉得出身好的同学比他们自己更革命，但只要有关阶级感情的教育不冲击到他们自身，他们就是忠实的追随者。我所调查过的学普遍回忆说，他们都曾对出身不好的同学心存怀疑。

提倡阶级感情的自然结果就是对阶级敌人必须怀有“阶级仇恨”。这也正是张所缺乏的。他倒并不是对出身不好的同学特别友好，因为他基本上独来独往；但他有一种人道主义感情，这和阶级仇恨极不调和。人道主义在意识形态教育里是遭到痛斥的，根据是一切感情都有阶级局限，不存在超越阶级局限之上的情感。人道主义，人性论，都被当做危险的资产阶级毒草：只能有阶级感情和阶级仇恨。

一天，张随全班到乡下劳动，当他看到他的前中学校长正蹲在河边洗衣服时，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位女校长在几年前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她的头发都白了，看上去神情黯然，疲惫不堪。此情此景激发起张强烈的同情心：

那一瞬间我努力不让自己流露出任何轻慢或惊讶的表情，我不能让人看出来我在注意她。我只敢从眼角里悄悄地瞥她几眼，因为我不愿意瞪目结舌地瞪着她看。我觉得那简直等于在说我瞧不起她，就好象因她是右派我才看她。我要把她当成一个普通人来对待。当时我感到非常压抑，非常难过。我不很明白这一切，但我觉得整个情景都很可悲。

同情阶级敌人或是意味着与阶级敌人站在一边，或是意味着“没有阶级立场”。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要受到严厉的批评。我所调查的其他中产阶层学生（除了一个父母被打成“右派”的），都没有产生过类似的同情心。

张为了入团，试图尽可能地遵照政治程式行事，但他的表现总是不合要求。他就是不能够自然而然地流露对团支部的热诚，或者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表态，或者象区和白那样表白对组织的感情。上高二那一年，他的老师想要增加他进大学的机会，便就他的入团问题询问团支部意见，但毫无结果。

不过，张担任了两次职务，在性质上都是属于比较进步的；他成了班里的读报员，每天早晨负责给大家读报，解释报上的重大新闻；此外，当学毛选运动开展起来之后，他成了学习毛著的辅导员。也许人们会以为应该由做为政治先锋的团员们来负责这项宣传和阐述政治知识的任务，但恰恰相反，是张一个连团都入不了的人，担当起了这个责任。他自己总结说：

很奇怪，我在班里虽然没有政治地位，却有政治资本：我是指负责组织需要专门知识的政治活动的能力。所以我在班上不属于那些被人瞧不起的学生之列。我就好象社会上存在着的许多无权无势但却因为自己的才能而不可或缺的人一样。

18、邓：抱有实用观点的青少年积极分子

邓从上初中起，才逐渐形成了对于道德价值观、政治价值观的一点有限的把握。他的学校是离家较近的一所三流中

学，由神殿改建而成。学生大部分是小市民家庭出身的子弟，比如城市人口里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一部分市民的孩子。他们对于学习普遍不感兴趣。当时，学校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维持良好的秩序，而不是教授知识与培养政治觉悟。

虽然在学习上、政治上都缺少进步的动力，邓还是结束了他顽劣好斗的生活，尽力保持足以使他的父母感到满意的分数。但他在班里默默无闻，也不太喜欢结交朋友。他在小学里养成的“酸葡萄”态度仍然没有消除。

他上初二的头两年正赶上全国性的经济困难时期。在那段时间里，我所调查的学生都程度不同地挨过饿，但是谁也不及邓的感受深。饥饿感破坏了他对生活中其他方面的回忆；对他来说，那是一个十分艰难的阶段。他的父亲调动了工作，母亲是国家干部，忙得不可开交，家里还有个生病的哥哥，年纪轻轻的邓不得不承担起所有的家务，而偏偏那时候买什么东西都得排队：

我对初中时代的最深印象一是挨饿，二是帮家里买东西。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买的卷心菜被无赖汉抢走了好几棵。我还记得新年前买熟食的情景。我哥哥有病，专门花十块钱给他买了猪肉，又花了一块二买土豆来吃。

让他努力回想其他事情是徒劳无益的：他对于班级选举的印象，他当时对团的态度，全都一片模糊，忘得一干二净了。他从来不曾把注意力集中在这样的事上。

但是，把一些断片串在一起，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一些在那

些年里逐渐形成的邓的个人品质。他已显示出喜欢独立思考的倾向，对于权威没有什么敬意。在这些方面，他与张十分相似。至于区与白，尤其是区，则对老师非常尊敬，而且相信政府的一切言论。邓却不然。举例来说，当老师企图减轻学生们因缺少食物而生的不满情绪时，邓认为老师所找的借口十分虚伪，把这件事当成反面教材记了下来。在班上，他还和大多数学生一起，讽刺那些“假积极分子”。他甚至对公安局也毫不敬畏：有一次他因和邻居家的孩子打架而被公安局拘留了一夜，他便用脚狠踢拘留室的门以示反抗。

但他也是有自己的抱负的，虽然他不象区那样为了官方授与的荣誉而拚命努力——因为他身上仍有叛逆精神的痕迹——但他也决不象张似地对这种荣誉漠不关心。

报考高中时，邓对自己的成绩十分自信，申报了一所远在郊区、代管食宿的重点中学。他父亲为保险起见，建议他不如报考技术高中，否则，万一将来考不取大学的话，前途、工作就十分渺茫了。但邓的母亲自己就受过高等教育，准备冒这个险。邓本人呢，因受知识分子家庭的影响，认为考高中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情，而去农村扎根虽然光荣，却“不合常情”。他把握十足，根本没考虑过还存在着下乡的可能。

果然，他顺利地考取了自己选择的学校。他充满自信，下决心要好好学习。不仅如此，他还开始进行自我修养，这与他在初中时的行为倒恰好“相映成趣”。他在母亲为了祝贺他考试成功而特意送给他的本子里写日记，成了他们班第一个记日记的人。当时，这种习惯还没有流行开来。但他的

自我品德修养和我所调查的其他学生相比，显然理想主义色彩要淡薄得多（我所说的学生们不包括那个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孩子和——十分有趣——一个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子弟）。他加强个人修养的主要或最终目的并非为了集体利益。他对党和毛主席没有特别强烈的感情，也并不感兴趣是否该为他们服务：

“害，当然了，你应当爱他们。就象任何一个人出生以后，母亲就是母亲，父亲就是父亲，哪怕他们没什么特殊的地方，也得爱他们。现在你出生后，发现国家领袖是毛泽东，那么你就当然该热爱他……至于忠于党，这是与生俱来的，从你一落生，你就该着忠于党。你干吗还去考虑呢？这就跟你从一落生就长着头发一样，你从来不问自己我为什么要长头发……我这么跟你讲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太多地考虑忠于党这个问题，我的忠诚是十分自然的。

他感到自己远远落后于“一个有觉悟的社会主义青年”所应达到的标准。当他学雷锋时：

“哦，就我个人来看，我是同意过雷锋式生活的。一个人不应当害怕吃小亏。”

问：但是雷锋身上还有其他品质呢，象忠于党，崇拜毛主席什么的。

答：啊，这对我影响不大。那种忠诚啊，崇敬啊，都是感情方面的东西，不是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习雷锋

的为人处世之道。

当邓学习一个人时，不管这人是雷锋也好，还是一位老师、同学甚或毛主席本人也好，他都抱着十分实用主义的态度。他的目标既微小又直接。他仔细观察并精心选择别人身上他认为是可贵的品质，然后迅速认真地加以学习。他学习某位老师走路的姿势，某个同学与人交往时温和有礼的态度，另外一个同学的谈话方式。同样，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他忽然发现自己缺乏政治理论基础，而那对于写一手漂亮的大字报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于是他立刻开始钻研毛泽东思想的论著。他做事极少从理想主义角度出发，他最关心的乃是一切行动都必须产生实际的、有用的、明确的后果。

所以，他学雷锋主要表现在多做事而并非表现在培养一种感情上。当随班下乡劳动时，他主动收拾农具；当没人扫地时，他便拿起扫把；当与人谈心时，他尽力做到循循善诱。这就是他所谓的“不应当害怕吃小亏”。但他并不认为这种热心公益的表现可以和“革命精神”相提并论：

问：你觉得自己很“红”吗？

答：当然（说话时显得十分自豪）！我没有什么不纯洁的思想动机。我算是个比较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总觉得应该对国家，对世界承担一份责任。此外，我还觉得既然生活在和平年代，就必须做一些小事。

问：不做大事吗？

答：也就是雷锋做过的那些事罢了，除此之外还能干

什么呢？（说到此处语气变得尖刻了一些。）

问：那么你对将来是怎么打算的？

答：为国家设计机器呗，这算不了什么。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思维方式，但是他一语道破了一个我们一直都在讨论的重要问题：在当时的和平年代里，虽说打着“革命”的旗号，实际进行的却是建设性改革，因此，青年人所做的贡献也自然与老一辈不同。他们生在红旗下，父辈靠流血牺牲争取到了光荣的胜利，他们没有必要再去赴汤蹈火了。在学校里，他们唯一可以从事的“革命活动”就是做雷锋式的好事。至多等他们长成以后，为这个依然还很贫穷的国家发展经济做出贡献。但在六十年代，就连实施邓心目中的这种“小事”也变得愈来愈困难了。学生们面临下乡扎根终其一生的可能性。阶级界限的日益分明直接威胁着他们进大学，而完成那些“小事”是进大学的必经途径。“革命表现”的涵义已经出现了变化，越来越倾向于做琐屑的好事，程式化地表白忠心，并完全与集体保持一致。

和张一样，被青年毛泽东的榜样所激励，邓对这一切的反应就是加紧锻炼身体。他制订出一个十分详细的每天的锻炼计划，清早当别人都在沉睡的时候，他已经起床跑步锻炼去了，晚上，熄灯前他还要在宿舍里进行更多的运动。他一丝不苟、刻苦认真地实行计划，以至于到了后来，虽然还算不上正式的运动员，他却在速度和体力上都堪称达到冠军水平了。可这是为了什么呢？毛主席，还有张，他追随毛主席的榜样，进行体育锻炼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自己的意志，给将来

的革命做准备。白纯粹是为了维护健康，他认为健康与革命是有密切关系的：建设社会主义——他是照字面意思来理解这几个字的——需要一副强健的体格。邓则有他自己的理由。

首先，他可以借着体育锻炼挽回他在球赛中笨手笨脚丧失的自尊。他相信适者生存这句话，因此他把身体的强壮看成一种能力，认为它十分高超而优美，在跑步与体操上略胜一筹成为他表现自我和向人向己证实自己价值的方式。不仅如此，通过坚持实行自己的锻炼计划，并拒绝每天和班里同学一起跑步（他说，他的同学们围着操场跑，就好象“一群小鸭子”），他事实上是在不甚自觉地与其他人竞争。他想显得与众不同，使他们认清他不是平庸之辈，他是“纯洁高尚”的。最后，他已不知不觉地把这种表现变成了违反组织纪律的机会。团支部批评他，说他不该以个人的锻炼计划影响集体。何况他的早起晚归也已干扰了别人休息。他却对此毫不理会，仍然固执地我行我素。因为团支部的批评越来越严厉，他不得不暂时妥协；但他不愿与集体一致与缺乏组织性纪律性的事实已经很明显了。在体育锻炼中，张和邓都表现出了很强的毅力；他们也都企图通过体育锻炼来表现自己。

此外，邓的努力也是为了吸引他人的注意。他觉得他的能力被极不公平地忽视了。他的分数不坏；在劳动中的表现，据他自己介绍，是相当出色的，但他从未获得过劳动积极分子的提名。他和我谈话时，一直在抱怨这个问题。把他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归结于他不会象其他人那样说“甜言密语”；也不会搞那种当着老师与团支部的面劳动特别

积极，等他们一转身却又是另外一套的鬼把戏。

虽然张和邓都觉得委屈，但张主要是因为他干革命的热情没有得到注意，邓则为了自己的能力未被承认。张的不满与内心的骚动结合起来，邓的牢骚却公开化了。他不断琢磨自己高一申请入团遭到拒绝这件事，最后终于得出结论说，一个人不入团也可以——甚至更可以干好革命。言下之意，那些团员们未必见得都是革命的。他写了一张小字报陈述自己的观点，并把它贴在教室的布告栏里。这种举动非常大胆，因为他直接攻击了团组织作为青年先锋的合法性。小字报引起了一场风波。整个班级分成两大派：团员和积极分子，其中大半是女生，站在一边，非积极分子则站在邓的一边。接连好几天，两个阵营都抛出大量小字报，使全班面临着一次小小的危机。

这种有关某些基本问题的公开辩论在中国的学校里不很常见，但类似的事情都无独有偶。在一场称之为“革命化”的运动里，一个和邓同在一校的接受调查者挑起过与此相似的事端。那个运动旨在号召学生们接受更加严格的要求。中午休息时，甚至专门匀出一个钟头供各班班长们到校园各处宣布新的规定，而这个接受调查的学生却有意在那段时间里读革命小说。他为此受到了批评。于是，在他与班里其他同学之间，爆发了一场以小字报形式展开的辩论。

这些事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青年人表达他们不愿被同化而追求独立自主的渠道；同时，也被看做是对于现存制度的潜在威协。随着辩论的不断升温，那些大胆轻妄的行为本身之对与错已经不再是争辩的主题了；团员与积极

分子们的根本目的在于反对这种不受权威制约、采取过火方式、违反组织纪律、影响集体一致性的行为的自由化性质。

对这两件事，校领导都没有插手，任风浪自然平息。也许，这是因为和官方不尽一致的非正统观点也有它一定的道理吧。虽然为了批评邓专门举行了一次特别班会，但在开会之前，老师私下里委婉地向他提出放弃此事的建议，邓也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开会时，老师果然只轻描淡写地把这件事提了一下，就岔开话题，谈到别的问题上去了。事情不了了之。

邓期望自己的能力得到别人的承认，并不意味着他要求拥有权力。一切事实，包括他终于获得一定的政治基础、群众基础之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也都说明邓没有什么大的野心。他和区不同，不认为“革命接班人”和权力、干部地位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他对“革命接班人”的理解是：“既然我们是新一代，我们当然是革命接班人。”他也不愿主动争取入团。觉得那是对自己的正直的出卖。他很瞧不上那些把自己降低到替别人洗衣服的人，还有那些留下明显线索以使团员注意到他们做了好事的积极分子，他在自我批评会上痛哭流涕或与家庭“划清阶级界限”的学生更是不屑一顾。与张相比，他所处的境地还不需要他如此行事：他的家庭虽不属于红五类，但他的父母都是中等阶层的国家技术干部；至于他的学习成绩，在一所重点学校里也算是名列前茅的。

在邓上高中的最后一年，他确实又提出了一次入团申请，因为一个人在遭到拒绝后也仍然是可以不断递交申请书

的，而再次申请入团这桩行为本身便被当成是思想积极的表现。在提出申请和得到批准之间的这段时间，申请人要用实际行动向团员们证明他的革命热情。邓知道他入团的希望很大，因为这次申请是在一位老师的鼓励下写的，那位老师很喜欢邓，愿意看到他进大学的机会有所增加。而老师本人又是团员，所以他参加了团支部会议。这样，邓终于在高中毕业前的一个月，得到了团支部批准他入团的通知（但由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邓的毕业与入团都被无限期的耽搁了，邓终于没能成为一名共青团员）。

那年春天，当邓的入团申请还迟迟未批之时，他不得不对未来作出选择。他权衡了一切轻重得失之后，申报了一所农业大学：

我的思想多多少少还是比较进步的。我觉得一个人的知识必须得到实际应用，才能服务于社会……那时，我责备那些惯会说漂亮话（即申请下乡）但心里却想着考大学的人；但我认为走相反的路，不报考大学而一心下乡的做法也没有必要。反正我不会这样做。我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

这种选择无论从实际效果，还是从思想上看，都很有好处。在城市学生里，农业大学是高等院校当中最不受欢迎的。邓决定不去报考更难考入的普通大学，便减少了他被送往农村扎根的可能性，他对于终老农村毫无兴趣。而报考农业大学也完全符合为人民服务的理想。看来邓总是选择这种

中间道路，在追求理想与不忘现实之间小心谨慎地保持着平衡。

19、阶级阵营和统一性的加强

通过研究以上四个例子，我们可以注意到，文化大革命爆发的两三年前，学生之间的矛盾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阶级界线问题，它使学生们分裂成清晰可辨的四大阵营：干部子弟，工农子弟，中等阶层子弟，出身不好的子弟；二是为了获取政治资本进行的竞争，它把学生们分成积极分子和未能得到任何职位的普通同学。

邓所在的班级为以上所说的分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班里有很大一部分学生是干部子弟。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建立良好的声望，坚持录取那些大学招生办的老师必会青眼相加的学生，即：（1）中高级军队干部、党的干部子女；（2）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未能考入市内寥寥可数的几所最有名学校的尖子生。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工农子弟，少数中等阶层、非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孩子，和不多的几个出身不好的学生。

在高一，邓所在班级的活动全然被初中入团的同学们控制。他们当时刚刚跨入六十年代，阶级背景还未成为十分重要的因素，所以团员们不乏出身于中等阶层、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弟。如果有机会上高中的话，她就会成为所谓的“老团员”。在高中三年（1963—1966年）内入团的新团员们则

大多是“根正苗红”的。到了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把所有中等阶级与出身不好的学生放在一起，只有三分之一是团员，而干部子弟则全部在团内。后者的团员身份建立在他们的“自来红”基础上，很快就使老团员黯然失色了。老团员们担任团内职务只到1964—65学年，他们自然而然觉得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但新老团员之间的矛盾一直隐而不露，直到文革期间才得以爆发。

干部子弟一般来说自成一个集团，和其他同学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们的天地在政治方面十分特殊。父母是革命老前辈，他们靠着祖荫，经常可以听到一些内幕消息，权威性地夸耀于普通同学。他们中间也有等级差别，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他们父亲的官职相一致的：高级军官与党员干部的子弟在中级行政官员的子弟之上；省级干部子弟在本地干部子弟之上；中等党员行政干部子弟在普通干部子弟之上；后者又在工人子弟之上；而工人子弟则在农民家庭出身的子弟之上。虽然“红五类”三字便可一言以蔽之，但干部子女与工农子弟之间在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社会环境与生活方式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别。

在邓的学校，大多数干部子弟都不象其他人那样在学校食宿，而是回到附近干部宿舍区的家中。他们每天骑自行车上学，而对于中国当时的高中生来说，自行车还是一种奢侈品。有的人甚至被小汽车一直送到校门口。邓到他们家里做客时，对他们物质生活的舒适甚感惊讶，尽管邓自己家的经济水平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一般来说，干部子弟不象他们中等阶层出身的同学那样

急于表现得积极。我调查过一个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他说：“如果我想入团的话，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因此，干部子女用不着担心自己的前途。他们知道有“自来红”在后面撑腰，就连团员身份对于上大学也并非多么重要。他们甚至相信，靠着有权势的父母，就算他们不读大学，前程也绝不会受到任何影响。部分是为此，干部子女的学习成绩一般不如中等阶层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那样优秀。他们原本就缺少刻苦争先的动力。

但他们全部真心相信既然自己是“自来红”，那就注定了他们的天性要比别人革命，因此他们就有天赋的权利成为革命事业和权力地位的继承人。他们还认为自己的“红”是内在的，不需要再将它外在化，即用实际行动加以表现。而且，因为无人对此提出异议，他们所受到的要求他们表现积极的社会压力相对来说就要小得多；他们不怎么用得着“假积极”。事实上，他们和中等阶层出身的那些叛逆者一样看不起“假积极”的行为。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积极”意味着驯服、顺从、遵守纪律；但这些干部子弟在社会上有着很高的地位，家庭优越感十分强烈，又习惯了享受父母的下属对自己表示的尊敬，这一切都促使他们形成了一套与团组织、校领导规定的要求全然格格不入的行为模式。至少他们中间有一小部分人似乎是被骄纵惯了，显得十分桀骜不驯。

为了和学校里其他学生相区别，邓的那些军队干部家庭出身的同学穿上父辈留下的旧军装，作为他们这些人的身份标志。战斗英雄的传奇故事为这样的服装增添了英雄主义色彩。邓一心追求体力上的强健，对军人的孩子自然备感羡慕。

慕；但他和其他学生始终不敢穿军装，怕被别人斥为僭越。只有到了后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军队干部子女失去了他们的优势，穿军服才成为一种时兴，在大众之中普遍地流行开来。

干部子弟不但对入团不甚关心，甚至于不大把团放在眼里，认为共青团有一种相当不纯的群众组织的味道。到了高中快毕业时，一个班有三分之一甚或一半学生（例如在邓所在的班里）都是团员，共青团作为“光荣的”、吸收了最优秀分子的组织的形象自然受到了破坏。邓认为这种心理正是文革开始干部子弟组织起第一批只许他们自己参加的红卫兵的原因。

在学校里，干部子弟和出身不好的学生恰好形成了两个被明显区分开来的极端。出身不好的学生为了弥补他们“政治资本”的缺乏，不得不拼命学习。他们觉得自己唯一的希望就在于取得出类拔萃的学习成绩，以求使政府忽略他们的阶级出身。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越学得刻苦，成绩越优秀，就越衬托出干部子弟在学习上所处的劣势。这难免招来了干部子弟的嫉恨，他们只有指出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对表现积极漠不关心，以此作为他们实质上是些“落后分子”的证据。

在遭受轻视和非难的出身不好的学生中，颇有几个不甘心退出政治竞争的，他们或是出于对党真正的忠诚或是出于某种个人动机，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但是为了入团，为了做为政治上可靠者得到他人的承认，他们不得不接受种种既严峻又有损自尊的考验。最后的也是最难的一道关是与家庭划清

界限，而且必须是十分严肃的，就是说要揭发父母的“反动本质”。只喊喊程式化的口号是不行的。提出这样的要求，是为了逼迫他们在思想上与家庭彻底一刀两断，据称这对巩固青年人对党的忠诚很有必要。

但是大多数出身不好的子弟不愿背叛自己的父母。连那些坚定不移地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并真心认为自己的父母反动落后的学生也不例外。当时的口号是“教育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但一般来说，出身不好的青年所受到的巨大心理压力却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要求他们脱离家庭的压力越大，他们就越倾向于和家庭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那个资本家家庭出身的接受调查者这样说道：

虽然许多出身不好的学生对于共产党没有多深的感情，但还不到反对它的程度。可划分阶级界限的结果却是把我们推向了另外一边。那些本来并不反对国家制度的人现在开始觉得不满了。实际上，曾经一度还是有机会赢得我们的心的。

他们发展起了自己的逻辑，有自己的一套道德标准，“要是我们变‘红’了，我们就等于在自贬人格。”他们要保持自己内心的正直。于是，他们对于政治上的号召尽管服从，但异常被动，而且经常地不予妥协。

中等阶层的学生，尤其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是地位一

直仅次于干部子弟的宠儿。早在五十年代，他们就可以通过入党和接受高等教育获得升迁的机会。因为这些孩子学习成绩都非常好，所以还在上小学的时候，他们已经能够比较容易地当上学生干部。象我们已经观察到的，由于受到家庭的熏陶，他们组成了学生当中成绩最优秀的部分。他们一般来说都接受了这个社会制度，决心献身于国家提倡的意识形态。

这些学生从思想意识的角度出发来考虑，也很为自己的学习优势感到自豪：他们认为这对建设国家是非常有用的。他们相信自己真正做到了又红又专：“血不红，心也红。”可是，随着阶级界限的日益分明，他们发现自己的有利地位受到了出身好的学生的挑战。渐渐地他们越来越需要用政治上的表现来弥补“自来红”方面的不足。但到了六十年代中期，竞争的意识增强了，一些出身好的学生嘲笑他们，说他们缺少“真正的”阶级感情，他们在政治上表现得那么积极，无非是为了往上爬。正是由于害怕遭受讥讽，他们才成了学生当中最急于证明自己积极是毫不掺假的人。这种证明不仅给别人看，也是冲着自己来的。

中等阶层子弟的群体感不如出身不好的子弟那么强。只有在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受到挑战时才会产生这样的群体意识。不过，他们并不因此对党划分的阶级界限产生疑问。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对出身不好的学生仍持歧视态度，部分是由于社会压力，部分也是由于他们真心相信那些遭受社会摒弃的同学心中可能怀有“阶级仇恨”。不过与此同时，他们也不愿承认出身好的同学比他们更“革命”。他们十分蔑视那些用不着显示任何才能与忠诚仅靠出

身获得职位的学生。干部子弟受到父辈荫庇，舒适安稳的生活方式与无产阶级艰苦朴素、忘我无私的形象也十分不协调。他们从这些同学身上看不到什么“无产阶级天性”。

他们既认识到干部子弟不配得到很多的尊敬，又发现工农子弟在学习方面成绩落后，许多中等阶层出身的学生便相信他们是新一代青年人里面最有资格得到权力与信任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这种野心没有得到过十分明确的表示，但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私下里早就对于影响了他们升迁的阶级界限进行过反对了。

工农子弟里比较有报负的，知道他们在学习方面无法与中等阶级、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弟相匹敌，便寄希望于依靠“自来红”的出身，在学校达到和他们同等的地位。于是，他们自然十分欢迎升学和入团时重视“红”甚于重视“专”的录取政策。但在与干部子弟竞争时，他们就又低了一个层次：他们的父母只是革命的接受者，而非发动者。根据阶级界限理论，他们在性质上似乎不如干部子弟“革命”，这样工农子弟便对干部子弟政治上的优势与中等阶层子弟学业上的优势感到了双层的嫉妒。但他们和中等阶层子弟不同，还不至于胆敢象干部子弟挑战。他们唯一可以凌驾于其上的学生就是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以后我们将会看到，在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早期，他们凭着这种自以为是的优越感，是以何等不怕的形式表现出了他们的不宽容。

不断冲击着中国学生的第二个主要问题是由于争当积极分子引起的。我们已经注意到，五十年代的程式化教育一方面要求学生活跃主动、富有创造力，一方面又要求他们自制克

己、遵守各种纪律，服从集体的意志，这是十分自相矛盾的。在观察六十年代的高中生之后，我们可以发现，服从集体、遵守纪律的要求无论是在攻击杜威主义的文章中，还是在城市教育体制中，都已大大占了上风。青年人几乎没有得以显示个性或发挥创造力的渠道。我所调查的大多数学生都感到自己已被不断要求他们与集体保持步调一致的号召束缚得失去了活力。一般说来，他们不象张那样离经叛道，但同时也决不象区那样肯于顺从，因此，他们还是会不时感到一种想要宣泄个性的冲动。

更糟的是，许多人都觉得俯首听命是十分虚伪的。随着学雷锋运动的开展，学生们一方面觉得道德上的要求增强了。一方面这个同样的运动也会把学生推向反面。学生们都想自发自愿地表示忠心，有些人甚至打算把争当积极分子的活动变成提高认识，实现自我的途径。但在学校里，积极表现成了取悦于当权者以获得更多升学机会的手段。我所调查的许多学生都有过这种张所说的“痛苦的经验”。

那些充满自信地扮演着积极分子的角色的学生，或是和白一样，完全以党的政策信念为准来调整自己的是非感；或是和区一样，绝对信服自己的上级领导。他们对于外在的行动方针从不怀疑，也从不运用内心的道德观来判断它的对错。因此，对于他们来说不存在什么虚伪不虚伪的问题。他们只要按照合法权威的意志行事，就觉得自己的行为是合乎道德的。与此相反，有好几个接受调查的学生在表现得积极一点的时候，看上去却犹犹豫豫，甚至十分不自然：他们与张相似，倾向于接受内在价值观与是非感的指引，对外在权

威给他们规定的道德标准不甚在意。对于他们来说，积极表现总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心理矛盾。

这几个接受调查者在谈起过去时，总是回忆说，他们受到的压力是无形的、难以名状的。和那些因出身不好而遭到社会歧视的学生相比，他们全心全意地信任现存的政治体制，因此也就无法正确全面地认识当时自己所处的困境。虽然对阶级界限影响了他们的升迁机会感到不满，但既然阶级界限是党和毛主席规定的，他们就绝对不敢提出任何异议。他们受到集体主义的束缚，却并不责备真正局限了他们的政治教育体制，而是把不满发泄到所在班团支部的一个个具体成员身上。他们自己对于积极表现的性质心存怀疑，认为许多团员都具有他们自身所担心的虚伪。他们还按照自己的意思曲解了“红”的含义，把这个字用来轻蔑地意指那些缺乏真正革命觉悟的积极表现。当他们称某人“大红人”、“红得很”、“红极一时”或者用句土语“红得发紫”来描述他们的时候，多半意味着这个人是个机会主义者，一心只顾往上爬。对于他们来说，官方所定的积极分子和“自来红”都不算真正的革命。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这些未得到承认的积极分子和“钦定”的积极分子发生了冲突，每一方都宣称自己更红更纯。更重要的是，不同阶级出身的学生也分成了敌对的政治集团。换句话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学生们是为了那些早就萌发的种种摩擦和敌意才产生了矛盾，不同的学生根据不同的出身而采取不同的态度，他们各自扮演着不同的有时是对立的角色。

不过，尽管存在着这些根本的差别，但在那场巨大的变

动之中，他们所显示的行为特点都是相似的：这是由于他们有共同的信仰，此外他们从小赖以成长的学校环境，他们所有人都多多少少受到过的压力也基本相似或者相同。他们对于做鸡毛蒜皮的好事向来心怀反感，现在这些不满全都通过为证明自己耿耿忠心所做的狂热努力发泄了出来。而表白忠心的方式就是极端崇拜被神化了的毛主席。他们的狂热表现在一连串自以为是，毫不宽容的行为上，包括把出身好的和中等阶层的子弟联合在一起痛打“牛鬼蛇神”。他们渴求进取的竞争变成了一场以暴力获得政治威望的武斗，每个红卫兵组织都企图压他人一头。总而言之，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里（尤其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爆发的头半年），一切可能有的政治倾向都在中国城市学生组织起来的各种团体当中戏剧性地出现了。

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政治 积极性的一次检验

1967年1月，在号召“夺权”之前的那些天里，天气相当冷。我漫步街头，虽然冷风扑面，却感到好象春风送爽。我体会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自由感。啊！太令人兴奋了。我庆幸自己能够生活在中国历史上的这一时期里，在毛主席的旗帜下成长。一方面，是毛泽东使我获得了新生，另一方面，使我体验到一种自由的崇高感。

被告张 广州中学造反派红卫兵副司令

文革进行到1968年底时，我们狂热异常。我们几乎一点儿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紧跟毛主席的步伐，而最后的结局却是成为阶下囚。

被告邓 中学造反派红卫兵总司令

1966年，当毛泽东为青年人攻击旧秩序大开绿灯时，青年人在文革前的那些紧张、敌视、愤怒、自暴自弃以及由压

抑而生的绝望，便一齐爆发为一场暴乱。青年人所作所为的思想基础是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然而，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些却成为他们表现情感追求和表示个人利益的基本根据。

两年之久的学生动乱，可以大致划分两个不同阶段。1966年的5月到那年秋天，学生运动具有一种无所顾忌的抗争特性，是一种在正统的和同辈群体的压力下面做出的反叛行为；是过去的一些年中，学生们对付课堂秩序的做法的翻版，但这次却更蛮横，更扩大了。第二阶段是从9月末到1968年的夏末。学生们的行为更加无拘无束。每个人都可以自行选择政治参与，政治上所经常承受的危险，在价值上远远超过了个性发展所期望的。由正统化的行为到放任自流的行为的这种替换，同时伴随着青年人在自我意识中对党的认识以及后来对毛主席的认识的变化。这种变化成为青年人政治社会化的分水岭。就在这两年里，他们的思想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20、第一阶段：正统化的运动

当回忆起文革最初几个月所发生的事件时，大多数采访对象都认为他们自己那时太幼稚。他们坦率地承认那时他们根本不懂数什么是政治。他们兴奋地高谈阔论，对接踵而来的一个又一个事件似懂非懂，思想敏锐但又十分混乱。

一开始，这场新的运动从总体上看似乎与以往的全国

性运动有所不同。66年的5月，学校领导传达上面紧急讲话的精神，并且在教室里或会议上宣读和学习报纸编辑部关于批判北京文艺界反党活动的社论。学校鼓动学生们写文章和大字报，揭露暗藏在文艺界里的反党分子，谴责这些人胆敢借古讽今，诋毁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学校里正规的教学计划很快便被挤垮了，学校允许学生们全部投入这场斗争。然而，正象所有的政治运动一样，学生们的所做所为都被看作是自发的。遗憾的是，一系列社论中那些谴责毛主席的敌人的陈词滥调却是通过学生们的的大字报表现出来，而且当局认为这样是完全必要的。于是，学生们尽其所能，把大字报写得铺天盖地。

6月初，北大一位年轻的哲学教师写了一篇大字报，抨击北大党委领导。报纸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大字报，于是，形势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变化。当毛主席公开支持这一大字报时，全国各地的学生们似乎理解了其中的含义。一开始，攻击的矛头指向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牛鬼蛇神”（这些人被批斗主要是根据他们的阶级出身）和“修正主义者”。这些人被指控为与党离心离德而且要复辟资本主义。过去这些败类只不过以极隐蔽晦涩的方式对学生们流露出来，而现在则公开跳出来亮相了。于是每一次“批斗会”都有明确的“批斗对象”，而这些批斗对象则是他们自己的一些老师。谈访对象们告诉我，当北京的学生已经批斗了自己的老师的 消息传开来的时候，他们所在学校的同学立刻效仿北京的学生，连夜赶写大字报批判老师有时甚至是校长。本来循规蹈矩的老师遭到了批判。批判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及，只

要是学生们所能想到的。从老师的教学方法，干活儿偷懒，一直到他们对政治形势和对毛泽东思想的观点，甚至还包括他们不准学生们踢足球。有一位访谈对象说：“只要你是老师，你就算麻烦了。”一般来说，不受学生欢迎的教师是难逃批判的，但由于批判对象人多面广，结果是几乎所有的教师都遭受过公开的辱骂。

高年级的学生则开始集中精力批判一些明确的问题。很多出身好的学生抨击教师是只专不红，偏袒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过分重视考试成绩。那时的批判还只限于写大字报和开批斗会（还未包含施虐行为）。尽管如此，突如其来的反对权威人物的运动仍然使他们十分惊讶，因为按照中国的传统，教师的威望甚高。一位访谈对象追述了他们班上温文尔雅之风是如何一扫而光的：

凡是当班主任的，总是管学生的。你会从心眼里感到他对你的束缚。班主任比其他老师还要厉害，因为写评语的是班主任。我们一到老师办公室就紧张得无所措手足，不敢乱说乱动。但是，一位从不把老师放在眼里的高干子弟那时却敢揪住老师的衣领，嘴里大叫：“你算老几，我们现在就要批斗你，好好想想，小心点儿！”我们那时象群小狗尾随其后，但又不知如何是好。那位高干子弟却揪住教师不放，把他拽到教室里。开始我们还能在老师面前装模作样，但那以后，所有这些假面具都被撕掉了。我们一进教室，班里其他同学目瞪口呆，看着我们回教室后的那付神气活现的样子。不一会儿，他们原来对班主任的那种唯

唯喏喏便一扫而光。那个老师浑身发抖，他做梦也没想到会有如此下场。声音颤抖，平时的那种神气此刻荡然无存。

学生们坦诚地相信，对教师权威的这种反叛，是为了支持毛主席，因为到处都暗藏着妄图推翻毛主席的“牛鬼蛇神”。他们内在的世界观使他们只会用非红即白来看待事物：革命的一方是纯粹好的，而它受到了纯粹恶的挑战。揭露暗藏的邪恶，目的在于证明自己在政治上的正义。总的来讲，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是正直的，在同辈群体的压力下，他们感觉到无论如何要做一名积极分子。

那时没人想到文化大革命会持续两年之久。人们认为这场运动是短暂的，是积极表现自己的大好时机。在我的访谈对象中，有两个人就在运动开始的几星期里违心地申请加入共青团。

但是，在那种初期的狂热消匿之后，当他们日复一日地搞单调的批斗和写大字报时，一种忧虑不安和灰心丧气的感觉出现了。尽管他们尽心尽力，但经常发现对他们的老师们并无实际效果。可为了表示他们是革命者，于是仍然绞尽脑汁，幻想通过整老师，便可以很快证明“反革命分子”的存在。学生们对此愈发熟练：就是抓住教师一句平常的话，任意发挥其含义，然后上纲上线，以此作为政治上存在异端的例子。他自己心里明白这是歪曲事实，但干的时候却又毫无顾忌，因为最重要的是要挖出“牛鬼蛇神”。对教师批得越狠，就越能证明是紧跟了正确路线。由此也就显得自己

很积极。在同学们面前，大家都急切地表现这一点。

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尽管他们并不十分明白这个词的含义）作斗争，以及出风头的激进行为的原因在于，他们的主观意识促使他们一定要“跟上潮流”。有一位访谈对象出身于“中间阶层”，他在班上的功课是拔尖的。一开始因在运动中表现不积极而受到冲击。然而他的一番话却说明，批斗运动也同样可以缓解像他这样的人的那种受压抑的情感：

长期以来，在学生们中间就积聚着一种潜在的不满情绪。运动一来，我们就寻找借口骂老师。由于社会上到处可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复辟资本主义”之类的标语，这样就可以以此来训斥老师。其实这些标语口号不过是一些大帽子，可以扣到很多事情上……那时人们的感情非常复杂。有些人想为国家做些事，可又不知他们能够做些什么，你自己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比如，你想多学些知识，以便为祖国多做贡献，但却报国无门……。虽然你很想为大家做些什么，可是连国都入不上。相反，入了团的人都是些乌七八糟，专搞各种阴谋的蠢货。不管怎么说，很多人都感到他们的积极性受到了压抑。我想这是最让人生气的事了。

我们只要看一看课堂上每天的那种气氛，森严的规矩，不断强调的绝对服从的压力，令人感到虚伪的学雷锋运动，等级分明的同辈群体结构，对将来到农村落户的忧虑，事情

很明了，这些受到压制的不满情绪必然成为后来运动的促进剂。然而，学生们不可能在政治上保持清醒。他们的政治个性过于依赖毛主席，为革命时刻准备着之心甚胜，这样，他们的热情必然要寻求发泄。不满情绪与献身精神混杂在一起，于是教师便在每一件事上都成了学生们的出气筒。过去教师凡事都要压制学生，这就阻碍了学生们证明自身的忠诚与奉献之心。这种反抗情绪包含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一方面渴望一种自我解放，而另一方面却又放弃自我而崇拜最高的权威人物。

这种无政府状态只持续了几个星期。1966年的6月，党派工作队进驻各个学校，企图稳定形势，控制这种混乱局面。工作队以文革要有秩序地进行为理由，把斗争的目标限制在一些年纪大而又出身不好的教师身上。在一些学校设置了“牛棚”（临时当作监狱的地方）关押这些教师。白天，挨斗的教师被迫干一些重体力劳动，或参加批斗会。批斗会上，他们或受批判，或遭毒打。

在政治运动中，干部工作队的职能一般是使局势处于严格的控制之下。根据意识形态的理由，阶级斗争本应是针对那些真正的剥削阶级，但工作队在运动的初期，却把一些只是出身不好的人也揪到了群众面前去接受批判。这其中隐藏着某种战略目的，既鼓动了学生的情绪，但又要处于党的领导之下。文革工作队不久便接管了学校的管理大权，恐怕原因即在此。为了把握住文革的方向，使其安全地在阶级斗争的轨道上进行，工作队反过来拉拢出身好的学生。每个班上都建立了文革的筹委会，指定红五类的学生为领导，非红五类

的团员被甩在一旁。

所谓黑五类的学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污蔑。被当作“牛鬼蛇神”揪出来的教师，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处在对于学生来讲是不安全的位置而被划分出来。但这次又有了新的升格。学生的阶级出身也成了他们揪住不放的问题。出身不好的学生为了避免招惹是非，只能在这种阴影笼罩之下被动地适应和小心翼翼。他们这些人对政治运动几乎没有任何兴趣和抱负。

相反，出身于中间阶层的学生则抱怨不给他们机会以证明自己献身革命的精神。他们把这场运动看作是期待已久的机会。可是再搞这种形式上的“批斗会”实在乏味并且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在这种批斗会上他们起不了什么作用。在后来的揭发工作队的会上，他们的这种不满便引发为指责工作队压制“群众的首创精神”。一位采访对象回忆道：

工作队组织了一些形式上的批斗会和讨论会。每天都在深挖暗藏的阶级敌人，批斗“牛鬼蛇神”，我们对此感到十分厌烦。不久他们又出了新招儿，组织学习班，让学生讨论为什么会有那种没什么可说的想法（指写大字报和批斗老师）。讨论的结果是我们的阶级感情不深。他们讲，我们要加强我们的阶级感情，绝不能对阶级敌人有丝毫的同情。要对教师的新的反革命言行有清醒的认识。这根本没有意义，没人愿意去这样想。当然，出身好的学生是自鸣得意的，每一件事情都对他们有利。事实上他们所干的事都是卑鄙而且恶劣的，他们唯一所做的就是梦想每天都要斗，斗，斗。

虽然这些出身中间阶层的青年人怨恨重重，郁郁寡欢。但他们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想到要造工作队的反。老师和校长的权威不复存在了，但工作队仍然不可冒犯。他们代表 着党，反对工作队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

7月底，工作队进驻学校一个月以后，毛主席突如其来地发布指示，要求工作队撤出学校。他指责工作队矛头向下，只对准那些没有权力的对象，这是企图压制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原则上并不反对由党发起一场反对非革命阶级的阶级斗争运动。但是他想使运动出现一个新的转折。66年8月初，在著名的文化大革命16条那份文件中，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当是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但是，究竟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确切地说，何谓走资本主义道路？没有一个清楚明确的界限。文革16条指示所提供的，不过是对运动的某种限制和具体指示——毛泽东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南。简而言之，任何人任何事只要是背离了毛主席本人的思想路线，就是“资本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就是“修正主义”。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是指那些在国家大政方针上敢于提出不同观点的人，以及那些希望按规律在经济上脚踏实地实现现代化的人。这些人的路线最本质的方面是要求更多地依靠一些“专家”。举例来说，就是那些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人。毛泽东把党的干部和“学术权威”这两类对象看作是一丘之貉，

党内的两种大政方针之间的争论，被毛泽东看作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一点可以非常明显地通过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教育政策上的冲突看出来。“资产阶级路线”旨在培养“专”，那样便使得以前资产阶级的孩子们能够获得更多的益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则要求“红”，也就是通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使教育有利于“红五类”的那些人。

为了争取“两条路线”斗争的胜利，毛主席准备改变政治体制。据他讲，在党的各级政府部门中都渗进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他需要“群众”的支持。而且，他准备让青年一代得到革命的锻炼，这一代人生活在社会主义的环境中但没有经受过革命的考验。他戏剧性地允许青年一代作为他的先锋队，以消除这种混乱。

对毛主席的目的以及他所赞同的人，我们今天已经有明确的认识，但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对于青年人来说是不清楚的。那些革命的陈词滥调所使用的言辞含糊不清，令人费解。什么叫“无产阶级文化”？能否举出例子？知道这一概念含义的人是不是就是指江青所标榜十年之久的那种文化？实际上，一旦把毛泽东思想看作是宗教教条，那么死抠概念便是离题万里了。

事实上，学生们所得到的指示经常是含糊其词的，以至于他们完全可以按自己的需要，用各种方式加以解释。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有一些便是由此而生。每个学生组织都有选择地摘取不同的革命词句，然后声称自己有毛主席的支持。出

身好的青年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牛鬼蛇神”身上，比如过去的资本家；以及那些很难斗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说是顽固的走资派），比如现在当政的人。当文革16条指示公布时，那些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认为他们自己与干部子弟不同，与现存秩序格格不入，他们相反地把主要的斗争目标理解为“当权派”。在学校里，当权派就是指那些党的书记和其他一些党员。

并不是文化大革命16条的所有条款都符合学生的意愿，一位出身中间阶层的采访对象只是把其中的第4条奉为自己的信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这些学生们感到，他们应该像干部子弟经常自我标榜的一样，把自己看作是群众的一员。当毛主席命令工作队撤离所有的学校时，其中的一些学生相信，毛主席正在让他们放手大干以维护自己。

但是，他们的期望很快便破灭了。工作队积极支持红五类的学生，要他们占据优势，当工作队撤离学校时，他们才感到自己仍然置于出身好的学生的控制之下。1966年3月18日，这种权力的移交戏剧性地确立了。当时毛主席在一次有北京红五类学生参加的集会上表了态。来自北京一些干部子弟学校的学生联合了起来，成立了一个新的非出身好而不能加入的

组织，也就是红卫兵。在集会上，毛主席公开地向新的红卫兵组织表示了他的祝贺。是夜，在广州，同样的红卫兵组织相继而起，从而代替了失去生命力的共青团。

干部子弟作为头目的这些新组织拒绝吸收出身中间阶层的青年，并且只是勉强允许一些工农子弟加入他们的行列。出身中间阶层的学生对被拒之新的红卫兵大门之外这一点，无论感到如何不安，但仍希望被毛主席所赞成的新的红卫兵组织接纳他们。他们自己另外召集起来，经过新的红卫兵组织认可，成立了所谓“红卫兵外围”的组织。虽然如此，这一组织的名称便表明，真正的带头人还是由那些出身好的学生所构成。这些出身中间阶层的人希望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有可能会被具有特权地位的红卫兵所提拔。他们仍然渴望得到正式的认可。

有一些出身中间阶层的学生发现，事情的新变化是他们无法接受的。为了向红卫兵挑战，有几个大胆的学生（他们的确十分大胆）成立了他们自己的与红卫兵并驾齐驱的组织。他们坚决主张，文化大革命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猛批学校党委，而并不是简单地揪斗“牛鬼蛇神”。被称为“少数派”的人，在红卫兵的严厉的攻击之下，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张和邓都是他们所在学校里少数派组成的外围组织的创建者。如同以前他们对团组织不大恭敬一样，现在对红卫兵也不肯俯首贴耳。邓尖刻地挖苦那些加入红卫兵圈子的人，说他们是自甘卑贱地去做“二等公民”。

几乎就在红卫兵成立的同时，一场扫四旧的运动使学生们在红卫兵的领导下走向街头，去横扫“旧思想、旧文化、

旧风俗、旧习惯”。他们在反动阶级的人家里翻箱倒柜，搬走他们的家俱，书籍和其它从性质上属于“资产阶级”的个人财产；他们辱骂并威胁那些成份不好的居民。其中的狂热分子主要是那些出身高贵的学生，这些人热衷于挑起阶级争端。出身中间阶层的采访对象讲，他们迫于要积极表现的压力而不得已跟随其左右，但他们仍然迷惑不解。改街道名称，砸教堂，辱骂那些胆战心惊的成份不好的人，这些固然很有些刺激。但他们也为把象征“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那些花瓶、书籍，漂亮的家俱，油画等砸碎，烧毁而困惑，因为他们很多人自己家里也至少有些这类东西，扫四旧的运动使得他们自己的家庭处境尴尬。

当干部子弟宣扬“血统论”时他们便加深了这种忧虑。首先提出“血统论”的是北京一些高干家庭出身的大学生。血统论的信条可以概括为三句很顺口的话：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历来如此。

以前，无论怎样论证革命阶级的后代其“本性也是革命的”，但仍然承认家庭和社会的影响，这在基本原则 上是存在争论的。新的血统论则排除了可以用政治上的积极和态度上的正确来获得革命品德的可能性，他们偷换并僵化了“革命本质”这一概念。干部子弟认为红色阶级和其它社会群体之间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从而在社会中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

沟。由此，他们期望削减社会中那些号称享有特权的人的数量，更重要的是消除那些主要的对手，也就是声名显赫的教授子弟。干部子弟甚至进一步排挤那些认为自己也有特权的工农子弟，把他们驱赶到革命阶级的最底层。从实质上，他们企图在世袭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类似等级制度的社会结构。

他们坚持必须重新审查每个学生的家庭出身，以保证在新的社会等级中每个人都有其相应的位置。在所谓“查三代”中，出身好的学生到他们同学家长的工作单位去调查档案。甚至一些工农出身的学生，迫于干部子弟的威逼，自己交待家庭的阶级背景是否正统和纯洁。很多学生由此才第一次真正了解了解放以前很久自己的祖父祖母都做了些什么。这种对“血统论”的盲目崇拜，明确地假定一个人的政治倾向也是生理上遗传的结果。血统论后来成为干部子弟为他们的暴力活动进行辩护的理由。他们骄傲地声称这种暴力是红色恐怖。出身不好的“牛鬼蛇神”教师受到的虐待越来越残忍。在一些学校，一些出身好的学生的小喽罗被派做牛棚的看守，对教师的虐待多少有所收敛。但有些其它学校，状况糟得令人发指。只要你出身好，就可以对“牛鬼蛇神”为所欲为。张描述了他所在学校里教师所遭受的惩罚。“他们在老师的脸上涂上油漆，然后让他们背着大石头围着操场转。只要学生们一敲锣鼓，就让老师说：‘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随后就是一痛毒打。”

这种暴行背后的情绪上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位来自贵族式重点学校（一所对学习成绩要求极严的学校）的采访对象讲了一些他的看法，可以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了解。

由于出身好的学生学习成绩不佳，他们总感到老师对他们有一种压力……。他们让老师背诵毛主席的语录：

“语录第某、某、某条！”事实上他们也不知道这些条语录是什么。“你们知道不知道？不知道？”然后就是拳打脚踢。接着又是一通吼叫：“背！知道不知道毛主席语录？”——鞭打——学！背不下来？好了，又是一阵痛打。老师辩解说：“我怎么能全都背下来呢？”“那你以前为什么强迫我们背书？”结果老师只得说：“是的，我知道我错了，我错了。”“哈哈，错了！”于是还得挨一阵痛打。

出身不好的学生学习成绩优异，出身好的学生心中隐藏着一种失败者的妒忌。由于他们是“自来红”，便采取了报复。他们强迫出身不好的同学不断地进行自我坦白交待，侮辱他们的家长，有的甚至打他们。我的采访对象中有3个人遭受过这种侮辱，其中还有一个是出身中间阶层的学生。她的头发被剪掉了一半，这种头发当时叫“阴阳头”，这标志着对她的一种政治上的惩罚。十年以后，每当她回想此事，仍然忍不住掉泪。

一个学校越有名，红色恐怖的暴力就越甚，因为这样的学校里集中了大量的高干子弟。根据血统论的逻辑，高干子弟认为，要表明自己是所有出身好的学生们中的最革命者，就要通过斗争来表现他们的阶级仇恨。而且，依靠父母的优越地位和权势，他们更可以肆无忌惮，对他人任意施虐。

这里有一个学校中的极端小例子：

血统论猖獗的时期是那么可怕。在一个初中三年级的班上，工农子弟坐在前边，职员出身的学生坐在他们的后面。最前面，桌子被堆了起来，象座金字塔。最高一层坐着其父官级最大的一个学生，然后其它人根据父母的官儿大小依次下降。他们面前烧起了一堆篝火，火堆前是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墙上映出了他们的身影。打！打！那些高干子弟轮番下来用皮带抽他们，有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吓得尿湿了裤子。如果裤子都尿湿了，就表明那种毒打已经是如何的令人毛骨悚然了。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都一样遭到毒打，挨打时发出的鬼哭狼嚎似的声音，简直是惨不忍闻。

这是比较罕见的例子，广州的红色恐怖比起北京相对要温和一些。北京集中了绝大多数的高干子弟。在北京，对反动阶级家庭的打击，已经达到了殴打致死屡见不鲜的程度，以致党的中央委员会不得不下决心制止这种屠戮。

十年以后，在香港一位革干出身的采访对象为他参与红色恐怖辩护道：

我不认为全部血统论都应抛弃。那些最反对血统论的人，甚至都不受他们自己红旗派的欢迎（红旗派主要是由一些出身中间阶层学生组织起来的，后来这些人成了保皇派），这些人俗气，平庸，而且十分自私，我对他们一点也不同情。他们就会吃……这是公认的。由于我不是攻击目标，因此我没有感到血统论的压迫。当然，被血统论当作

攻击目标的人是深有体会的……事实上，是攻击者还是牺牲者，这都不是个人的事情。这是上面来的精神……这些年来，党就是一直在使用血统论的，尽管没有公开张扬……。

一开始，他根据“阶级”偏见而争辩，但最后却推卸责任，把它归咎于社会制度。看来，极端行为的根子在于党所倡导的政治社会化的纲领：摩尼教*的世界观，对无产阶级道德纯洁性的盲目崇拜，阶级感情高于一切人类感情，绝不能对敌人抱有同情心的教育，大量充满火药味的标语口号，不断灌输的红色阶级的最革命者天生比其他人更革命，并且要为革命而献身。当毛主席警告说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时，“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正在“复辟资本主义”，因此，保卫他们的红色江山，同时也就是保卫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于是，他们竞相表示对剥削阶级，也就是“阶级敌人”的仇恨。

几乎所有的青年人，无论具有什么阶级背景，都在一定程度上抱有这种偏执的信念——独裁主义的癖性。出身中间阶层的学生在表现他们献身革命的热忱时，也同样施虐于那些他们认为比自己差的人。无论是感情上还是理智上，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公正的。但他们大多数人都深受红色恐怖之

* 摩尼教：波斯人摩尼在公元三世纪创立的宗教。宣传善恶二元论：以光明与黑暗为善与恶的本质，光明王国与黑暗王国对立，善人死后可获幸福，而恶人则须堕地狱。公元七世纪末传入中国，也叫明教，末尼教，明尊教。——译者注

害。虽然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可以免遭体罚，但大多数人都难逃侮辱。还有，如我们所提到的，只有极少数大胆的出身中间阶层的学生既敢反对血统论，又敢反抗红色恐怖。出身好的红卫兵不准大多数出身中间阶级的学生说话，但这些人并不惧怕他们的报复。这些大胆的学生相当干脆地蔑视这些正统论调，与干部子弟的统治地位针锋相对。这是由于毛主席给了他们以自己的支持。出身中间阶层的学生对国家的阶级路线方针还没表示过怀疑，为了使他们自己的地位合法化，他们认为不能不支持党的所有学说。

几个月后不久，1967年的2月，他们看到了对血统论的公开的相互争论；北京红卫兵的小报上开始出现了一篇宣言，这篇宣言把血统论看作为“新法西斯制度”。与此同时，一些出身好的学生提议，应当把出身不好的人从革命阶级中淘汰掉，就好象种族隔离一样。北京一所高中的学生甚至提出，对付这些人，就要用与南非种族隔离没什么不同的方法。比如，拒绝他们享受大多数的城市服务，并且把他们从首都赶到农村去。

21、第二阶段：自由化的运动

出身好的学生们成立了新的红卫兵组织，出身中间阶层的学生也形成了“少数派”，他们初出茅庐，缺乏经验，各自都试图按自己的方式筹划以后的政治活动。但是，对于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来说，独立活动的自由被剥夺了。他们受到

“红色恐怖”的威胁，被限制在学校之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过去受团员的监督，而现在就更感到束缚和压抑。

1966年的9月，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情况。当时允许学生们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连”。所有的组织立刻都解散了。学生们纷纷走出校园，分散到全国各地去了。有些人去北京，想看一看他们所热爱的毛主席本人；有些人想去瞻仰历史上的革命圣地；还有些人徒步走行上千英里或更长，想亲身感受一下“长征”的味道。外出串连固然令人兴奋，但那还不够，因为他们还要到革命首都北京去见敬爱的毛主席，这是一种朝圣似的远游。摆脱了过去几个月的紧张运动，也摆脱了那种正统的同辈群体压力的束缚，他们产生了一种解脱了的感觉。他们开始互相通信，交流自己过去在学校里是绝不敢讲出的一些感受。在他们自己的政治活动中，第一次不带有负疚感，而是形成了某种隐秘的动机。

1966年底，当他们回到他们所在的城市，许多属于原先红色外围组织的成员纷纷退出红五类的红卫兵组织，转而参加了张和邓建立的过去受到围攻的少数派组织，这一组织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新的提法越来越能维护他们以前的地位，因为运动的矛头主要是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越来越多的组织逐渐合并为人们称为造反派的红卫兵。一开始那些出身革干的红卫兵组织，现在变成了人们称为保守派的红卫兵，或称保皇派。

无论你是否参加红卫兵，参加那一派红卫兵，都是完全自愿。根本没必要炫耀自己的行为获得了正统组织的批准，因为所有正统组织都不复存在了。这样一来，过去受到阻挠

的青年人立刻有了希望——他们可以在一场真正的“革命”中表现自己了。

在那些高中学生们中，阶级出身是划分派别的可靠依据，干部子弟是占优势的一方，中间阶层如知识分子出身的学生是另一方。黑五类的子弟则绝大多数不出家门，远离政治漩涡才能使他们有安全感。

作为一个群体，工农子弟的立场在心理上是矛盾的。一般来讲，他们幸运的是在社会中属于革命者阶级，但同时，他们却受到干部子弟的蔑视。从经济上讲，他们既不如干部子弟，也不如出身中间阶层的子弟。从社交上看，他们在班上学习成绩较差，声名不佳。工农子弟处于两派之间的地位，在政治上何去何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自己的个人状况。比如，从事实上可以看到，有些工农子弟功课娴熟，成绩不错，在学习上不亚于出身中间阶层或出身不好的学生，因而对他们很少抱有敌对情绪，也很少讲什么阶级阵线。相反，他们却经常倾向于和保皇派们背道而驰。

再有就是，在工人阶级圈子内的一些小一些的高中生，在文革前跟随少数积极分子，并与多数非积极分子相对立。在这样一些班上，出身好的少数积极分子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处于支配地位。但到了1966年的秋天，多数人加入了造反派，从而有机会显示与少数派的对立。

与此同时，如表所列，与保皇派脱离的中间阶层的学生很多。于是，保皇派的阶级队伍相对来说是纯的，相反，造反派的内部却夹杂着各种阶级背景。而造反派却反攻为守，指责保皇派内部也是藏污纳垢：说他们是当权者翻手

为云，覆手为雨所愚弄的对象，是“阶级敌人伺机反扑”的帮凶。为了防备这种谴责，就是造反派也经常与出身不好的人保持距离，并且极少让这些人占据重要位置。常常是这样，为了提高他们组织的威信，他们推选一些出身好的“老好人”做组织的头头儿，而实际上起领导作用的则是一些出身中间阶层的学生，尽管他们是低一级的领导。即便如此，来自中间阶层家庭的造反派红卫兵的头头儿们，不称职的人占有极大的百分比。

文革期间广州中学红卫兵的派别划分表

阶级出身	学生人数	造反派红 卫兵 %	保皇派红 卫兵 %	逍遥派红 卫兵 %
革命干部	285	19	73	8
工人阶级	537	34	40	26
中间阶层 知识分子	664	61	7	32
中间阶层 非知识分子	302	40	10	50
反动阶级	399	36	4	60

总的说来，每一派别中都有少数中坚分子作为核心，多数人则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随风倒。特别是造反派目睹了保守派中绝大多数成员的这种左右摇摆。但是，并没有人看到有人摇摆到对立的造反派中去。因为造反派的位置总是不

稳定的，支持造反派的人的阶级地位在政治上是不牢固的，一旦境况不妙，作为可能的拥护者们便溜之大吉了。

几乎有两年之久，这两个对立的主要派别为了一些无谓的争论而相互斗争，你攻击我，我攻击你，用外国人的眼光看，这种现象实在是毫无意义。造反派常常伺机挑起事端而谋取权力，例如，他们认为掌握实权的人把党和政府引向歧路，另一方面，保皇派则尽力保护党的领导干部，并且只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内部一些次要人物。

但是应当明确，使青年人分裂成对立的两派的原因，事实上并不是这种政治上的攻击，而是不同学生组织之间的“基本矛盾”。这些矛盾冲突表现为人身攻击和鸡毛蒜皮类的小事之争。这种情形文化大革命前便已存在。再有，包括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在内的官场作风可以轻易地证明：引起红卫兵两大阵营分裂的，正是那种无原则的宗派主义。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提供更多的具体事实。为什么造反派红卫兵和毛泽东在最后越发背道而驰，这是和宗派主义有关的。

问题在于，为什么一些采访对象几年以后叙述他们当年红卫兵运动的经历时，非常不情愿地承认，任何组织和个人中都存在着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问题。一个原因是，很多红卫兵坚决表示，与文化大革命前学校中的积极分子们竞争不同，他们对个人利益并不关注，当文化大革命恶性发展到两派之间武斗阶段，青年人甚至欢迎不断发生的冲突，因为可以以此来证明他们的为革命献身的精神。他们把武斗看作是可以效仿革命先烈和革命战争英雄的场所，从而不再受像雷锋或“社会主义建设英雄”那种千人一面的模式的限制。

这种献身革命的极端形式，如我们前边看到的，就是像小说中所写的那样装腔作势地去死。一旦遇到这种机会，一些仅十几岁的孩子在这种最后的考验面前毫不畏缩；英雄视死如归，这一点为他们表现“牺牲”需求提供了重要的方法，他们可以以此证明他们的献身行为是名符其实的。有一位在桂林参加过造反派武斗的采访对象记述了他的经历，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例子了。桂林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城市，那里爆发了武斗的流血事件。他生动地描述了一些学生们对死亡所采取的狂热与浪漫的态度：

我和我的朋友们把我们的生活比作火柴盒里的火柴，如果一根根地划着它，那不过是一些很小的火光。而你一下把整个火柴盒点燃，那就会发出更大的耀眼的火光，尽管火柴还是那些火柴。我们觉得英雄的死，就好象点燃一整盒火柴。所以我们想，如果有什么地方可以为我们提供去死的机会，那么死亡就会变成一件幸事……。我们谈过不应该再继续维持毫无意义的生活了。那时我们都感到最重要的是，一旦垂垂老朽，死之将至，如果回首往事，我们的生活不能留下任何无价值的东西。如果我们能死，就去死好了。英勇地去死要比窝囊地去死强多了。最好的方式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壮烈牺牲，这是很值得一试的。这也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什么很多人对死亡毫无顾忌的原因。他们认为再没有比在文革中去死更合适的机会了。我自己这样想，我的很多朋友也这样想。

现在再谈此事，那种对死亡的态度就十分明白了，死确

实是一件悲惨之事。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认为这是为了保卫毛主席。那时我们为没能参加过去的革命事件而遗憾：如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是一些伟大的时刻。可对我们来说，我们的生活太平凡太庸俗了。是的，我们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但这些在我们的心中并不能激起令人振奋的向往。文化大革命中武斗一开始，一些青年人英雄气地谈论打仗的原因即在此。我认识的一些人，被民兵团困在一个山洞里，在被包围和饥饿的情况下，他们每天唱歌，唱那些诸如“毛泽东思想”一类的歌。民兵叫嚷着让他们出来，并告诉他们被包围了，但他们坚决拒绝出洞，最后，他们因饥饿而死——那是十多条生命啊！

当然，只有那些最浪漫的虔诚之徒准备如此去死。大多数人，如我们前边所讲的，在灾难临头之际，都及时地逃之夭夭了。尽管文化大革命前有些积极分子的行为看上去是微不足道和无价值的，但现在他们再也不会让自己陷于愚蠢的境地，去拼命证明自己的积极行为是名符其实的了。

22、造反派的信条

那些十几岁的造反派挥舞着“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的首创精神”的标语，把它看作是毛泽东的最珍贵的法宝。他们希望象成年人那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但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们从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红卫兵最高

司令部那里寻求指示和道德支持。经常是在北京开始发动首次运动之后，或者当某位中央领导出面发表声明支持以后才采取行动。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局限在他们所信奉的毛泽东语录的框框之中。有一个时期，几乎把毛主席的思想抬高到宗教教义的水平。除此之外，政治上的压力迫使他们挥动

“小红书”，以防对立派的攻击，也迫使他们摘取那些适于他们自己的毛主席语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结果是混乱的指责与反驳比比皆是，每一方都是在“打着红旗反红旗”。对毛主席语录、谈话、口号，有时使用的是正确的，但有时则是断章取义，有时甚至有意为自己的观点作根据。造反派的领导人最初只是在当时正统控制下造反，还不是对党的基本原则造反。

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武斗的骚扰，局势日益促使他们以自己的立场来寻求出路。而对每一次危难，都不得不做出自己的决断。从中央传来的指示经常模棱两可甚至自相矛盾。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就不团结。下达的指示十分混乱，而且指示来自许多高层领导，为了保持政治上的一贯路线，青年人发现，他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对毛泽东思想作出自己的解释和评价。也就是在此时此刻，青年人才表现出不甘受约束的气氛或思想上的自由交流。他们相互诉说自己的想法，用不着担心有人会报告团支部。像张和邓这样的人，以前总感觉自己是孤独的，而那时却有许多亲密的朋友，他们深夜讨论政治局势和策略，在红卫兵的小报上发表自己的见解，参加红卫兵组织的一连串会议，相互讨论并且争辩。由于形势所迫，他们不自觉地改变着自己头脑中的毛泽东思想，而不再

听信别人的讲法。

当他们为自己自发形成的红卫兵组织辩解并且进行政治活动时，他们逐渐发现一种与共青团所极力声称的截然不同的组织民主。1966年8月发布的文化大革命16条指示中提到了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制度和组织结构，这对群众组织来讲不啻是个启发。回到自己的组织内，他们便将理想付诸实践。一位采访对象说起过当时群众组织的领导人，他们根本用不着征得更高当局的同意。领导的候选人自由竞选，只要你同意某人的某种观点，那你就可以同意他做头头儿……如果他没有自己明确的观点，也就很自然地听其他人的，造反派的头头儿都得小心谨慎不要冒犯群众。即使群众是错的，他也不得不对他们表示一些认可。如果对群众不满，那他就得靠边站。这一切都是很敏感的，但群众拥护最高的权力……，一旦获得群众的支持，那就会畅行无阻，如果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就会被孤立，那你就是一个笨蛋。

这种想法很快就应用到国家全部的政治结构中去了。他们从一般的工作单位到省级领导，甚至中央委员会的最高层机关，把“走资派”一个个地拉下马，铲除这些僵化结构中的“政治垃圾”，他们认为，高层领导集团没有理由不实施巴黎公社的选举原则。一位采访对象把他见到的上述情况记了下来：

我那时就有这种想法。我认为那些大人物就应该象群众组织的头头儿所表现的那样。就是说，只要群众对头头们不满，就会把他们拉下马。当官儿的一般是上了台就下不

去。但是如果群众有权撤他们的职，他们也就不敢做很多违背群众利益的事。啊，我明白了一个国家需要民主的意义何在。事情就是这样。

当全国各城市的造反派们踢开党委闹革命时，这种认识正好给“夺权”运动火上浇油。当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传开时，群情激昂，引起阵阵欢腾。1967年初，一些造反派要求在中国政治结构中获得完全确定的地位——如果这一点能够实现，这就意味着过去铁板一块的组织系统完结了。

23、脱离毛泽东主义的规范

一些造反派开始相信，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了一个由革干子弟家庭组成的新生的特权集团：“红色资本家”和“新生的资产阶级”阶层。1967年秋天，一份众所周知的由一个湖南的中学生起草的红卫兵造反宣言——《中国向何处去》对这个观点作了十分恰当的说明，尽管这种新的认识很快就被看作是极左思潮而遭到北京中央领导的批评；但它在造反派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由于过去人们只习惯于用极端对立的两极来思考问题，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帝国主义——反社会主义势力对革命的毛泽东思想阵营，那么这种新的思想对于年轻一代的学生们所学的思想规范来说，便是一种威胁。

在一份列举了20种官僚主义行为的文件中，毛主席曾暗

示过他对党内官僚主义的关注。但是对官僚主义问题的清醒认识并不等于确实在社会中已经滋生了一个特权“新的阶级”。他只是用名目繁多的净化运动来给政界的官僚主义一系列的震动，尽管这种净化运动在解放以后的一些年里不时被中断。这种一连串的净化运动中，规模最大的当属文化大革命了。“95%的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他所喜欢重复的这句话间接地表明，他并不承认存在着一个享有特权的“新的阶级”。

在文化大革命的一片混乱之中，红卫兵造反派们是没时间去揣摸毛主席的立场的。由于对那些漂亮的政治口号的错误理解，他们根本看不到毛主席和造反派之间，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不仅存在而且不断加深的分歧。1967年1月，毛主席认为，如果把一切都变成公社，那么党怎么办？……无论如何，必须有一个党，必须有一个核心组织，基于这种认识，他曾反对过在上海人民公社中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治结构。毛主席曾指示，要以“三结合”为基础，也就是一个由军人、过去的干部和各种新团体的代表组成的联盟。这暗示着组织结构上的一些小变化。也将意味着一些老干部的复职和以往秩序的逐步恢复。

尽管我的采访对象们一直对巴黎公社式的组织结构称赞不已，但他们对建立那种政府的具体手段却知之甚少，既没有政治纲领，也没有长期计划。事实上，夺权以后（有时候不过是抱来一个官印），造反派连行使行政机关职能都感到吃力，经常是一些事情搞得他们措手不及。

1967年2月，军队开始进驻学校，以便迫使学生们“复

课闹革命”。并听从“三结合”的革委会的领导。造反被镇压了，但那只是暂时的。文化大革命领导者担心发生右倾，于是在4月又撤回了军队。但在最后，为了结束文化大革命还是再次动用了军队，而且革委会再次成为毛主席开的药方。

对于阶级路线，年青的造反派的愿望与毛主席的态度是不同的。1967年2月至3月，也就是军队暂时进驻学校的那段时间，阶级路线复活了。中央委员会在1967年2月的简短指示导致了阶级路线的恢复：

应当在运动中重新建立红卫兵组织，巩固和发展红卫兵组织。红卫兵应该主要由劳动人民（工人、农民、军人、革命干部和其它行业的劳动者）家庭出身的革命学生组成。但是，只要对毛主席怀有深厚的感情，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并且思想和政治表现一贯较好的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也可以加入红卫兵。

这意味着什么？这不仅意味着重新提出阶级界限，同时也意味着要以此划分同盟。重建红卫兵，那些各行其事的造反派组织将被解散，而出身好的红卫兵则被置于中央的统一管理之下。对于造反派红卫兵，尤其是那些“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人来说，这无异于又回到了1966年初夏党的工作队掌管学校的时期。1967年2月，进驻学校的军人把保皇派集合在他们周围。造反派们，尤其是那些头头儿们受到了批判，其中一些重要人物甚至被抓了起来。尽管遭到失败，造

反派却一直小心翼翼，没有公开表示他们对“阶级”的不满。

作为前两点不同的逻辑结论，造反派与毛主席的观点第三个不同之处，在于毛主席不承认在中国的学生之间存在什么基本的和主要的矛盾，以致把他们分成两派。于是，在1967年秋天，当毛主席想结束这场混乱的时候，他发表指示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没有理由在工人阶级内部建立敌对的两派。”在这条指示的压力下，两派再次合并为一个红卫兵组织，但这并不成功。持续的冲突被斥责为“无原则的宗派思想”。但正如我们早已看到的，两派之间的分歧决不仅仅是“宗派”争吵。明确的争论可以搁置一旁，各派的成员直接反映出班上文化大革命前的那种紧张气氛，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前就已加剧了的与阶级阵线有关的冲突。当这种紧张状态仍然不可调和地存在的时候，两派不可能握手言和。另外，也不能指望出身中间阶层的造反派会乖乖地接受1966年夏天时那种委屈的地位。

还有个“紧跟派”，他们无时不刻在追随潮流，而不管这潮流如何。他们一贯奉行毛主席的教导，从不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怀疑。另外还有一种“务实派”，他们看到形势不妙，便屈服于强暴。也有些“极左分子”，虽知道失败不可避免，却仍然顽固到底。这里有一位我的采访对象的描述，他谈到了促使他们这样做的那种无法摆脱的理想主义：

当我们的思想还很模糊的时候，中央在十六条中号召

我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当我们终于认识到，这是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关键问题时，中央却又突然不要我们这样做了。我们怎么能放弃这条原则呢？可我们总得服从中央呀！这实在是做不到。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么多的运动，我们也许能做到。但在经历了这一年多的所谓革命实践之后，它已深深地在我们思想中扎了根，这时突然让我们改变方向。我们实在做不来。在这一点上，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有些反动，竟然不听从中央的指挥。而实际上恰恰相反，我们仍然期望中央像以前那样给予明确的指示，指出合乎我们的理想、抱负和要求的方向。

幻想的破灭终于缓慢而又痛苦地袭向了那些真刀真枪地干过一场的造反派，如同上述那位采访对象所说的，他们用“反动”这个词来描述他们自己的非正统的思想，因为他们有一种思想框框，认为和毛主席不一致便是反动。甚至到1967年秋天以后，他们还不肯承认有关毛主席对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负有责任的种种迹象，而愿意相信他只不过是迫于形势的压力而做了一定的妥协。他们非常需要这种错觉来鼓舞自己低落的士气。

然而在1967年底，当学校再次置于军人管辖之下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变得沮丧、愤怒、痛苦、困惑、焦虑。在军方的监督下，两派的代表和复职的学校领导在谈判桌前坐了下来，准备协商建立一个革命委员会，而其余的学生则天天开“斗私批修”会。很多人拒绝上课。从1967年底到1968年夏天，有几个采访对象曾去全国各地串连，其它的人则抱着

玩世不恭和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留在学校。他们抽烟，喝酒，以此来对抗现实，而这在文化大革命前曾被他们斥之为“堕落”。那位来自桂林的采访对象，曾亲眼目睹了几次血腥气甚浓的红卫兵冲突。他回忆起当时由于精神刺激而产生的失落感、幻灭感和意志消沉时说：

当时的确有不少人在偷东西和砸东西，往窗户玻璃上砍石头，然后拔腿便溜，尽管我没这样做。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发泄自己的愤怒与失望。有一次，我们看见一只狗，就无缘无故地围了上去狠揍了它一顿。真是蠢透了。我们故意冬天去游泳，河水冰冷，我们全身都冻冰了，上岸穿衣时，我们感觉舒服多了。啊，那种僵冷的感觉！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这是在干什么，我们有点发疯，简直全变了。我们常常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唉！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们想找借口发泄一下，但又发泄不出。我们感到自己失去了一切：以往的那些希望和热情。这些东西空幻而不真实。真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感觉，就因为这个，后来去农村插队时，我就再也不愿多说话了。我觉得自己恨所有的人。即使对我不错，也觉得他们讨厌，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尽管1967年秋天建立革命委员会时，保皇派占了上风，但局势并不稳定。1968年夏天，两派之间突然爆发了武装冲突。这是最后一个回合，最后的制裁终于到了。军队再次进入学校，造反派的头头们被抓了起来。毛主席派工宣队接管了

被迫停火的各个教育机构。

一场轰轰烈烈的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席卷了全国。它有效地控制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大混乱，运动出现了休止。在学校里，学生们被迫相互揭发，批判那些由军队选定的打击对象。要人们争当积极分子的压力很大，造成的后果也很严重。对一个同学的指责往往会使他进监狱。有些居心不良的人为了向上爬，不惜牺牲自己的朋友。那些出身不好而又敢于反抗的人首先被揪出来接受群众的批判。“牛鬼蛇神”——那些出身不好的老师——再次遭到当众侮辱。文化大革命的结局极象文化大革命的初始。

1968年秋，学生们要毕业分配了。这次分配是对造反派的又一次打击。在决定他们前途的过程中，阶级路线起了作用。尽管绝大多数学生，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被告知他们将被送到农村去，但相当比例的干部子弟却能参军或留在城里。我所有的采访对象（其中有一个出身革干家庭）都不得不上山下乡。把这些年轻人全部送到农村去，在地理上把他们分散开，除了可以缓和城市的失业问题，也是一种拆散红卫兵组织网的方法。和区去的时候不一样了，许多从前的造反派都把去农村落户看作是一种惩罚：他们不得不进行“劳动改造”。

我的采访对象中有一些出身中间阶层的学生，他们很聪明，很容易轻信，他们就读于高于平均水平的学校，因此，他们中间有许多活跃的造反派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在14个采访对象中，有一半成了造反派，而所有这7个人大大小小都是头儿。还有的是广州市中学红卫兵联合阵线的一二把

手。

我的采访对象中还有 4 个保皇派，区、白是其中的两个，第三个是一个革干出身的学生，第四个出身于中间阶层，但他父亲在单位的职务较高，因而享有高薪和一定的社会地位，他和干部子弟相处一向很好。当红色恐怖横扫他们学校时，干部子弟保护了他。他们学校是二类学校，座落在远离闹市区的郊外，又没有太多的干部子弟，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太活跃。因此，尽管他是保皇派，却没有过多参与，何况他之所以参加保皇派，是由于朋友们都参加了。他把很多时间都用来寻开心了。当时，法律和秩序都被破坏了，这使得他可以经常与干部子弟的朋友一起驾着偷来的吉普车去兜风。当然，有时他也会为一些具体问题上袒护造反派而卷入与自己人的争论中去。

有三个采访对象是“逍遥派”，也就是说，不参加任何一派，但这三个人都是造反派的同情者。他们三人中有一人家里是资本家，还有一个出身于右派家庭。这两个人一直是打击对象。一旦得到了平静的生活，他们便小心翼翼地再也不要卷入漩涡。第三个出身于中间阶层，尽管他在学校里是造反派的正式成员。他性格严肃、沉稳、谦逊，不爱表现自己，行动不甚积极。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不惹人注目。他对红色恐怖，扫四旧，包括后来的宗派斗争都很反感。这坚定了他处于圈外的决心。后来他曾对自己的好友谈起对红卫兵狂热的法西斯主义的恐惧，然而他始终从政治角度关心着这一切。在文化大革命末期，绝大多数造反派都深怀不满，他却渴望去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离开中国后，他又

是我所见到的为数不多的，始终清醒地提防“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腐化，并坚持“无产阶级”的简朴生活和自我严格要求的几个人之一。

24、张：文革中的造反派积极分子

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和安定时期，对一个积极分子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那些全心全意仿效雷锋而较早入团的人，因为服从领导，严格遵守纪律，尽心尽力地执行上面颁布的政策，不主张独立思考而受到奖励。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年轻人则要有截然不同的品质——敢于反抗领导，有打破常规戒律的决心，当伟大舵手毛主席的指示含糊的时候，在混乱的情况下，有独立果敢地迅速做出决定的意愿，并以此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

那七个成为公认的造反派头头儿的采访对象，没有一个是共青团员，这事决非巧合。他们都属于不够顺从，因而没能被吸收入团的那种人。至于为什么张和邓成了造反派的领导分子，而区和白则成为活跃的保皇派，则完全是由他们各自的个性和不同的社会地位造成的。

前面关于红卫兵造反派思想成长过程的叙述对张完全适合。最初他和他的同辈人一样，对文化大革命一无所知。但张觉得那时他已经在等待事情的到来，并在心理上适应了那即将到来的一切，至少他在回忆时是这么认为：

在那段时间里（文革前夕），有大量的隐秘的带有攻击味道的文章发表，我贪婪地读着。我感到似乎在等待一场暴风雨的来临，尽管我不知道这将是一场什么样的风暴。我想：这场骚动的到来，也许能使我从这种忧郁和无法自我表现的状态中摆脱出来。这场动荡将会产生一种与我所习惯的生活完全不同的情况。我是个烈性子，因此我感到会和这种动荡的形势合拍。我开始和同学们谈论不断扩大的运动形势，但他们没有这种热情。我心中却充满了希望，想着：它就要来临了，就要来临了。

文革初期一个星期天的晚上，一些大学闹起来的消息传到了他所在的学校，于是为期二年的动乱就这样开始了：

我们的人都非常激动，他们开始数着已经造反的大学的个数。接着便开始指责我们学校伙食太差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他们以前可从来没抱怨过。哈哈，真滑稽，嘿！他们又把矛头指向校长了：校长总是弱不禁风，从来不参加劳动。我们下地干活，他却打着伞在一旁站着。以前我们很少谈起他。“喂！咱们宣誓吧！”我们开始在桌椅上狂敲乱砸，“咱们也写大字报吧！”我们一起冲出了教室，到了外边我们才发觉，别的班的同学也冲出来了。整个学校灯火通明。原来高干子弟已经造反了。那天夜里，我们写了足有上万字的大字报……第二天早上把它们贴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别提多高兴了。学校已经没人管了，老师们也不知躲到哪儿去了。啊！多么自由哇。那是一种很特殊的

感觉，这么多年习惯的东西一下子全变了样。在香港这个社会里你是体验不到那种感情的，我整个身心都处在自由之中。

其余的采访对象则没有类似强烈的得到解放的激动。但在动荡的初期，张和其他人一样，并不知道他所追随的是什么。

不久，工作队进校掌了权。张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对攻击出身不好的老师以及工作队重用“红苗苗”很是不满。一天他在一家工厂里偶然看到了一条抨击“党内走资派”的标语，从此他转而认识到，文革的对象不是“牛鬼蛇神”——老师，而应是工作队所保护的学校党委。他对校党委的错误还不太清楚，但这没关系：问题是一定会弄清楚的。他起草了一份关于工作队不肯“揪出走资派”的大字报，还说服班上另外几个出身中间阶层的学生在上边签了名。他扮演起了领袖的角色。

那天晚上，学校里所有的学生都来进攻我们了，唉呀，简直就是一群暴徒，似乎受了工作队的魔法。他们歇斯底里地冲我们大喊大叫，还写了一张足有几层楼那么高的大字报“反对党就是反对毛主席”。班上别的人都不敢说话了，只有我立场坚定。我明白，如果不坚定，我们这个组织立刻就会瓦解。我回答了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这时候，谁的态度坚定谁就能当头儿。当然，高干子弟有他们自己的立场。夜里，无论我们去哪儿，他们总是跟在后

面。真可谓白色恐怖。我感到十分孤独，好在他们总算没有揍我，其它参与的同学更不好过，别的学校里甚至有几个人自杀了。

随着8月份16条的公布和工作队的撤出，张在班里的威望大大提高了。但不久重又实行阶级路线，红卫兵出现了。红色恐怖逐步升级，由于张有班里多数同学的保护，才没有成为红色恐怖的牺牲品。但他被内疚和自责所困扰，因为他自己无力阻止这种野蛮行径：

我开始感到这种体制有问题，他们对待出身不好的同学的那种原始的野蛮使我震惊。但更令人震惊的是，看起来如此合理的社会竟会有这种事情，如此的野蛮，并且令人莫明其妙的是这些竟能与这个社会共生。

到此为止，张已经是一个学生的少数派组织的公认的首领了。十月份，血统论被废除后，这个组织的成员增加了，他被选作班里在校级造反派中的代表。他谢绝了当一把手的邀请，宁肯从一个不那么显眼的位置上起步。这之后的几个月中，大家又几次建议他担任领导工作，每次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讨厌把自己拴在日常行政事务上，不愿为日程表和纪律所约束。作为二把手，一个事实上而非名义上的领导者，他可以享受更多的个人自由。他擅长写大字报和宣言，善于做快速决定，而不愿做一个驯服的成员。在危机中，他就这样地成熟起来了。

张非常感激毛主席给他们这个自我表现的机会。1967年初，“一月风暴”的浪潮席卷全国的时候，

我强烈地希望我们能取得成功，而且不费吹灰之力。我期待着社会发生一次合理的变革。我对毛泽东的崇拜几乎是五体投地，但我的崇拜与别的学生不一样，在崇拜的同时也有自己的评价。我认定他能而且一定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变革。但我认错人了。

那时他盼望的“巨大变革”还不是组织上的变革。巴黎公社当时还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他所说的是当局的垮台，从感情上讲，是指个人的解放。“夺权运动开始之后，我便肯定那才是真正的革命。看得出来，不只我自己，周围的人也都发生了变化，就连过去一直低下的人也由于自己的努力而获得了解放。”

早些时候，我曾就张的青春期发展状况与美国激进派学生领袖做过比较。张本人与他们形成了这种比较：最重要的是通过对社会束缚的反叛表现出对自我解放和生活意义的寻求。

他还没来得及考虑以革命委员会取代上海人民公社的意义，学校和工厂就已被军管，造反派受到镇压。于是造反派军心大乱，人数骤减。出于对这些造反者的脆弱的愤怒与失望，张加入了校外的一个战斗队，以便“把革命进行到底”。

4月份，周恩来给广东造反派翻了案。造反派的队伍又

一次壮大起来，两派间的对抗从个别冲突升级为有组织的暴力行动。张所在学校是最先爆发武斗的少数几所学校之一。双方都配备了匕首、长矛、盾牌和盔甲，并且各自占领了一部分校园。由干部和军人子弟挑头儿的保皇派的武器装备要精良一些，尽管如此，由于寡不敌众，最终还是被赶出了校园。张象参加其它造反活动一样疯狂地投入了械斗。他很为自己的文武双全感到自豪。他具有的这种双重的成就感，是毛泽东式的英雄本色的很好的表现。他常常工作过度，数夜不眠，没完没了地开会。由于一直坚持体育锻炼，张的耐力比别人要好。然而他仍强迫自己越过极限。在这段时间里，他得了头痛症和耳鸣症，至今尚未痊愈。

并非所有的人都参加了武斗，一开始，就有很多人不相信值得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于是就溜回家了。张平素对生与死想的很多，他坦白地承认他怕死。他一直想通过学习革命先烈的传记来强迫自己克服这种恐惧心理，并把它当作自我修养不可缺少的一部份。他曾有意试着让自己进入一种心甘情愿为革命而献身的精神状态。就是文革以后，他仍在不断地检查自己。他曾跳入河里，救起了一个落水者，真象是革命烈士的故事中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他这代青年人被灌输多年了的：

那个人在下沉，他大声呼救，但没人愿意去救他。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也许我也会因为他拽住我而淹死。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人从水里救上来。我又一转念：这个胆小鬼不会的，人不该这样。我恨那些只在岸边站着嚷

不肯下水的人，我受不了这样。再说，我……我会一辈子因此而感到无地自容。于是我跳下去了。决心下的很快，过后我对此感到满足。入水的一刹那，我心里充满了勇气。在文革的武斗中我曾有过同样的感觉，这可以说是一种正直感。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天赐良机，不仅可以正当地去冒生命之险，也可以实现那种效仿革命先烈的幻想。作为学生，对革命先烈他感到颇有感情。效仿雷锋的人随时可以把雷锋的美德付诸行动，但仿效历史伟人的人则要等待重大事件的到来。成为造反派头头儿的张和邓，都认为自己终将象那些传奇式的革命先烈一样做出一番丰功伟绩。而且，他们目前也戏剧般地推动着历史的车轮。张对一场有数千名学生卷入的武斗，激动地做过长篇大论的描述。他曾带领突击队冲破了敌人的前沿阵地。他从毛主席和拿破仑的书中所学的连做梦都在想的军事战术，在现实中有了用武之地。我们不知道，在广东的这段文革小插曲中，他是不是夸大了自己的重要作用，但这个偶然事件的确使他获得了一种使命感。

1967年的秋天，红卫兵被命令把偷来的汽车还给军队，要不要投降并接受革命委员会的改编，成了造反派分裂的争论焦点。张最初站在左派一边，难道他的奋斗全是白费力气了吗？但他那比较实际的一面又使他意识到，除了举手投降别无选择，他们不能违背毛主席的指示。他很不情愿地同意代表市级中学造反派组织坐到谈判桌旁去选举市里的革命委员会。在那个会议上，《中国向何处去》受到了批判，那是

他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他说：“我一拿起那篇文章，就立刻深受感染。我开始怀疑这种社会制度。我认识到，的确有一个精英阶级。”

他很清楚，只要他们学校的革命委员会一成立，他那一派就得失败。在没得到批准的情况下，他又一次启程周游各地了。此时此刻，对于掩盖自己野心的造反派头头来说，最理智的选择莫过于答应妥协，并争取被选进学校的革命委员会，这样就可以获得一个几年内能捞个官儿当的前程。相反，如不合作，那无疑是进行政治自杀，形势十分不利，以至于没有人对抵抗下去最终将会赢得更大的权力抱有幻想。离开广东之前，张想发表一个声明：他对权力的热诚是不能被收买的。

1968年4月，张回广东时，中央委员会所持的暧昧态度唤起造反派们的最后一线希望。那时报纸上天天大力号召和宣传在全国建立革命委员会，继此之后，《人民日报》已经开始断断续续地刊登对造反派有利的文章了。广东流传着谣言，说毛主席受到了攻击。造反派的余部组成了统一战线，以便进行垂死挣扎，这些人比起一年前全盛时期的规模小多了。张成了有一万人的中学红卫兵造反联合力量的副司令（邓是总司令）。

他们不仅开始了与保皇派的新的冲突，而且还抢了军械库。张解释他为什么要坚持下去时说：“我的意思是，即使输也要输得光荣，我们不能那么没骨气地去投降。我就是不认输，非要堅持到底，始终如一。”不出他们所料，他们被军队打垮了。造反派们不得不第一次在私下里对毛主席的策

略和政治立场产生了疑问。包括邓在内的大多数比较坚决的造反派头头儿都被抓了起来。张完全是凭运气才漏网的。派驻他们学校的军队指挥官恰巧同情造反派，就让他主动要求去农村插队落户了。张临走之前，又抽烟又喝酒，无目的地偷鸡摸狗。他用这些过去和朋友认为是堕落的行为来发泄自己的痛苦与愤怒。为了表明自己政治热情的结束，他甚至认真地考虑过开始恋爱。

25 邓：文革中的务实派积极分子

与区和白比较起来，张和邓的性格在很多方面都很相像——反叛性的气质，自发的自我表现欲，不甘循规蹈矩，敢做敢为，坚韧不拔。这些性质使得他们能够进入领导岗位。但他们之间也有重大区别——在张那里，阶级利益和个人利益受到抑制，更多地表现出理想主义的东西。根据我个人的观察，邓的朋友们对他的评价以及他对自己过去经历的一件事情的描述，邓不是那种为了一个理想而放弃全盘的人。当然，他有理想，但那是与在文革中推动他为获取社会威信和地位而斗争的野心紧紧相连的。

就在文革即将开始时，邓宣称他也做好了心理准备，由于他有“过盛的精力”，又没有太多的“世俗杂念”，所以急于抓住成就一番大事业的机会。他和张一样，在学校的大门上贴了一副大对联，讥讽工作队光吃人民的粮食不为人民办事，他们应感到羞耻，以后应该加倍努力。他回忆道，他

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对工作队的不满，因为工作队因他出身不好就轻视他。

他从来没受到张所不得不忍受的那种攻击和逼迫。但随着运动的继续，由于得不到积极参与的权利，他愈发感到痛苦。当干部子弟组成了第一个红卫兵小组，而其它人连扫厕所都不让参加时，他狂怒了：

他们（他实际上说的是“我”）急于要干些什么，你知道，他们被告知，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政治考验，关系到他们的未来，一个人怎么能游手好闲呢？他必须要找些事干。哈哈，就和现在一样，我在得到生活费之前不得不找个工作。（采访时，邓正面临着失业的危险，他正忙着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别的学校在干些什么？”于是我和另一个出身好一点的伙计——我的出身比他差一等——一起转遍了整个城市，去了许多学校观察他们那里的运动。调查回来，我们决心组织自己的战斗队。

邓把在香港找工作时的绝望和他在文革中为争取参与权而做的斗争作了明显的对比。他意识到，合法的积极行为作为一项政治资本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他决定为普通出身的学生建立一个独立的组织，与干部子弟的红卫兵组织决一雌雄，就与他的这一想法有关。

当他召集会议以组建一个新的组织时，作为积极和热情的反应，他的那些出身中间阶层的同班同学有20多个人参加了会议。在会上他们讨论给这个小组起个什么名字。

当每个人都提出自己的建议后，我站出来，喂，哪儿来的这么华丽的名字，尽管我们不够加入红卫兵的格，但我们的出身也还不太糟，由于我们属于“骑墙”派，我们也一样可以起来造反，我们就叫“前进”吧，取其争取最佳之意！有几个人不同意！但我说：只要我们能够成就这些事业也就够了，就到这儿吧。

没有再啰嗦，这个组织就按邓的意见命名了。这样，连这个小组的名字都继承了邓取得成就的方针。由于是他创建了这个红卫兵之外唯一可以选择的小组，他得到了领导职务。他的领导风格很快就表现出来了，脚踏实地，有力，稍有些专横。

这个组织建成后，他面临的一个难题是，除了政治课那点东西外，甚至连毛泽东著作都没接触过，但操纵一个组织要有一定的理论知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便埋头钻入书堆，以便能迎头赶上。最初只有我和另一个伙计一起写我们组的材料，但他要比我快三倍，哈哈，我实在不知究竟写些什么，可那位的论点论据都很妙。所以，我自己要努力赶上他。

这种一定证明自己比别人有本事的需要给他提供了积极进取的动力。张也曾想要证明他的能力，而他想得到承认的，还是他的革命献身精神。

在红色恐怖之下，邓的组织大多数成员很快离散了，只剩下几个铁杆儿分子跟随他。为了给失败寻求一条出路，邓写了一篇题为《骑墙派万岁》的短文，并夹在信里向全国散发。当出身好的红卫兵们禁止他参加国庆庆典时，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担心起来。他还不能把自己从凡事都要积极的习惯标准中解放出来。他最关心的就是得到一个证明自己积极的机会，并且获得人们的承认。

在红色恐怖闹得最凶的时候，邓只不过受到些侮辱而没遭到虐待。但他仍十分恼怒。看来他并没有受到周围残酷行为的过多骚扰。事实上，他仍继续遵守阶级路线的框框，就象在命名他那个组织时表现出来的那样。

张则恰恰相反，他既不嫉妒出身好的学生，也不蔑视出身不好的学生。他能无视积极分子公认的行为准则，有时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为了建立少数派组织，他受到了比邓更多的压制，但那只不过更坚定了他的信念。

起初，邓怎么也掌握不住十六条的主要精神，他唯一理解了的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一条。

那时人们对事情不太爱刨根问底，只对比较实际的和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才比较敏感。“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句话挺实际的，对吧？你们筹委会（一个由工作队在学校建立的，被出身好的学生所把持的委员会）为什么要禁止人们造反呢？“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那为什么不信赖我呢？我是群众的一员呀，如果你们这些家伙不信任群众，那我要信任他们。

他没有击中要害，关键点是指导群众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直到北京的学生来交流革命经验，并教给他们怎么读社论之后，他才和组织中的几个成员发起写了一张痛斥学校走资派的大字报。

他们几个人很快便成了攻击对象，每天晚上都有一批批的学生找上门来挑战，大喊大叫。1966年秋，校外的政治气候对那些攻击工作队的人有利了。于是，这股潮流很快转向了，邓的少数派扩大成了学校里造反派的主要组织，正式的领导职务给了一些高干子弟。正如我们以前看到的那样，这是红卫兵组织的一条基本战术，邓负责一般事务，但是实际的头儿。

曾使张异常兴奋的“一月风暴”夺权运动，却没有使邓兴奋。当时，他正全力以赴地调整组织和巩固他那处于早期发展困难时期的组织。处理组织里的日常事务比意识形态里的论争更吸引他。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一提起文革的经历，邓总是谈战略，战术及组织上的事，而极少谈起他的思想发展过程。

武斗一开始，他就把这种向暴力的转变，当做两派之间深深的敌意发展的必然结果接受了下来。当一个人讲道理赢不了的时候，武力便是最后的手段。军事行动不归他负责，但他也参加过几次械斗。在这几次武斗中，他担心的不是死而是残。

邓和张一样，对待死亡的这种态度并不是在战场上逼出来的，它是长期着意思考的结果。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学生，

他很冷静，满脑袋都是死的问题。他发现自己对死有一种持久的恐惧。但官方的报导说革命英雄都是面无惧色地去死的，并因此而赢得了荣誉。他非常想成为一个英雄，如果去死的机会来了，可他的双脚不支，使他失去成为英雄的机会，事情会怎么样。

上高中时的一次清明节，邓和班里的同学一起去革命烈士纪念碑扫墓，离开时他心情很复杂。这些革命英雄留下的仅仅是几张照片，刻在碑上的名字和这经过装饰的坟墓罢了。一方面他想得到英雄的荣誉，另一方面，荣誉的短暂性又深深地震动了他。还是趁着活着的时候做些什么更重要。

他对死有思想准备，但感情却是矛盾的。做为“抓住一切机会，培养自己的勇气”的例子，他讲了一件事：

六十年代，有一次刮台风，我应邀送一个女生和另一个男生回家。那个男孩子要我陪他，可见是个胆小鬼。路上，我们面前有棵电线杆被刮倒了。我知道因为雨水，很可能会上电，就告诉他俩走路时小心，并自己走到前面，如果触电，我就是头一个。就在这时，另一个人超过了我们，刚走到前面就倒下了。啊！触电了！在那一瞬间我想到：我要冲上去救他，就得和他一起死，当这种英雄一点用都没有。我最好别找这个麻烦。哈哈，我决定去呼救，人们冲出来帮着把电线杆推开了。一辆军用吉普车开过来，我们想截住他救人，然而司机不肯停车。我奔上马路，拦住汽车迫使它停下来，并让他们把人抬上车。我觉得自己做的十分恰当。我很聪明，没有跑过去白白地电

死。

从他一开始讲，我就估计错了，作为一个“培养勇气”的例子也许会是一个张式的英雄主义举动。那不符合邓的性格。当邓遇到成为英雄的机会时，他表现出两点，一点，对是否去救那个人的快速思想斗争表明，他对上级教导的自我牺牲精神的敏感；第二，他跑上去拦截吉普车的行为，为他摆脱窘境提供了一个折衷的方案。一般情况下，邓总能想出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矛盾中找到一个中间路线的解决办法。这在他锻炼身体、选择事业、仿效英雄以及决定是否拿生命冒险时，均有体现。他总能保持他的正直和半热烈的理想主义，另一方面又能保持清醒的现实主义。

于是，在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他虽然也强烈地反对革命委员会的组织，但他决不做坚定的极左分子。他认为那是有勇无谋的表现。在读《中国向何处去》时，他发现其中的观点支持了他对阶级路线的下意识的不满，但他又认为宣传这种立场是不合时宜的，危险的。我们应该清楚在适当的时候让步会带来战术优势。他看到写这篇著名文章的作者被关进监狱后，便挂出一付谦恭面孔。作为有一定群众基础的造反派头头，他被选进了学校的革命委员会。白天，他不情愿地参加革委会的各种会议，事后，就到那帮“落难的哥儿们”那儿去喝闷酒。当时大家都处于幻想破灭之后的那种心境之中。作为一个有一定地位的领导，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他不得不废弃最终目标，参加革委会，这是必需的最低限度。如果他能多参加些活动的话，他早就得到更有前途的职位

了。但他不愿意抛弃他的朋友和正直的品德。他对这种既能行使权力，又不会被权力缠住的地位很欣赏。从他的孩提时代，他就渴望褒奖，威严与地位。只要他的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和承认，他便觉得自己的权力得到了维护。

最终他还是不能轻易地在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取得平衡。1968年，他最后一次恢复了他的造反活动，并和张一起负责组织了中学生造反小组联合阵线。邓和别人一样，误以为毛主席是支持他们的。再有就是，邓抵挡不住人们的压力。作为一个领导者，他认为那个夏天中，任何退缩都将背叛他们小组的立场及小组对他的期望，邓全然不顾失败的逼近，向理想主义表现投降了。他打算逃脱对他的制裁，但还是被逮捕了。

26、白：文革中有纯正癖的积极分子

白对文化大革命的解释说明与张邓二人有明显的不同。有三点事实：①他是个大学生，尤其是他在首都北京上学这一事实。②他年龄较大，经历多一些，更成熟一些。③作为一个正统的积极分子，他处在一种不同的社会地位上。

阶级界限清楚地把中学生划分为造反派和保皇派，前者攻击权力机构，后者保护它。白所在的大学里，两派的分界并不明显。有幸进入高等学府的大学生们都希望有个光明的前途。因此，无论什么出身的本科生都不象中学生那样感到他们的机会受到了威胁。他们没有理由把出身于别的阶级的

学生当作怀有敌意的竞争对象。

在北京的大学里，保皇派和造反派这两个名称的含义，只是在文革初期一小部分人起来造校党委的反时才明确。在首都，两派都很快和不同的中央委员挂上了钩，都把“保皇分子”这个带有贬义的牌子强加给对立的一派。而自命为革命的“造反派”。白所在学校的两派不只是以中央领导为靠山。学生中的两派之间的冲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不很明确，以至于1967年互相认为是死对头的两派竟然发现他们属于同一个红卫兵司令部。根据白的记述，他们的争论往往是既蛮不讲理又无聊。这里面会有更多的具体问题，为了能理解它，需要对大学中的宗派主义的性质做更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白所在学校的派系联盟中，他只是在工作上看到有宗派主义势力。从那时起到文革结束，他一直把这场大混乱看作是当权者操纵的结果，群众参加了当权者的权力争夺战。张和邓那样的广州中学的造反派们，由于他们的组织和上层权势者的策略没有直接联系，也就不认为自己简单地被操纵了。他们的行动是独立的和自发的，他们乐于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在大学中，文化大革命来得不象在中学那样突然。在这场动乱开始前几个月，大学里就已讨论过关于修正主义教育和物质刺激的文件，而且在理论上有一定的理解。但是，当写大字报声讨党内文艺界人士的狂热爆发时，其泡制立足于官方路线的千篇一律的大字报之迅速和中学也没有什么区别。白很看不起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

贴大字报是做为任务分配下来的：“好，这两天不上课了，你们全去写大字报，每人交二张。”写完后我们就把它们贴出来了。

问：那么所有的大字报的内容都是一样的了？

答：对，差不多一样，全一样。我很少写。

问：但你说过上头要求写。

答：那我就只写两行。

问：有人写很多吗？

答：嗯，是的。有些人不断地写，然后向党支部汇报：“我已写了十张大字报了！”那时他们正积极争取入党，我呢，你让我写，我就写。

问：所以这事没什么意义？

答：毫无意义。我根本就不去看，他们只追求数量。那样他们就可以向中央汇报，比如可以声称：“在批判三家村的过程中，全校总共写了5556张大字报！”事情就是这样，一开始我就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早就有人整我的黑材料的原因。那时我很不满，连谁批这个，谁批那个都有人管，我说过：“为什么不摆脱这种控制，我们自己来批呢？”

为了越过这种限制，他第一个与班上的组织决裂了，从一个系串到另一个系。而那时“大串连”的说法还没有得到中央的正式支持。

但我们不能把他在形式主义的运动中受到的挫折与他自

我表现的探索混淆起来。白基本上没有任何直接反对当局和现行制度的倾向，也没有自我独立的渴望。在揪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阶段，他曾积极参与，从教授们那里揭发出“修正主义材料”，把小事无限上纲，简直和中学生的所做所为一样。但他时刻都能意识到其中的矛盾：

^

我们觉得必须服从整个趋势，根据中央精神进行谴责和批判。我们尽管知道系主任没有什么罪过，但还是谴责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因为我们感到跟上形势，赶上潮流是很重要的。我认为这是对的。但我极少写大字报，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心里就觉得它不对。

这里，他的党性和对权威的服从压倒了他的理智和个人的是非观。白一次次地谈到“赶潮流”“跟形势”“卷入潮流”。他的行为基本上总是尽最大努力遵守和执行当局的指示。如果他表示反对，一般说来，那是因为他认为他熟悉的人贯彻那些指示时没走脑子。

他保护过校内各种专家，这说明他不愿造权威的反。当系里的二个年轻的工作人员怂恿他们去攻击系主任时，他是反对的，因为，他争辩道：

北大有个陆平（北大的党委书记，正在受冲击）。他们学校运气不好，我们学校是所政治大学，是很纯洁的，教职工都是老干部，资深干部，他们是革命的根基。因此，当那些教师贴系领导的大字报时，是应该批评的，因

为他们违背了“大字报不应公开化”的原则。即使真的有问题，大字报也只能贴在室内，这与系主任是不是修正主义分子无关。那时人们的思想很保守，包括我，我也很保守。

有些人，比如张，抓住这个机会不遗余力地攻击学校党委书记，而不管他是不是“修正主义分子”。与其相反，白则保护这些当权者，理由同样是无关紧要的。作为正统的积极分子，当局的一个成员，白和党是一致的。他仍然不认为文革主要攻击对象是当权派，对他来说，这是他所采取的最正统的立场了。

他确实感到工作队在压制学生的首创精神。但他还没有不满到向它挑战的程度。一帮二三十人的高干子弟从内部了解了关于毛主席向什么方向推动文革的消息，就组成一个红卫兵小组攻击学校党委书记，那时，大多数学生，包括白在内，站了出来保护党委书记。少数人和占90%的大多数人的对峙和争论爆发了。这时工作队已撤出，学校的各级党支部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白和其它几个人一起组织了一个联络中心。“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就明确了它的目的：把整个学校都团结起来，等等。但有一点是不好的（他开始嘲笑自己的错误）：我们主张保护学校的干部，这是错的，是的，是错的。”

他们之所以错，不过是因为党中央后来指出：保护党委书记是不对的。事情的对错是由党来决定的。所以，当党完全改变其主张时，他和他的同事们就不得不照着做。通过保

护党委书记这件事，他们发现自己还是没有“赶上潮流”，而且还被列为“保皇派”。白的联络中心的成员们很快便全部抛弃了他们一直保护着的“走资派”。这个联络小组的组织者不得不做检查。白认为，那些保皇分子以及他自己的向后转是很自然的事，不是什么机会主义，随潮流而动是他的思想准则。因为他随潮流就意味着跟随党，这也就是跟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在建立红卫兵这个问题上，白又一次走在了潮流的后面。那时，北京中学里的干部子弟正忙于筹建红卫兵组织，这组织以他们那高人一等的阶级出身为基础。这样做在大学生中却有一定的阻力。甚至有些出身好的学生，如党团员，对于解散现有的组织也很不情愿。当一小群高干子弟宣布自己为“红卫兵”时，白的联络中心曾极力反对，这个中心的成员中，既有出身好的，也有出身一般的。然而，当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联络小组的部分成员便马上忙着创建他们自己的红卫兵组织，于是再次彻底地改变了立场。白也改变了看法，想要加入红卫兵。但他被拒之门外，因为他还有在“四清”中招致的“未澄清的历史问题”。他承认碰了一鼻子灰。但最后还是通过关系加入了红卫兵。对这种态度上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既不辩解，也不感到尴尬。

关于红色恐怖，白认为，血统论只能在中学里吸引些听众，大学里很少有人相信。大学生，尤其是那些参与过四清运动的，有充分的生活经验。白说，这些人是不会认为阶级出身和革命热情之间有这样生硬的直线关系。白自己承认这

一种事实。但同时，他又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这句话是对的。他反对过分强调阶级出身，甚至到把所有非红色阶级出身的人都当成敌人的程度。他反对的只是极端的血统论。

在大联合那段时间里，我去山西农村创建红卫兵时就用这种办法：直接招收出身好的人，尽管有些年轻的农民很积极，和我关系也不错，但没让他们加入，因为他们出身于中农家庭。他们得等一段时间，只有在第三次招人时我才会让他们参加。

由于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同，不仅他对血统论的态度与我那些出身中间阶层的中学生采访对象不同，而且即使面对对出身不好的人施暴和虐待的场面，他也很少有人道主义感情。

文革开始时，也就是八九月间，我们第一次出去串连。在北京站想法子上车时，看见那些中学生在打人，他们完全失去了控制。啪！啪！他们正用鞭子抽打一些以前的地主和一些说不清是什么人的人。浑身上下全是血，那可真说的上是“施虐狂”。我们这些人目睹这一切感到很害怕。因为我们大学生已经习惯于温文尔雅。我对我的朋友们说：“这只不过是个开头儿，如果现在就吓坏了，那你以后怎么开展运动呢？于是我引用了鲁迅的一段话。鲁迅曾说：“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们把它背了下来，一边走我一边鼓励他们。

他磨炼自己的铁石心肠，培养阶级感情，去掉那些同情心。甚至那年秋天，当他听说北京周围的几个农村里发生了农民集体杀害地富分子和他们所有男性子孙时，他都没有一丝怜悯之情。那时，他是一个小组织的头儿，他有一个同学出身富农，父母在那次惨案中被杀害了，之后曾来找他祈求保护。白答应帮她过问一下，但过后却把这件事忘的一干二净。在他所做的日常工作中，这种事还没提到议事日程上。实际上，“我认为，群众之间的这种相互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一场群众运动中，杀几个人没什么大不了的。不！不是没什么，我的意思是我认为是不可避免的。”谈起此事，他很明显地带有某种超越感，他把人类或个人痛苦看作是人类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小插曲，也是“无产阶级专政”阶段中不可避免之事。这种超越感只是那些公认的官方积极分子才有。

到头来，白根本无法理解出身于各种阶级背景的中学生之间那种错综复杂的紧张关系。他思想麻木，很少对那些从未享受过红色政权的甜头的人抱有同情心，加之他对自我表现毫无兴趣，所有这些都使得他至今仍对中学里开了锅般的热闹困惑不解。

白的观点和那些因其它原因而加入造反派的十几岁的青年人不同：总的来讲，天真、浪漫和自发性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而减少的。在白的学校里，那些敢于第一个跳出来造权威人物反，逆潮流而动，或是成立新组织的往往是一二年级的大学生。白根据自己的经历谈起高年级本科生时说：

高年级学生比较保守，他们苦恼很多，他们看到的令人发愁的事太多了。他们不得不考虑毕业后怎么办？党支部给他们的评语怎么写？会不会影响入党？如果运动结束时被扣上“右派”的帽子怎么办？

所有的学生，无论是大学生，高中生或初中生，文革开始时，都以为和以往校领导大力倡导的其它运动一样，又是一次显示自己积极性的机会。但到底是大学生，他们或是参加过工作，或是参加过四清工作队，所以毕竟成熟些，知道中国运动的一般规律。因此，我们这位总是力求纯正的已是四年级学生的积极分子，懂得了：

我们这些学经济和政治的人早就知道在所有的运动的最后阶段都有一个整顿时期。当初积极热情地投入运动的人中，最后总有一部分人注定要被清除出去。“枪打出头鸟”，也就是说，首先打击干部，后来为了求得平衡，再打击那敢于直言的群众。这是一条规律，事情总是如此，我们可以回想1957年的反右运动。从文革一开始，我们便料定事情一定会如此。其实当初许多人警告过我们不要陷入派性之争。“小心点，你不会有好结果的，不信咱们走着瞧。”事实证明的确如此。文化大革命中，总是先揪出当权者，过一阵便反过来整学生。不是我们对这种运动的过程不清楚，我之所以无论如何得积极参加，只因为那是潮流，不这样盲目投身其中是不可能的。

自预言所有的运动都遵循一个规律，象是证明他的预言的正确性，潮流开始了对白的触及。他注意到班上的党支部对他明显的冷淡，甚至是敌视。白由于怀疑他们整他的黑材料，就在一天夜里闯进党支部办公室，找到了一套关于他的特殊档案。“看到这份材料，我浑身的血都凝固了。”这是一份精心炮制的记录他每天言行的报告，经过歪曲篡改，牵强附会地把问题提到了政治高度。前些时候，他曾帮助搜集反动学术权威和修正主义分子的材料，设法寻找攻击教授讲师的根据。两种情况一模一样，关于此事的经验告诉他，这份报告是作为关于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学生的全套材料来写的。他的自以为是，热情过分和不掺假的小积极，被用来整他自己了。如果此份报告跟他终生的话，必将预示一个凄惨的未来。

朋友们劝他从文革运动中脱身。带着如此一份档案，无论他参加哪派，也无论他干什么，运动一结束，这些都会成为他的罪状。于是，他和一位朋友一起申请了半年的粮票和助学金，准备周游全国。可在最后的一刻，他改变了主意。虽然他从来没对文革抱有幻想，但一直是忠实的积极分子。他是那么的忠诚，以致难以从中摆脱。他这样描述他的窘境：

我们被卷入了潮流，但我毕竟是个积极分子。我明白，到头来会有人污蔑我们是冒牌货，并把我们整倒。我们不是看不到这个后果，这是可以预见到的。但这股潮流

像狂风暴雨一样推着你向前冲，如果自己没有足够坚强的意志约束自己，你就会被和大家一起战斗的意愿卷进这场风暴。

他不仅决定留下来，甚至帮助组织了一个小组去一位大人物的老地盘里整他的“黑材料”。此人是中央委员。当初反对过白那个较温和的派别，后来失宠了。1967年初，在洗劫那里的一间办公室时，白被公安局逮捕了。他曾说过，最后总会有一部分“冒尖”的群众将被清除出去。这种预感变成了现实，只是比预定时间提前了。白在监狱里痛苦地蹲了两年，这是文革的一大半时间。但他能通过新近被捕的红卫兵人数的增减来掌握外面政治局势的变化。日子一天天地过去，狱中的犯人也一天天多起来。到1968年的下半年，在最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原来住3个人的牢房现在挤进去了17个人，那间牢房只有9英尺长，6英尺宽。

他从不让脑子闲着，以防产生自卑情绪。除国内报纸以外，唯一可供阅读的文献是《毛泽东选集》。他利用这个机会把《毛选》重读了好几遍。以前，他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为了寻求精神食粮和行动指南。现在每次读书，他都不断发现毛主席的论述中的漏洞和自相矛盾之处。

尽管如此，白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看法仍和张、邓那些造反派不同，他认为，铁板一块的列宁主义政治结构作为一个整体并无缺点。文革结束时，象张那样的“极左分子”同意“省武联”宣言的基本原则，即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官僚主义阶层。反之，当自从监狱里出来后，第一次听到这个

宣言，就毫不犹豫地把它做为无政府主义的论调加以驳斥。他坚持认为，一旦清除掉那些相对来说是少数的腐败的官僚主义干部，中国将会重新走向正轨。他否定特权阶层的存在。如果确有这样一个阶层，按他的说法，那一定是客观需要。

他从未怀疑过“运动规律”，不象产生过怀疑的造反派。这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党的运动策略：“不管是对是错，就得这样。”这不过是党的正常活动。勿庸置疑，象白这样的一些人已经习惯于把党的路线当作判别是非的标准，而从不用自己内心的是非标准来衡量一下。

同样地，他继续教条主义地相信，必须对那些阶级成份不好的人进行严肃的阶级斗争。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实际情况，用麻木不仁来解释这种态度。因为，白被释放出狱一年之后，他的阶级成份被重新划定了，也被贴上了反动阶级的标签。他所在的那所大学大张旗鼓地调查他的家庭历史，甚至到他出生的村子里搜集材料，其实他还在蹒跚学步时，他们家就已经搬迁出去了。最后的结果是他被扣上了“恶霸地主”这一最坏的成份。这是他所遭受的最沉重的一击。从此，他就得忍受“被专政对象”所受到的歧视和轻蔑。即使这样，他也没怀疑过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的原则。他只把这些当作个人的不幸，一个基本正确的制度中的反常情况。和张相反，张从来没有“无产阶级的立场”，而且，在他能从理论上进行反驳之前，从骨子里就反对阶级路线。白则继续不为所动，仍从官方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社会。

27、区：文革中的驯服的积极分子

区成了保守派，尽管她出身中间阶层。要了解她为何如此，只要看一看文化大革命前两年她在农村的经历就可以了。

区和另外48个志愿者于1964年到一个村子里落户。那个村子几乎处于赤贫的状态，粮食奇缺，泥坯土房，劳动繁重，甚至一辆平板车也被看成是贵重的东西。所有的活儿都靠人拉肩扛，可他们对如此恶劣的条件却从不抱怨。在头一年，青年人都极于表现自己的忠诚和政治热情。

我们在学校的劳动就显得很轻了。现在我们要挑土，肩膀和脚上都是伤，骨头也像是要散架了。最令人心烦的事便是光脚了。我们不得不克制自己，使自己尽量像个农民。有的口号叫：“皮黑、心红，骨头硬，意志坚。”我们故意不穿鞋走路，直到皮肤变粗。我们吞下豌豆叶和萝卜叶，而这些连农民都不吃。有一点儿大米吃的时候，就觉得又高兴又满足。嘻，那时我们可真傻，所有的想法都是那么红。只想怎样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怎样超过红军，怎样把自己锻炼成革命的接班人。那时我们觉得应当能够忍受一切艰难困苦。

幸运的是，经济上落后的乡村需要他们的帮助，需要他

们写和算的本领，这给他们增添了一种信心。然而这些年轻人开始那种团结一致克服困难的决心很快便消失了。

我们的关系看来挺虚伪。表面上我们相互关心：一人有难，大家相助。可他们都想入团，争强好胜。我们来农村就是要以革命的方式生活，证明我们对党的忠诚，证明我们是国家的有用之材。由于有这样一系列想法，我们才来到农村，没有人强迫我们。可一旦到了农村，大家都要求进步，都争先要求入团。

在农村的那种紧张气氛和学校里一样，但带有更强的竞争性和严肃性。离开学校，一个人的“政治面目”直接影响着他目前而不是将来的生括。为了获得个人的利益而进行的角逐，慢慢地侵蚀了开始那种不谋私利的思想。学生们开始认识到，在这个上千人的村子里，能带来权力和威信的职位数目必然有限。七位团员把持着这些职位，这本来是任何青年人都可以得到的。比如区，她同时担任五个职务。她在进行社会工作的同时，每天还要进行七、八个小时的体力劳动，其余的时间花在了和十个要求入团的人进行“心贴心”的谈话上。体力上和脑力上的负担非常沉重，以致使她感到要垮了。虽然如此，她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职务。她比一些没有职务的人年纪轻（在志愿者中有高中毕业生），比一些人工作能力弱，而且还是一个女孩（一个瘦弱的姑娘，劳动能力当然比不上小伙子）。所以她就成了非团员们发泄不满的靶子。

所以，只要是选五好青年时，总是能轮上我。当然总是对我有很多批评意见：对别人不够关心，骄傲……不管怎么说，只要你比别人的职务高些，责任大些，你就会引人注目，别人就会对你要求得更严。总是有这么多的批评。每个人都想超过别人。记者来采访我们的时候（因为他们那里的青年被树成模范，代表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伟大成就），当然要挑那些优秀人物（比如她自己），是不是？但所有的人都莫明其妙地抵制我。我被排斥在一切事情之外，我不能在照片中占一点位置，不能在会上讲话。我躲到一边大哭了一场。工作那么苦，到头来一无所获，所有的人都想进步，你好，我比你更好。我们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后来落后分子们站到一起来反对我们这些积极分子。

问：他们为什么会落后？

答：他们说：“啊，我们一起到农村，每个人都离开了城市生活，都做了这么多贡献，可你们却红的发紫，管那么多事。比如你，区，负责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村里的文化站，可我们却无事可做。”所以他们嫉妒我，这是很自然的。

问：可那时你为什么不让他们负责一些工作呢？

答：可他们有事可做嘛！象给农民读报呀，当夜校教师呀，我不知为什么，他们就是不爱干。

说到他们的落后，她究竟指的是他们的劳动落后还是思

想落后呢？“我是说他们对没有职务很不高兴，噢，他们劳动一点儿也不偷懒，在田里干得还可以，就是私下里牢骚满腹。”

区坚决否认她和其他团员有意将权力集于一身。如果承认，则等于认可那些说她不帮助他人进步的批评。她和她的六个同事为入团申请人制定的入团要求十分严格，以致在近二年的时间里只有三个人能如愿以偿。在公认的和未被承认的积极分子之间的斗争，比起当年在学校里更明朗，更加不可调和。

第二年，区发现她根本没必要被那些和她势均力敌的知识青年的批评所困扰，只要她在农民中树立起威信就行了。农民毕竟占村里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是权力的基础。她调整了她的新姿态，作为“扎根农村，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革命行动表现自己。“四清工作队”允许她在工作队会议上作记录，并参加在农民中搜集情况的工作。这样，由于她掌握了村里的情况，便占了大便宜。掌握了村里的情况，对于她在最初的竞争中建立立足点来讲是无价的。而这也是通向她急切要攀登的权力之山的一条捷径。她得益于此，当上了村里的广播员。广播员并不是一个有很大权力的职位。不过除了例行公事地传递国家政治信息之外，广播员有一种非官方的对村中政事施加影响的作用。她的批评意见和要求，给村民的行动规定了官方的准则。她还不是正式的干部，但她正在接受紧张的工作训练。这也许不算是过分乐观，她梦想着官阶上的晋升：由村到公社，由公社到县，再一直向上。

她的傲慢使她在她的同志中间极不受欢迎。如同在学校

一样，她在同志间没有一个朋友。她的最好的朋友是她的上级，也就是那些中年的农村干部。她痛苦地感觉到那种相互矛盾的动机，这从她孩童时就已在驱动着她：既混杂着真心实意地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又混杂着毫不掩饰的为个人出人头地而进行的奋斗。其他人也是这样挣扎在一个矛盾的内心世界中：邓摇摆于理想与实用之间，白则介于单纯的奋斗和现实之间。对区来说，她希望享受团结一致的同志气氛，但在事实上，她对那些同来的人表示轻蔑，他们之间存在着隔阂，这二者也是不相容的。她厌恶在她和那些积极分子之间形成的那堵墙。可这墙却是由她一手垒起的。于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她被孤立的苦恼就很可能变成愤怒和复仇欲望。

在一定程度上，区由于文革的动乱而得到荫护。在突然的骤变震动着城市时，农村的人们却依然每日在田地里耕作，只是偶尔被城里传来的骚乱扰动一会儿。结果，在张和邓那样的城市青年中激起巨大反响的国家大事，却没有给区的心中留下太深的印象。

再有，也和张与邓那样的造反派不同，文革在区的世界观发展中，甚至连一个分水岭都谈不上。她只简单地把文化大革命归结为两个阶段的运动。

开始的时候很混乱，然后就清理阶级队伍，用农民的话来说就是“系紧口袋拿坏人”。他们说毛主席很聪明，他让你跳个不停，从中观察谁好谁坏，然后他就收紧口袋来清理阶级队伍。是啊！这真是不可思议，在那样一种混

乱的局势下，他居然还能收紧它。政治压力比以往要大的多。这是我的印象：一个时期的混乱，然后一个时期的高压统治。

我有幸深入访问了加入了另一个造反派组织的区的三个下乡知青的同事。他们更为清晰地勾勒出了当时的“动乱”和“高压统治”。其中一个人简单明了地告诉我造反队是为什么和如何在青年中出现的：他把知青分成三个阶层，“贵族”，“中层”和“下层”。后者对争取成为积极分子毫无兴趣。造反派属于“中层”，即那些在农村中没有稳固的职务，但却积极苦干的人。他们十二个人中只有一个成了团员。形式又和在中学时一样了：受挫之后反抗意识更强的“中层”积极分子们构成了造反队的中坚。

当广州动乱的消息传来时，造反队中的一些人从原来的学校带回来了新思想——造上级的反是被认可的。早些时候，在公社集镇上，公社领导组织过对牛鬼蛇神教师的批判，党委书记鼓励学生用历史可疑来攻击教师，这和在城里的中学和大学是一模一样的。但从广州回来的青年以他们的新观点为指导，在镇上张贴出攻击公社领导的大字报。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是自发的，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如同城里学校早期造反一样，他们大张旗鼓地宣传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十六条指示，把所有当权者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等同起来。这个运动深入开展之后，他们的目标就放宽压低了，只把村中的干部和四清工作队统统斥责为有官僚主义工作作风。他们对批判那些曾经轻视过他们的人的

不安也消失了。通过他们的行动，他们希望显示出只有他们是毛主席的真正的跟随者，而不是工作队，干部或者特别积极的知青。

在几周内，第二个红卫兵组织在村子里建立了，它只限于出身好的青年参加，是由当地的干部组织的。由于这个组织接纳的对象是考虑阶级成份的，即使是区，虽然有那么多重要职务，也不准参加。区对加入造反队一点欲望也没有，只是帮助建立了一个类似城里的红色外围组织的小团体。区为她的这种选择作了有趣的辩护。

那些没有实权的知识分子（在公社镇子中）认为自己属于红旗派（广州造反派）。如果我在广州，我也会加入那个红旗派。可是我的阶级背景不太好；而且在广州，那些保皇派欺负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人们说我们正在跟保守分子跑，也就是保皇派。实际上，我们仅仅是灵活些：就象如果我在广州，我就参加红旗派，因为我也是受压迫的。

造反派红卫兵发现他们在村子里很孤立。他们的攻击激怒了村中的领导。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区，发觉造反派的攻击威胁到了自己的地位。而农民则讨厌造反派不干活儿，到处乱跑地搞“大串连”，攻击干部制造事端。农民们被那些“革命”、“夺权”、“揪当权派”一类的言辞搞得摸不着头脑。对农民来说，青年人的革命实在无聊。在很大程度上，区是从农民的角度看待造反的，她仍然带着轻蔑的口吻

谈论造反派。

他们不过是拣起芝麻而丢了西瓜。我们则集中精力动员农民，教育农民，鼓励农民提高生产积极性。他们只是空谈一通国家中的这个如何，那个如何，这些都是细枝末节。我们没时间注意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也理解不了他们。问题是他们根本没有实权，只是上窜下跳，掌握实权，落实工作都是我们的事。

她正是在这个时候被推进到村子的权力中心。四清结束后，又一次面对这种冲击，村里的干部恼火透顶，大多数人辞职不干了。这种分裂正是党中央急于消除的。面对粮食产量的急剧下降，北京发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区作为村中政权的支持者和代理人，利用她在村中的宣传者和学毛著领导人的地位稳步迈入了由于很多人纷纷辞职而形成的权力真空，并以此重新恢复了村子的稳定。对她来说，这才叫“革命”。

我一直呆在村子里（和上窜下跳的“大串连”相反），我们听从毛主席的指示：“抓革命，促生产”，坚持“就地闹革命”。我们读报纸，学习指示，遵守每一要求我们服从的战略决策。要我们去调查当权派，我们就去调查；要我们搞革命大联合，我们就去组织；要我们抓春耕，我们就抓生产；要我们建立革委会，我们就去建立；要我们批评党从而建设党，我们就去批评；要我们清理阶

级队伍，我们就去抓坏蛋。

总的来说，她缺乏独立的分析能力，而这正是她有“遵守”、“服从”的迫切愿望的原因之一。一个造反派青年这样观察她：

她只知道如何背报纸，唉，她用她所有的力量去背报纸。可我敢打赌，报纸上说的什么她一点也不明白。她对国家大事并不关心。广播时，她只不过是批评这个干的不卖力，那个草锄的不净而已。我对她的印象就是背报纸和疯狂地干活。她对文革中的大事件无动于衷。我们理解不了她，她也理解不了我们。

到了1967年，村里的下乡知青开始感到在农村希望不大。受到外界知青的思想影响，他们开始相互争论是否回城造反更有实际意义，更能在理论上站得住脚。他们怀疑“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革命策略还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用这两点作为理由来表现内心中希望返城的愿望。一个当时的造反派青年回忆道：

当时在广东，许多红卫兵组织的小册子开始出现。这些小册子收集了刘少奇关于上山下乡的讲话，所以我们认为这一定是刘少奇的政策，我们被送到乡下来，而且说我们是农村发展的动力，这不是真的。我们开始问我们是否还应当留在此地，农村真的需要我们吗？我们要回省城，

向全社会提出这个问题，还要弄清这到底是不是刘少奇的路线。然而回城一年之后，甚至到我们1968年被迫再次下乡时，我们依然认为这是刘少奇的路线。直到1968年11月，当文件把这一切说的清清楚楚的时候，我们才放弃了希望。

但还是有近半数的下乡知青返回城里，其中有些人积极地参加了造反组织，有些人在父母身旁悠闲地消磨时光，还有些人找到了临时工作。即使处于边缘地位，他们仍然积极活跃。他们利用“大民主”来自由地批评和讨论政策，甚至有人私下里表现出对林彪的不信任：在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上，林彪别有用心。

一些知青的远走高飞验证了区的坚定立场。她是站在村子一边，代表村子利益的。文革结束时，她当选为“县贫下中农联合会”的副主席。她自己认为已经达到了荣誉的顶峰。她“和贫下中农相结合”最终得到了承认。

文革结束后，在经过了自所预言的“大动乱”之后，法律和秩序又回到了这个村子。1968年秋的清理阶级队伍中，“口袋收紧了”，区的权力扩大了。她作为村中的法官，负责审问嫌疑犯，搜集检举材料。她的专政对象大体上有三类：①出身不好的农民及他们的亲属作为阶级斗争的靶子。②一个当地干部和他的朋友，在一次权力之争中失败，现在则彻底地抬不起头来了。③一个原来返城后又被遣送回乡的造反派头目。总共有十七个人被关进村中的临时监狱里渡过了他们不同的“刑期”。这十七个人占村中成人的3%。在

给靶子们罗列罪证的时候，区掌握了审问的艺术。学会了如何威胁利诱，施加心理压力，使嫌疑犯们互相揭发。

区在这个角色上边倾注了过多的贡献和精力，这超出了她的实际需要。

区这样的正统的积极分子，在农村留了下来，并得到提升，而非正统的积极分子却没能成功地打击村干部，他们之间的这种对比，使区又一次占了上风。区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区对这一运动的偏爱和热情，出于她本人的政治观点和态度。有几个知青说毛主席太胖了，还说林彪长着一付“奸相”，区把他们的话当成了罪证。区自己在村子里树立了对毛主席的崇拜，并且本人也虔诚地信仰这些。区确实对这些看得十分神圣。

区的感情也是复杂的，她几乎被她自己的危险的想法吓坏了：

我再告诉你一些吧！你知道，文革中报纸上有很多照片，有些不恭敬的想法时常掠过我的脑际，我不得不把它推得远远的。对林彪的印象也比较糟，“他象一只摇尾巴的狗，”我吓坏了。那时我和别人搞宣传住在一起，我有时说梦话。我深怕我无意中露出来被别人听见。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因此而被打成反革命的。我怕进监狱，所以每天早晨一起床就问别人我夜里说过什么没有。

由于她对自己思想中的亵渎成分感到惊恐和羞愧，所以她认为，公开表露这种想法的人肯定是别有用心的。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村里三分之二的受害者都是出身不

好的人。区企图以一种经过培养的阶级感情上的冷酷来对待别人。而白在“四清”时就学会了不那么生硬地把出身和个人性格联系起来。区的观念是在她那个农村环境里培植起来的，她认为害怕出身不好的人伺机进行“阶级报复”的忧虑完全是有必要的。出于他们的阶级本性，其中一些人很可能往井里下毒。这种想法是从推理上得到的：由于被隔离当作专政对象，很可能有人报仇心切。但这种想法只能促使她对他们的憎恶更强烈。她唯恐自己不能培养出无产阶级世界观，反而陷入中间阶层的感情矛盾之中。她应当坚决不让在她自己身上出现人道主义感情占上风的情况。这就成了她内心痛苦之所在。面对出身不好的人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所受的折磨时，

我当然知道他们是受委屈的。可我看见打人就吓坏了。我对自己说：“好在我只掌握笔杆子，否则就难办了。如果有人让我打骂那些人，我拒绝的话，那是不符合我的阶级立场的，因为我是一个积极分子。在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应当表现得坚定而又冷酷无情。但同时我又知道他们是无辜的，我对他们恨不起来，如果殴打他们，我就难以下手。所以我暗自庆幸自己只掌握着笔杆子，而用不着到外面去干。但我又害怕自己的这种想法，这说明我的阶级立场不够坚定，斗争观念不强。不象是一个无产者，也不象一个布尔什维克，还没达到共产党员的标准。我们这些非无产阶级的人总是被提醒要自觉改造思想，完全站在广大群众一边。我们要时常检讨自己的错误，所以负罪感时时跟随我。当然，我不敢告诉任何人。

我的许多采访对象在那些年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幻想慢慢地破灭了。区却不是这样，相反，由于她的社会政治地位她对政策的认识和改造自己的决心都进了一步。

28、自我欺骗

我们已经看到，虽然像区这样的正统积极分子仍然坚定不移地执行传统政治路线，但对大多数采访对象来说，文化大革命使他们获得了各自极不相同的政治经验。1966年的下半年，随着红色阶级的红卫兵单一权力的崩溃，很长一段的“开放”时间给了他们以自由发表意见的机会。在经历了学校生活的虚伪和压抑的挫折之后，他们对这种新的言论和行动自由感到振奋。他们对自我，对中国政治舞台的认识在逐渐变化。到两年动乱的末期，他们开始把混乱的个人挫折重新凝聚为一种群体利益，这就愈发与过去学校中所学的东西相抵触。这种与他们少年时代政治课教义大相径庭的信仰突变，将是我们下一章讨论的主题。

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是，文化大革命像一把双刃剑，在青年人的信仰和感情上劈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方向。这种对立不仅培养出非正统的态度和观点，而且带来了极权主义倾向十分明显的过分而激烈的行为，尤其是在动乱的前几个月。象张和邓那种不甘听命的人所受的影响并不强烈，但大多数广州高中学生在头几个月的行为是盲目的。在一定程度

上说，有些人不是这样，但那经常是因为他们班上出身好的学生不允许他们那样。开始的造反是对准老师的，好象“破四旧”和“红色恐怖”一样，表面上说是维护革命的纯洁性，但实际上是对弱者、无助者和被中伤的人的疯狂迫害。出身好的学生痛打出身不好的学生而没有丝毫的良心不安。出身中间阶层的学生也去帮助审讯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和教师，尽管他们本身也被人蔑视，软弱无力，被称为卑微的二等公民。

是什么在驱使中国城市中大部分十几岁的青年人走向这一残酷的极端道路？相当大的一部分答案在于他们所接受的政治教育：非此即彼的靡尼教世界观熏陶；面对人民的敌人，应表现出敢于斗争和毫不留情；被传授的阶级路线的偏见；在文革前就趋于紧张的积极分子的争论，巨大的挫折，极度的不满和互相敌视。

在文革冲突的前几个月（我前边说的正统化运动的初期），有一种很强的“群集”效应：他们成群结伙，好象不存“自我”，他们的立场观点也是来自外部，从他们的同学中接受何为对错的提示，看感召式领导的眼色行事，急于遵从而变得正统。迫于1966年夏天的压力变得富于战斗性，渴望保留或扩大他们拥有的地位，乐于转而攻击本团体外的替罪羊，从而他们自己可以很硬气地宣称自己是坚决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他们极善自我欺骗，这表现在文革初期大部分青年人中间，他们可以把并不高尚的心理需求——对自身利益的算计和受挫的热情——升华为一种信仰，他们在积极为一位感召

性领袖和一项伟大事业而献身，并且丝毫没有掺杂自己任何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不愿负任何责任。就是在今天，那些采访对象还在说他们是被“欺骗”、“蒙蔽”、“利用”了。这些话不应仅仅被看作借口或托辞。是的，他们有时是不自觉的，他们丧失了对内心的“自我”知觉。在从校园生活的桎梏中摆脱出来的1966年秋天之前，他们一些人就进行了初步尝试，以去掉他们在课堂上形成的教条主义和权力主义性格。

即使这些青少年的观点和态度在文革末期武斗中实际上改变了许多，但没有一位采访对象，甚至张，已经摆脱了他们在其中成长起来的政治环境所具有的情感上的吸引力。他们依然按已经形成的世界观行事，他们的思维方法还受儿童时代的政治社会化的严重束缚，用一些采访对者的话说，他们尚未“觉醒”。

第五章 非政治社会化： 文化大革命的后果

一位前造反派回忆道：“文革时期，不管什么时候，总是运动、运动、运动，根本没时间去思考。”但是，复课闹革命之后，几乎紧接着就上山下乡了（或者对某些人来说，就进监狱了），还是有充分的时间和大量的事情去思考的。文化大革命旋风般的二年，情绪混乱，事件一个跟着一个，对学生们来说毫无准备，但又能对新的政治形势做出坚定而迅速的反应。现在，他们的“革命热情”减弱了，也就能够反过来“总结经验”了。

文革前，象区这样的志愿下乡的人已经做了过艰苦生活的准备。但现实生活并不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也不像官方所宣传的那样，早期的这些志愿者的理想和热情淡漠了，文革后下乡的人中也很少具备那种早期的理想了。官方的口号不再提去农村建设社会主义“光荣”，而相当谦卑地让他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有些青年人愿意去，有些人不得不屈服于现实，因为没有别的选择，有些人很勉强，到了农村却不干活儿。

看到农村的状况，他们发现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离开。城市的知青流入本来就人多地少的农村，农民也是怨声载道。等待青年人的是住房短缺，工资待遇不平，年龄长大以后，他们的前景更加暗淡，因为不知自己是否有能力结婚和抚养孩子。

七十年初期的这项国家计划，被官方称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这一新生事物更加深了青年人的不满情绪，特别是那些出身中间阶层的造反派。如前一章所述，文革初期，他们表示支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他们忽略了所许诺的改革实际上意味着什么。他们从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意味着埋头读书的学生被批判为“白专”，意味着接受高等教育的标准不是学习水平而是阶级成分。随后的几年中，他们看到的是教育质量飞速下降，高校招生要通过家庭关系去“走后门”。新的教育制度与从前他们所希望的大相径庭。他们原想毛主席会支持打破旧的条框束缚，象在“文革”中的大民主一样。但事实上，文化界从来没有象1970年这样的荒寂，并且受到了严密的控制。他们曾帮助毛主席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物质刺激，但到农村和农民接触之后，发现农民更喜欢刘的路线。有些采访对象逐渐明白了：要想促进生产的发展，应当放松对农村的经济控制，允许农民自己经营。

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青年加深了对当时中央的不信任感。1968年到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中，一些在广东农村和国营农场的青年造反派，象在区所在的村子一样，受到了批判，当地的“牛棚”都被塞满了。1969年林彪搞的“三忠

于”运动中，对毛主席的崇拜几乎就是一个复活的宗教陷阱。每餐前先向伟大领袖表示感谢，在毛主席的画像或照片前，人们在庄严地进行“早请示，晚汇报”。村民们甚至半夜被叫起来去跳“忠字舞”，唱“忠诚歌”。这种庸俗的个人崇拜几乎就要使青年公开地表示不满了。林彪1971年的机毁人亡，为这种不满的爆发提供了燃料。一位采访对象谈到：“即使把毛泽东语录举得最高的人归了西天，也还会有人接着把毛泽东语录举得更高，但不知是谁？”

党中央上层之间的政治裂痕越来越明显了。“上海左派”反对周恩来的温和立场——原先的造反派发现，他们现在的看法越来越接近“周派”，而这是他们过去要批判的。他们希望在一些事情上看到文革的前提——强调阶级斗争——被否定。邓的意见在采访对象中最具代表性：

毛主席说阶级斗争肯定还存在，但我们对阶级斗争的理解与他不同。那时我们认为，阶级斗争是上层和下层之间的斗争，而不是对准地主阶级。地主阶级早被推翻已不复存在了，但上面仍然虚张声势起劲地和这些老地主斗。

一旦对运动产生了怀疑，这些青年就要寻找一种能够取代的理论。那是一个思想波动和如饥似渴的阅读时期。他们中很多有头脑的人仔细阅读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仍然以马列主义作根据。实际上，他们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不过是为了寻找一个衡量的尺度。

他们急不可待地读一切可以找到的不能公开的书。具有

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书正是他们当初破四旧所要烧毁的“资产阶级”的书。他们一边读一边热烈讨论。由于把他们送到了农村，城里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网就破散了。但他们是集体下乡的，朋友们仍在一起，所以就自己组织起了学习小组，为自由交流思想创造条件，而这是他们在文革中就已习惯的了。他们越来越意识到过去他们所持的信念害人不浅，于是敞开地吸收各种不同的政治哲学观点。我那些参加过学习小组的采访对象，并不对当时的运动有什么具体打算，只是有一种模糊的希望，希望有一天政治气候会变得对他们有利，使自己的组织能够重振旗鼓。但不几年他们便放弃了这种空想。

他们发现实现思想独立并非易事。官僚主义并没有因红卫兵的冲击而瓦解，相反仍然牢牢地控制着人民的生活。想生活得好一些，或者想爬上权力之梯，最好的办法是循规蹈矩，伪装积极。1966年以前，人们从外表上表现为为理想而奋斗，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还隐藏在潜意识中，而现在，则毫不掩饰了。大多数人情愿被动地和现实保持一致，只要不引起麻烦就行。而有些人则进了一步，他们热衷于左右逢源，从中谋利。人们嘲弄地称他们为“两面派”、“随风倒”。他在政治风浪中左右摇摆，然而七十年代的政治风潮是很难预料的。他们是一些假积极分子，他们心里很明白，要想出人头地，就要屈从当局那种令人难以琢磨的政治要求。当然，最好的办法是离开农村。

由于伪装积极并非心甘情愿，而且使自己失去尊严，他们便逐渐心灰意懒了。大批的人在广东插队，那里毗邻香

港，于是他们开始悄悄地越过边境，跑到英国殖民地去了。下定这种决心完全是为自身着想，他们不愿呆在经济落后的农村，而返城又无望。但对那些当初全心全意投身运动的人来说，尽管不是第一次对这种政治制度失去了信心，但他们从没想过要偷渡香港。他们是在毛主席的体制下成长起来的，热诚地相信那种虚幻的“荣耀”，当他们发现现实远不是他们所理想的那样时，幻想的破灭使他们异常痛苦而玩世不恭。他们觉得无论对国家还是对自己，他们都将无所作为了。

29、非政治社会化

我们已经结束了前面对中国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的叙述。截止到六十年代中期，这一过程简直是这个制度的神话般的胜利。严格的政治教育结出了“硕果”，孩子们狂热地拥护党的领导或感召领袖。简言之，我们的研究与对政治社会化的多数研究一样，都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过程，虽然其多少有些美中不足。但是我们的研究如果就此为止，那就只说对了一半。

托德·泰普是少数几个对这种基本论断持怀疑态度的人。他的观点使多数政治社会化研究观点产生了动摇。泰普认为，少年时代学到的东西一般来说，总是与他们成年之后所接触的经济和社会现实不一致。举例来讲，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字面上意义上的人人机会均等是不存在的，这就和

学校中学到的完全不同。美国大量的实际研究都坚持认为，五十年代学校的学生对政治的自信态度终生不会改变，但结果证明是错的。五十年代的学生对政治抱有一种浪漫的幻想，但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他们却成了现行制度的反叛者。

那么，为什么西方关于政治社会化问题的研究一直以这种错误的判断为基础呢？那应该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泰普用不乏挖苦的话解释说，现在的大多数问题的研究集中在7—14岁之间少年的政治态度上，因为这些学生集中在学校里，调查研究十分方便。泰普认为，正是由于7—14岁是一个人政治社会化很重要的阶段，这才促成了这种方便的理论假设。泰普的看法是，政治社会化的更为主要的阶段乃是一个人开始意识到自己已经是成年人的时候：“不是由于遇到了他已往意义上的新的社会化经验，而是他要把已往所学的东西放到他自己不能左右的现状中去实践一下”。

如我们这一研究中所列举的，中国青年的政治社会化证明了泰普的观点。正如泰普所评论的，在中国，学生所得到的教育是不连贯的，所学知识与所面对的现实相互脱节，这一点应由当局负责。给学生灌输的观念是和过去的时代与社会制度的稳定坚固紧密相联的。但是这些教育本身却充满疑问和矛盾，一旦被青年人发现，就很难自圆其说。在这些年青人的成长过程中，如果对这个制度有任何一点怀疑，要么引起别人歪曲，要么自己把它压抑下去。等到青年时代的理想主义成为过去，他们就发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已经无法填平了。从本章和前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脱离学校之

后，这些青年们确实把很多学到的知识拿到实践中作了检验。如泰普观察到的，在人的成长早期，任何成功的政治社会化都不能保证一个人具有终生不变的政治倾向。

如果不明确这一点，社会化的研究将仍然停留在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如同硬币的另一面，与社会化相对，还存在着超社会化，非社会化和成人的再社会化。超社会化的含义是，一个社会化了的个体认识到了理想与现实的鸿沟之后，又拒绝接受现实。超社会化对于我们研究非社会化具有重要的解释价值。肯尼斯顿对美国反战激进派的分析，便使用了超社会化和非社会化这一对概念，以便说明导致美国反战和反政府运动的驱动力。我们年轻的中国积极分子同样，直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实在难以弥合时才开始非社会化。非社会化是由于巨大的政治动乱而触发的：在美国的情况是由于越南战争，在中国是由于文化大革命。这两场运动的起源和本质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在这两个不同的国家中，两个运动的高潮对青年人来讲，都是具有决定性的“解放”经历。这种动乱暴露了各自政治制度的不连贯性。正是在这个短暂的时期的认识，使他们进入并且通过“超社会化”的状态。两国的青年同样把曾经被国家认可的价值标准拿过来，用以作为衡量国家和制度现行表现的标尺，他们发现了缺陷。制度、政策、政府以及权威的具体象征，在他们的眼中都失去了以往的圣洁的光环。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中国青年人的非社会化，以及对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怀疑，是否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他们个人的稟性和价值观？我们将通过四个例子来考察这一点。由此

我们将进一步获得关于人格与政治活动之间的认识。

30、张

当文革结束时，广州的青年分别以三种方式对他们的处境作出了反应。如我们所提到的，有些人让自己听天由命，他们唯一关心的是如何保持一种低微的形象，以便不招惹麻烦。另外一些人则转为恬不知耻地追逐个人利益。还有另外一些人仍然关注着国家大事和社会的好转，而不仅仅是自己的眼前利益。张属于这一类人。1968年秋天，青年被迫到农村时，张的面前有二种选择：要么去海南岛军队属下的一个国营农场，要么就去广东农村。这两个选择他都拒绝了。他害怕那种难以忍受的农场严密的组织纪律，但也害怕作为一个造反头目在农村被监禁。他和十二个朋友一起要求去中国腹地的一个非常贫困的地区，作为一个逃避之策。他们得到了允许。这正是他要去拼命干活的地方，他这样说，口气中似乎带有一种并未彻底失败的意味。

我想去农村，还希望到别的地方看看，看一看他们的造反派，多了解一下北方的农村，为的是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我想在那里多住些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仍然保留着一些政治热情，而且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在农村。

还有一个更理想主义的原因：

受那些革命先辈的影响，我觉得一个人应当去艰苦的地方锻炼一下，培养坚强的意志。我必须重造我生活的目的，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再去锻炼一下自己的意志。

在他的劳动历史中，这一段时期可谓是最繁重最疯狂的。他在雪中洗澡，超出体力限度的劳动使他耳鸣不止，夜不能寐。他强迫自己在每天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后，一定要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以致有时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那个地区的饮食根本不够营养标准，他感到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但他毫不在意，因为“读书更重要”。他的这种苦行被当地农民所尊重，于是成了村子里学毛著的领导人。

他认为这两年对他的思想成长是很有益的。和伙伴们的讨论，以及和附近城市造反派工人的接触促进了这一成长。他开始从理论上去研究那些他在学校感到的支离破碎的不满情绪，在文革中青年们扭曲了的行为，以及当时排挤造反派的目的——他明白了，这一切都是为了扼制独立人格的发展。

七十年代，那个地区的一个大工业城市为了扩大生产需要，招收一些农村青年当工人。张的几个伙伴离开了农村进了城，他原先要建立一个新的组织的计划落了空，他本人也发现，农村的生活的确是太艰苦了。可他没有走，他讨厌在党和团的监督下，在严格的工厂制度中干活儿。当学生时他已经尝够了这种滋味。他要求“自由自在”，所以他比较喜欢当农民，即使生活艰苦。同年，他们那里洪水暴发，有好几个月农民只能靠麦麸谷壳充饥。

张打算转到广东农村插队落户，因为那里离自己的根基近些。他希望在广东有朝一日建立起一个造反派组织。在广东，他仍是在地里干着繁重的农活儿。他说，他表现极为出色，农民们都一致要选他当生产队的队长，但他对这个职务不感兴趣，因为他想利用闲暇时间搞政治活动，并且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更快地进步。

他试图在几个朋友中建立一个政治核心，但他的努力失败了，“偷渡香港之风”吸引了他的那几个朋友。张的政治抱负受挫之后，就转而帮助他的朋友们到海外去过一种新的生活。许多人出走的唯一目的是使生活好转，但也有少部分人是为了到外面有所作为，张就是这样的人。经过一个月的思想斗争之后，他也决定出走。

我开始想：在大陆我真的无事可做。我原想建立一个组织，但失败了。所以我想，为什么不到外面去组织呢？看看它是否能对中国产生一点点影响。再有，我觉得我必须了解外面的世界。我一直在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书，越发感到自己是处在毁灭的边缘，生活看起来再也没一点儿新的营养。如果你读过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就会看出，新思想都来自海外：从孙中山的变革到共产主义思想本身。我思考了近一个月，最大的困难是，我还爱着自己的祖国，将来我还能回来吗？一方面我可能再也回不来了，但另一方面，我要在外面多学习些东西，以便有一天我能给祖国贡献些什么。我一定要冒险出去！

我第一次遇见张的时候是1971年，那是他刚刚到了香港不久。他正鼓动一场反对“中国官僚主义制度”的运动，并且刻苦钻研弗洛姆的著作。紧接着，开始与当地一个新左派组织合作，随后又联合了二个托派组织，最后加入了一个前造反派组织，并和他们成立了一个献身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人权”组织。他继续思考着国际上的马克思主义运动，而且关注着香港工人阶级状况，他是从大陆出去为数不多能够如此的几个人之一。

七十年代中期，他的生活杂乱无章，他从所有的朋友那里不断借钱，但很少归还。他几乎忘记了白天黑夜，一点儿也不关心自己的身体。我采访他的那年，他最终屈服于现实，找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做了一个走街串巷的小贩。与此同时，他还忘他的人权运动，至少他从事的这项工作可以不必忍受单调的9点到5点的办公室生活。他对自己的智力水平充满自信，但更希望能进大学深造并且出国去开阔眼界。他自己有一个不祥的预感，他说：“象我这么感情强烈的人，肯定寿命不长，我必须尽快在理论水平上为革命做出贡献，否则就来不及了。”

“个人英雄主义”的锁链依然缠绕着他，很清楚，他的豪言壮语不过是一种想往而已。他连出国的一点点准备都没有，更何况还没有下决心学一门外语。他似乎不愿意离开香港，因为一旦离开，他与中国相联的生命线就会切断，从未断绝过的参与中国未来的梦想也就会随之破灭了。

1978年我再次见到他时，已是我采访他的三年以后了。他还是那样的杂乱无章地生活，也仍然没有工作，继续依靠

他的朋友们，不断找别人借钱。当然也仍然继续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一方面他为自己现在这种生活感到骄傲，认为这最能显示自己的性格；另一方面他也明白，要尽力做到自我控制，事实上，他不止一次地下决心过有节律的生活。他的这种放浪形骸似乎是他对中国那种禁锢生活的一种反抗。

31、邓

邓被监禁了近两年之久，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在开始的几个月中，他对毛主席突然停止支持造反派感到困惑不解，并且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进了监狱。虽然在监狱里他大多数时间沉默不语，但间或也有感情突然暴发的时候。他从未发自内心地贬斥毛主席，象区那样。但在他的愤怒与绝望中，对毛主席的感情是爱恨交加的。

国庆节那天，我早早起床，有点出神地面向北方。值早班的警卫过来冲我喊：“躺下！别站着！”我说：“为什么？我正对毛主席衷心呢！”那时我恐怕还是十分天真地想，毛主席知道这种事吗？我感到内心涌起一种愤恨之情。

那天晚上做“晚汇报”时（在“三忠于”运动中，犯人们每天必须二次站在毛主席像前高声说自已有罪），突然不知一种什么力量好象在驱使我撕下毛主席的照片。我

保持着镇静，竭力控制自己。在那儿站了很长时间。我想，如果有人说我撕下毛主席的照片，我就说风把它刮掉了。

邓的愤怒就象一个被自己所爱的父母抛弃了的孩子。另一位采访对象也有同感。他是因为加入了一个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而被关押二年的。在狱中，他称呼一位警卫为“同志”但却遭到一痛训斥。于是便伤心透顶。他深深感到自己被这个政治制度抛弃了，可他还认为自己是这个制度中的一员呢！

邓在他的监狱生活中渡过了一段痛苦和愤怒的时期，但他明白了，要对付周围环境，他只能采取玩世不恭、煞有介事的生活态度。他开始让这个制度自己戏弄自己了。

当我就要被释放出狱时，我和他们开了个玩笑。他们告诉我：“现在快出去了，不要再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了。外面的形势还是很复杂。”我只是默默地听着，他们继续说：“除了报纸和国家的杂志外，别的什么也别听信。”

我说：“对，对！”接着我用怀疑的口气问：“外面的形势可能是怎样一种复杂法儿呢？”

“噢，”他仍说：“外面复杂得很，一团糟！”

我说：“我不信，党的‘九大’刚开完，我们国家的形势一派大好，不，我不能相信。”

“你不相信？”他们说：“在外面，武斗还不少

呢！”

我坚持说：“不，我不相信，报纸上没这么说。”哈哈，简直快把他们气疯了。有时我就这样和他们讲废话。

邓否认他的出走是由于他个人受了委屈和遭到了抛弃，他喜欢把他的出走描绘成哲学幻想的失败。但有些场合，他也表示出他自己的后悔。如果他不那么积极，也象“靠边站”的工人一样回家学外语，那他在香港就会有好一点儿的开端。或者，在文革后期造反精神不那么强，就会坐在一个低级办公室中当一个安安稳稳的小职员了。他委婉地一次次地说自己不实际，让自己的情感轻易地战胜理智。

受了委屈之后，他似乎有权进行报复。在国内，他不仅反抗政治准则，而且反对社会公德，而这是他从小所被教导的。在公共汽车上，他根本不发扬什么雷锋精神为孕妇让座，因为“谁知道她原来是哪一派的！”

出狱之后，他到了一个国营农场。他在那里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偷懒耍滑了，认真劳动的人在他看来全是傻瓜。偷渡香港的打算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没有什么内心的斗争。唯一使他犹豫不决的是，他应不应该为了一个不可知的未来而去拿他的生活冒险，就象其他人一样。在这个时期，他阅读甚广，但不象张那样拼命寻求新思想。邓离开大陆是因为他认为在国内没有前途，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假如他有机会从农村回到城市，他就不会来到这块皇家殖民地了。

在香港，他很容易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价值

观。而且把个人聚敛财富作为主要目标。他不想试作一名工人，或满足于做个码头工人。他梦想有一天他将变成一个资本家。那几年，他想去美国，在他看来那是能提供更多机会的大舞台。

邓公开表示，象张那样依然热衷政治的人都是不实际的大傻瓜。但他的感情毕竟是矛盾的。他曾私下对我承认，被排斥在政治圈外，他感到不自在和羞愧。在他移居美国的前一年，他一反从前，接连写了好几篇文章，都是关于中国官僚主义问题的。其中他表示赞赏社会主义民主。在他个人奋斗与社会理想之间的矛盾中，他明显地是把争取民主做为自己不断进行政治实践的目标。

32、白

自从监狱里放出来之后，被送回到一所大学里去接受“群众监督”，那时他的档案已被重新整理过了。在他最后被送回广州之前，允许他看了一下他的档案摘要。在档案记载的一些东西中，他吃惊地发现，他被改写过的阶级出身竟是“恶霸地主”。

天啊！我震惊了。档案里说因我犯了错误已被开除团籍，我气坏了！首先，我根本无法相信关于我那个阶级出身的谎言，说我隐瞒了阶级成份。这种指控是很严重的，它将跟着你一辈子。而且档案上还说我在文革中是个“坏

头目”，是运动中的保守派，没有一点是好的，一点也没有！我告诉他们我个人反对这种评价。我在文革中没做过一件好事，全是坏事，可能吗？”

白被两位教师押送去广州，带着“一大堆档案材料”。他等待着最后被分到农村去。开始的两个晚上他一点也睡不着，第三天他找了一个朋友商量偷渡香港。这很令人惊讶，他要走的决心下的如此之快，并且，当时的“偷渡风”还未兴起，即使在广州的青年中也是这样。白成功地策划了偷渡计划，这与他过去当头目领导阶级斗争很有关系。

我已经想到了出走，为什么呢？我虽然知道外面的世界对我来讲是完全陌生的，而且也根本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但是我更知道，在中国，背着“恶霸地主”这块牌子，我每时每刻都是被歧视、被斗争的对象。不管我去哪个单位，无论是农村还是工厂，我都只是一个坏分子。有了这个阶级背景，我的一生都被毁了，所以我想，在国内是没有希望了，不管到哪里反正比国内强。

白原先为自己不那么自私而感到骄傲，这一点和他的伙伴们及上级不同。但这次他却积极地为自己谋划前途了。毫无疑问，他过去献身革命事业是真心实意的，一点私心也没有，但那和他当初青云直上的状态相关，他用不着为自己担忧。他事业成功而又不自私自利，在某种意义上讲，二者相互促进。一旦前进过程受阻，白个人的失落感是很强的。这

一点比起张和邓那些人要强烈的多。张和邓历尽艰难，可从来没有得到这个政治制度的赞同。

我们已经看到，白和那些造反派不同。他从内心里并不怀疑这个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现在，他尽管落魄于坏分子，但仍不怀疑阶级路线政策的基本宗旨。逃跑计划失败以后，他被送到一个农村。最初那个村子有些混乱，不知是否要查审下乡知青的“阶级出身”。所以，他又想——这次是很不现实的——实现把一个村子建成模范村的志向，他立即着手工作，似乎他仍是一个“四清”干部。

我刚到那儿去，就建立了一个“阶级档案册”，把生产队中的十几家人都记录在案。从到村子起，我就暗中调查这些事：名字、阶级背景、年龄、有几个孩子，政治派别，谁抱怨过谁等等，我搜集这些材料就是为了掌握村中的阶级斗争和派系斗争的情况。

他所用的技术和方法和早年在“四清”中学到的一样——把阶级斗争作为争夺政治领导权的工具。可是两个月后，他的希望和幻想又都破灭了，队党支部让十二名城市青年列成一队站在农民面前，公开列举他们的罪状，让农民们记住，“好人”是不下放的，下放的也绝不是“好人”，从此以后，他只能以那些阶级成份不好的人，以及在历次政治斗争中失败的干部为友了。他又开始做出逃准备了。他一共试了八次，最后才到了香港。

到香港后，他并没有显示出组织者的才干。我第一次见

到他时，他在一个饭店当侍者。由于是个大学生，而且又自视为知识分子，他希望能找到一个研究中国的机会，并想学点什么。在意识形态上，他曾一度热爱共产党和共青团，但现在却给他造成了感情和政治生活上的空白，“他正在努力填补它。有几个月，他热心地参加一个基督教组织的活动，但他否认自己信仰上帝，只是因为“那些信徒之间的爱和关怀”吸引了他。后来他又两次试图建立纪律严格的组织。每次尝试中，他看起来都是要使大家团结一致，这里面，他仍然带着一种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而这是他从中学起就珍存至今的东西。他希望他的小组也象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党，他自己是领袖。可是他每次用别人形容为“操纵”、“独裁”的领导方法时，他的组织都不可避免地毁掉了。直到今天，他依然认为，必须通过严密的控制和适当的信仰，才能做点什么。

33、区

1968—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中，象我们知道的那样，区扮演了一个审视别人的人。可运动之后，区发现她的政治目的并没有因此而实现。干部选举中，阶级出身依然异乎寻常的重要。她不满意，可并未丧失希望。假如那五十个青年不从城里来此，她也不会表现她的不满。“这些年轻人在城里经历过文革的“大民主”，心中充满造反精神和随时要提意见的念头，区一开始就坚决抵制这些新来的人的影响，尽管

这些人中包括区的小妹妹。

有一次，我和妹妹打起来了。我的意思是真动了拳头。她当着我的面就说毛主席的错误，我气疯了，也被吓坏了；我实在害怕听。我不许她说，如果有谁听见了，她会被打成反革命的。我威胁她，让贫下中农给她上课。她也害怕这一点，就抓住我扭在一起了。

区曾积极地参加了对坏分子的“无产阶级专政”，但现在则害怕自己被“专政”了——就象白在给别人扣完罪名后，他也害怕别人给自己扣罪名。农村的气氛变化非常快，她过去曾经带领农民为林彪副主席唱过赞歌，但1971年，却不得不调转头来控诉林彪的罪行了。几年前，她可能带着战斗激情来完成这个任务，可现在她对党的信任不再那么坚定不移了。而且，她由于新来了这些队友和听众，就发现自己的地盘也不那么稳固了。

这些人的到来，象一块石头投入潭水之中，我也受到了影响。他们很有知识，和我的小妹妹谈话时，我常为自己的知识贫乏而羞愧。有关政治、经济的书他们读了不少，小说也读得很多，包括外国小说。我们则刚开始读。开始我们脑子里想如何用毛泽东说的“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但我总是关注无关紧要的东西，想不要得罪别人。可他们却不然，他们只关心大事情。我的思想很正统，非常相信政府和报纸上说的一切。文革前他们也这

样，但文革后则有了思想转变，他们凡事总要问“为什么”，对所有的事都如此。可我则去做别人要我做的一切。他们不害怕造反，也没有到农村来培养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而且敢于怀疑这个制度。我自觉低人一等，可他们并不老练，每天都在改变主意，而我则比较坚定。他们高谈阔论，纸上谈兵。但做起事来却不怎么样。我集中精力拉车，不爱左顾右盼，而他们却只是左顾右盼，却忘记了拉车。

促使区下定决心不干的原因是，上面让住在离香港很近的农村中的青年迁到海南岛去，那里是丛林密布的野地，而且已经有了一个部队经营的农场。在她那个村子里，城市青年受到压力，要求他们“主动”去海南岛。然而，当村干部让区作个榜样，带头主动去时，区暴怒了。“就是一条养了十年的狗，你们也不能就这样地一脚踢开。我觉得，在他们眼里，我恐怕连一条狗都不如。我下决心再也不给这帮混蛋干了。”最后广东省政府撤回了要青年们去海南的决定。而在那个村子里，这件事产生了余波，双方的看法都发生了变化。区已表明她“经受不住考验”，不愿意到党要求她去的地方。她也不再改造自己了，而且“什么也不再干了。”

1972年，她妹妹偷渡香港之后，区在村中的地位更加岌岌可危。以后的二年内，至少有六个以上的下乡知青也跑到香港去了。虽然她厌恶香港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并且对要冒的风险有些担心，但最终她还是暗暗地开始练习长距离的游泳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她父亲这些年一

直被她称为“老落后”，此时反倒劝她不要走，要继续“为人民服务”。父亲告诉她，国家目前虽然面临很多问题，而且他自己的处境十分艰难，但社会主义远远胜过资本主义。可区在一天早上出发去了香港，连一声再见也没有说。

区出于自愿而信仰这个制度——但最后也是她本人被这个制度抛弃了。她认为自己是被抛弃了，做了它的“牺牲品”。她现在十分后悔白白在农村浪费了十年。但同时她却又不肯承认，她也要对以前所做所为的错误负责。谈到清理阶级队伍时对朋友们的审讯，她说她是“被蒙蔽”、“未觉醒”的工具。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有道理的。和其它使用这些词的采访对象一样，她只是一直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对行为准则和价值观的尊重，而没有个人的判断。

区到香港后，立即开始学习英语，她要在社会阶梯上向上爬这一点是斩钉截铁的。她要通过学习来获得社会的承认。对区来说，学什么无所谓，重要的是学习能够给她带来社会地位和荣誉，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赋予教育的“使命”。这股力量促使她拼命念书，记住社会科学讲座上的每一个字。这也使她想起她念小学课本时的样子。

为了生活，她不得不当了蓝领工人。白、邓和许多人一样，比较幽默地接受了这种体力活儿。可区却不能，她认为这工作卑贱，低人一等，因而讨厌它。原来她培养出来的“无产阶级”感情也蒸发掉了。

在她的挫折中，她也悟到了自身的一些变化。

在农村，我力求使自己不怕困难，尽量不和别人争

吵。我要求自己成为既能听表扬也能听批评的人，成为不谋私利的人，那时我很不错。人们说我后来变了，落伍了。当然我变了（她用正经的口气说的）。你去问我妹妹，以前我不是这么暴躁，人很随和，自从来到香港才开始这样的。现在我的生活还没有一个很高的目标，我觉得我是在自甘沉沦。

在中国，在别人的压力和自设的戒律下，她不得不隐藏起个人的动机和缺陷，处处表现出关心他人的样子。但现在她用不着这样做了，她“放松”了自己。她抱怨在香港的生活没有目标，部分是由于她把香港看成是通往美国必走的一站。而这里却没有给她一点帮助。

三年后她移居美国。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正在中国城的一家制衣厂工作，同时也准备去上业余大学，看起来她适应得较快。她认为美国是“机会之地”，它将给她提供一个达到令人尊敬的白领中产阶级的机会。她发现那里是能够以较高尚的目的生活的地方。她告诉我，她要为华人争取权力，并且已经准备了一套争取做一名中华团体领袖的方案，这已是她习惯的那一类角色了：作一个宣传家、组织家式的妇女。但对区来说，这些已不再是一项激进的事业了。现在她看到，通上述方案，她也可以争到令人尊敬的地位，将来还可以成为中美办事机关的干部。区仍然是区。

第六章 中国政治社会化 与权威人格

本书在一定层次上研究了四位在性格上截然不同的青年人怎样地成为政治积极分子，他们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为什么在他们中年时，分别都变为对政治和社会不满之人，并且离开了大陆来到香港。

就一个更高的层次说，这也是一篇关于中国政府如何使青年人社会化的过程研究。本书考察了人为的学校环境，后来发生的群众冲突，最后我们将就上述问题对中国一代城市青年的性格结构所产生的影响，在本章里作详细的论述。

34、权威人格

在青年人的政治社会化和权威人格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本书将探讨这一问题。正如弗洛姆所描绘的一样，这种人格结构“崇拜权威并屈从权威，但与此同时……又希望自己本身成为权威，而且要求别人屈从他自己。”

在社会科学关于人格与政治关系的论述中，权威人格这一概念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区分人格结构和确定人们的政治取向问题上的许多研究中，权威人格这一概念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也引起了很多争议。权威人格的命题在现代中国，尤其紧密地与研究相关，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要求人们服从权威的程度非同一般。

学者们，例如弗洛姆和赖希，早在三十年代就在他们的著作中使用了权威人格的概念。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结合起来看，他们最关心的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掌握在国家手中的权力不断集中，于是人便产生了与社会甚至他自身的异化。在纳粹德国和斯大林的俄国里，人们尤其受到高度集权的困扰，于是学者们便探讨是什么原因使掌握这种集权政体的人可以随意操纵人们的忠诚，这一点实在令人困惑。

在四十年代末期，以阿道尔诺为首的伯克利的一些学者们根据严格的经验考察，使权威人格这一概念正式确定下来（阿道尔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高级成员，和弗洛姆一样，是著名的思想家和人类学家）。我们现在通常所讲的“伯克利计划”中，有一个潜在的设想，就是权威人格不仅仅表现在集权国家里，作为一种内在的性格结构，它存在于各个民族之中。就美国来说，在一些持有某种特殊的权威心理的市民中，就存在着一种极力反对民主政治的态度。当然，对这一点是有争论的。伯克利计划的研究重点还在于建立一种问卷调查，与实证分析交替使用，以便验证个体中的这种潜在的权威人格。它并不重点研究具有明显的信仰痕迹的意识形态

内容。阿道尔诺的这种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这种方法在证实权威人格某种特征方面效果突出。当然在证实其它方面特征上也有极大的收获。权威人格可以说包括着心理方面的全部特征。

在对权威人格的各种研究中，有一个基本假设，就是，在适当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历史的条件下，很多社会成员就会逐渐产生权威人格，直到这种人格变成了一种在社会中占有优势的人格结构。正如弗洛姆所讲的人们的“社会特性”，“社会特性”与“个体特性”相比，虽属同一的社会；但二者却不相同。弗洛姆对社会制度和它的社会特征之间的相似之处做了详尽的阐述。

社会成员，或者各种阶级和阶层群体的成员，必须以符合社会制度所要求的方式来行动。社会特性的功能在于左右社会成员活动能量，社会成员的行为并不是一个由观念决定是否按照社会模式活动的问题，而是一个希望按自己需要来活动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按照文化需求来活动从而获得满足的问题。

这并不是说，社会群体的全体成员都同样具备社会特性要求的属性。少数成员会离经叛道；还有些人与社会特性联系得尤为紧密。特别要指出的是，弗洛姆坚持认为：“在一些既定的社会群体中，往往领袖人物的个人特征十分强烈，但又完全能体现社会特性——即使不是整个社会范围内如此，至少也是在其中的权力阶层中如此。”

阿道尔诺的伯克利研究计划发现，在社会体系中的权威人格结构，从个体层次上看，如同美国战后的状况一样，可以成为一种权威的社会特性。在社会体系中，权威的社会特性受到了鼓励。在本世纪，这种状况一直受到重视。比如，在战前的德国，苏联和日本。在政治制度的很多方面它们的差别是很大的。但这三个国家的政府，都以自己各自的方式，挑选坚强而又忠实的年青人辅佐他们的权威领袖、政党和政府。政治当局施以铁的纪律以确保年青人服从高于一切的事业。由于受到这种影响，人们渴望把自己与社会群体溶成一体，因为群体与个人休戚相关。在这些国家的政府中，存在一种不得已的要求，就是挑选出弱者和“国家的敌人”做为群体范围之外的人。政府告诫人们要经常警惕并且密切注意潜在的叛徒。这种摩尼教的世界观到处盛行。它鼓励人们不去思考，不把人们当作个体看待。在意识形态方面，总是保持强硬的规定。为了与更高的政治权威保持一致，人们不得不养成一种很强的自我克制以证明自己的忠诚。同时，由于对当局尽忠尽力，他们可以分享更高权威的荣誉和权力，并且自诩为是那些在社会秩序中的低层次人们的拯救者。

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无条件投降，以及苏联斯大林去世，迅速驱散了这三个国家的权威社会性的特征。总之，这三个国家的权威社会特性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歷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兴起和衰亡不过短暂的几十年。

这里，我们对权威人格以及权威的社会特性做了简要的描述，这为我们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它将对我们研究中

国一代红卫兵的人格结构所涉及的问题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的基本观点是：

①、由于社会和形势的紧张，权威人格在表面的行为里并不一定经常表现出来。

②、通过对这种不明显的态度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具有权威人格结构的人物，并且揭示出这些人物清晰的综合心理特征。

③、在给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的条件下，社会体系中的多数人会逐渐具备权威人格，并且导致权威社会特性的情形。

④、团体内的所有成员并不一定都具有同一程度的这种权威社会特性。那些非常成功地适应了环境并占有优势的人，将比其它成员具有更高的权威社会特性。

⑤、给予一定的政治和社会的刺激，权威社会特性将以极端形式的权威行为表现出来，并由大多数的社会集团所支持。

⑥、权威社会特性不只是可以在个别的种族和国家中发现，而且也不是一次形成的永久特征。

在以下的小节里，我们将看到中国的状况是如何按照上述观点表现的。

35、中国人的行为与权威人格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既不是法西斯式的，也不是斯大

林式的。如果给中国贴上这种标签，那将是对一个非常复杂的民族状况的简单而又不公正的歪曲。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中国的体制致力于培养有道德的忠诚的一代人，其中，热诚与忠实的政治积极分子起了主要的作用，他们的行为促成了权威倾向。对这一点，我们无可非议。

这就使我们有必要探讨中国积极分子权威主义的起源。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是否是他们学校经历的结果呢？或者从更根本上来讲，早在政治社会化的新体系产生之前，中国人的性格里有没有一些固有的权威因素，这些因素反映在社会主义学校的教育方法里面了呢？换句话说，在一个人身上，由于权威主义的教养，是否存在一种文化宿命论的成份呢？或者反过来说，权威主义极端形式的迸发，相比较地看，是否应归咎于早在文革之前的十几年里的那种政治和社会的过渡状况呢？

吕西恩·派伊和理查德·索罗门两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试图按照中国文化的传统和传统的权威家庭结构来全面解释中国政治和现代中国人的个性特征。我将论述这两个问题，也就是一系列著作中谈到的“国民性”问题。首先，一定民族的人由于历史的继承因而具有基本一致的人格特征。其次，儿童教育的职能主要是负责使这种心理政治素质代代相传。索罗门在其长篇著作《毛泽东的革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中讨论了这一问题。比如，中国的父子关系一直是权威式的，他还以此比附中国的政治关系。他认为，在儿童最初几年里的培养中可以是不太严格的，但长到5—6岁时，便受到父亲的严格的管教，禁止儿童一切具有侵犯性的行为。

据索罗门所讲，这种矛盾的社会化实践便造成了中国人在权威面前，便表现为两面派：对长辈的顺从依赖和怀有敌意。索罗门认为，这种心理素质表现在政治权威上，也产生出一种传统的矛盾心理。他进一步认为，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这种受文化束缚的人格类型依然保留着。毛泽东决定改变中国的政治文化，方法便是鼓励中国造权威的反。青年一代响应了毛泽东的号召，在文革的红卫兵运动中，造反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些在索罗门的基本观点中并没有加以很好的说明。

索罗门的理论得到了广泛的赞赏，也受到了尖锐的批评。这里我们不去检查他的失误。让我们集中讨论一下索罗门（还有菲依）那些论据充分的推断：由于中国人儿童期教养方式的代代相传，中国人的人格素质问题令人信服地说明了1949年以后中国大众政治行为。

但我认为，这种“新瓶装旧酒”的解释是不甚恰当的。因为它忽略了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经历的复杂发展过程。在有些问题上，它没有看到本书所提出的根据。我们在一些细节上所认识的，尤其是在区和白的故事中了解到的，乃是集中在学校阶段中的政治社会化方式，中国青年政治积极分子的权威人格特征与学校这一新的政治社会化环境紧密相关。

我们所观察到的青年人，都是在学校里，而不是在家里，接受那种摩尼教式的方法来观察世界，这与孔子的“中庸之道”截然相反。同样是在学校而不是在家里，青年人把尽善尽美的党和党的主席与那些阴险狡猾的暗藏敌人和坏分子尖锐对立起来。在学校里，学生们渴望加入那种非家庭的

团结一致的群体，也就是共青团，一旦加入这一组织，就要坚守严密的纪律和忠于严格的宗旨，为其神圣地奋斗。学校促使学生产生这种反常的偏执，灌输一种要求证明自己的忠诚和献身政治的深度的情感需求。这一切都是在学校中发生的，而不是在家里。

作为对家庭影响的反抗，这种学校社会化的突出特征并不是中国独有的方式，在赖希和马尔库塞考察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起源时，他们专门研究了家庭作为社会化的代理的衰落，并且还研究了国家权威取代家长权威的这种转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也出现了这种极相似的现象，比如苏联。戴维迪·巴布观察到，在苏联，国家接替了很多家庭的社会化职能，儿童对国家充满了激情。党的领袖和党本身成为人们强烈的热爱对象。在后工业社会民主制度下，一个相同的趋势也出现了。随着家庭内部父亲作为权威形象的下降，青年人从同辈群体和大众文化中去寻找权威的代理。这种新的社会人物，大卫·瑞斯曼称他们为“他人导向者”。

中国与现代工业社会相比仍然相去甚远，还不具备工业社会的那种技术上十分细微的大众传播体系。但是，高度集中的教育体制的普及和影响，组织良好的大众传播网络，在中国解放以后创建大众文化方面是起到积极作用的，至少在城市中是如此的。争先恐后地学习雷锋的流行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这种流行曾遍及中国城市中的教育系统。国家对价值观形成和行为的影响具有深远的意义。当询问到采访对象和他们家庭之间的关系时，尤其是那些前政治积极分子们，这种关系是很清楚的，家庭在价值观形成方面的作用十

分微小，儿童们对党、国家、毛泽东和英雄模范的情感取向部分地代替了对家庭的情感取向。采访对象们几乎是一致地认为他们的家长是“潮流和政治上的落伍者”。区和她的家庭之间的关系仅仅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而不是绝无仅有的例子。

36、政治社会化的不同结果

我们所说的家庭作为社会化的代理作用其重要性大大地减弱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国家倡导的社会化体系有能力轻易造就出青年人的态度、性格或者具体的权威人物的社会性格。我们已经从上述四项个案研究中看到，人格的概念含义十分丰富和复杂，任何这类概念都望尘莫及。并不是所有的成功地社会化了的人，并且成为积极分子的人，都属于同一类的积极分子。也并不是所有的积极分子都具有同等程度的权威人格的特征。对一件事情，他们的个人性格并不都会抱有同样单一的态度：相当明显的是区和张作为学龄前儿童具有不同的感情需求，不可能从这一点上探求中国人所具有的相同的民族性格。

再有，我们已经看到，采访对象早期的个性特征对他们情感和政治的发展影响不很大。在本书中所提供的论据中，我们已经看到，另有两个因素极大地影响着不同个体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以及他们不同的权威主义倾向：①青年人在学校中所占据的规定的地位；②青年人的阶级标志。

一、政治制度与角色扮演

我们在第二章里讨论的儿童期社会化清楚地表明，无论儿童带着什么样的性格倾向进入学校，他们的权威取向都会与学校生活发生相互影响，并且这种权威取向会进一步受到学校的强烈左右。儿童的确定的个性特征在学校中增强了，而性格的其它方面则逐渐消除了。儿童们迅速地使自己适应了积极分子的角色，比如区和白，他们为此得到了夸奖，并且热心地寻找机会支持正统的准则。正如弗洛姆指出的那样，那些类似区和白那样的积极分子，按照制度所期望他们做的那些方式去做，他们会在其中获得满足。

在他们逐步习惯于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的过程中，也开始准备扮演与成年人一样的角色。通过政治社会化的途径给予儿童不同的奖励，不仅为增强与所期待的特征的一致性服务，而且也有助于把儿童分成不同的等级角色。由此可见，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不过是充当一种区分手段，通过这种手段，在一种存在等级分层的社会中分配财富与权力。有些孩子学习了中下层领导所要求的品质和言谈举止，其它人学习了积极跟随者的角色，习惯于充当社会政治等级中的下层人物。

这里所需求和所鼓励的品质，是那些有助于保持社会结构稳定和秩序的品质。如果是在解放前的年代里，张和邓的那种个人主义，勇敢坚强，反叛特征可能会得到赞扬的，因为那时个人的机智多谋对于解放前与阶级敌人作斗争来讲是一笔财富。然而一旦革命战争获得了胜利，政治上的成功之路

和党的成员便迅速地发生了改变。1949年以后，由于共产党已成为合法的政治统治者，一些象区那样的人便成为合适的招募对象。小学和中学中的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便是以此前提为基础的。

加入团组织要经过严格的手续，旨在有保证地吸收那些有志者。首先要服从组织纪律（向团组织靠拢），其次要在同辈群体中发挥“先锋”作用。反过来，一旦被接受入团，积极分子的双重身份便更增强了他或她原来就有的服从组织要求的人格。此外，这种双重身份还会激发新的情感需求和行为模式。在团里，区和白都获得了这样一种自我形象，就是他们已被授权去领导和支配同辈群体中的其他人。同样，那些没有入团的采访对象也谈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那些刚刚入团的人，一经入团便另有打算，企图用唯唯诺诺的态度，从谦虚的学生转变为自信的导师。

在中国这样一种“角色”扮演，并不仅仅是社会学中的抽象概念。角色扮演包括文字表现技巧：要自觉地把握一种与积极分子角色地位相适应的讲话的方式和方法。随着这种角色扮演和增强个性的倾向，他们以螺旋式上升的方式相互促进，小学中的孩子开始是学生干部，而后在中学便成为团员，这种例子并不少见。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学会了扮演积极分子的角色，在她以后生活中的各个阶段一直继续扮演过这种角色。这种角色扮演似乎是将行为者纳入一种成功的社会化轨道。作为先锋队组织成员的青年一代被规定为模范角色，在这种角色规范的要求下，他们尽其所能地出人头地；服从领导，遵守组织纪律，保持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的破

坏，在自我修养和自我锻炼中显出与众不同。

当然，这并不排除在后来阶段才开始成为积极分子并扮演这种角色的青年。例如白，直到他十几岁入团之后，才得到正式的领导位置。白至今仍潜在着一种对组织的忠诚和权威主义的倾向。观察他后期角色扮演的效果，对我们来讲是十分有启发的。

但对张和邓来说，他们在生活的初期阶段没有扮演过积极分子的角色，这就阻碍了他们成为官方积极分子的机会。反过来，这也影响了他们后来的态度和行为。与官方的积极分子相比，未被承认的积极分子似乎还没有进入这种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之中。因此，这些人的行为方式与人格也不同。

官方的积极分子在扮演其角色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群体利益。他们认同于政权，作为它的成员，这个政权又给予他们极大的权力。当文革爆发时，他们身先士卒，表现为服从集体利益，坚决保卫党委。那些被排除在自来红的红卫兵组织之外的团员只好加入红卫兵的外围组织，到后来，出于同样的原因，少数团员成了造反派的重要的领导人。由于官方的积极分子习惯于屈从权力，并且甘心情愿地作为政权的附属品，他们就不可能成为造反派。从另一方面看，那些未被承认的积极分子则不具备政权代表的自我形象。作为不受欢迎的角色，他们受到了压制，这就为他们以反叛者的方式进行活动提供了很大的机会。

在我采访的14个人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官方积极分子与同辈人之间的原则上的差别。团员比非团员有着更为强烈的权威意识，他们那种监督者的角色，严格的组织纪律所要求

的对团领导的服从，以及在他人面前以权威代理人自居的形象，所有这一切促使团员去选择权威所应具备的人格。

当然，消除这种权威主义倾向是不可能的，他们在学校中一直保持着这种倾向，并且在其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唤醒并培养着这种权威主义，而且还有增强的趋势。但是，这些青年在成长过程中接受了不同方式的实际教育，使他们的成功程度各不相同。简单地以白为例，他是一个自恃正直的权威主义者，虔诚地信奉党，即使他经常对抗党的上级领导，在中学里，他教训同学们该怎样做时，表现出的那种正直简直有些过分。其后，在农村他又获得一种救世主的自我形象，因为他想把一个落后的乡村转变为国内农村的样板。再以后，他认为自己是主持正义的，于是又成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勇士。他不是按人们的实际状况去评价群众，而是用书本上所学的去把群众分成三六九等，并且坚持如此毫不悔改，尽管在采访中他隐瞒这一点，他的是非观大多来自外部的教条——这些教条是由那些摩尼教的世界观决定的。他的政治世界是由两种力量构成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他可以跟随其中任何一党，只要能主持“正义之风”，并且反对“罪恶之风”。因此他对所学到的东西作了大量调整，以适应形势的需要，并且使这些溶化到他的人格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移居到了香港，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不存在强加于人的要求。然而白的个性仍保持相当稳定。但与此同时，社会施加给他的压力放松了，于是他停止了写日记。不仅是他，而是所有的采访对象的这一习惯都中止了。他常常屈服于一点小实惠。在朋友的婚礼上，他变成了贪吃之徒。

似乎要弥补他曾失去的食物。

区同样强烈地表现出权威特征。如同我所采访的其他人一样，她能自我约束，是个禁欲主义者，带有一种宗教色彩。她还十分担心自己思想中那些不赞成权威人物的因素，总感到自己无力把这些想法克制下去。由于这一重要原因的影响，她很难灵活地适应权威的控制，她下决心以最大的努力克服这一不足。由于害怕自己受到羞辱，她渴望证明她的优越地位，并且得到同辈群众的尊敬。所有这些都是那种学校制度中所鼓励的，从而她坚定了去适应社会的信念。可以说，她在培养自己的摩尼教世界观方面是成功了。她比白更极端，更恶劣地对待“阶级敌人”，对那些受到诬蔑的社会少数人的镇压，也就更加过分和残酷。

然而，一旦她进入中国以外的新的社会环境，她可以很容易地改变道路，寻求适应新环境的准则。当醒悟到遵从以往的社会准则没有任何回报时，她便放弃了旧准则，因为她认为那些准则带来的是失败。她无须伪装成无私者了。她使用利己主义的观点和语言，以不衰退的力量去得到新社会的认可。尽管她人格中的大部分内容没有改变，但还是保留了一部分以前的个性特征，消除并压制了其它部分个性特征。

在国内，无论是区还是白，他们的行为都是近似的。他们坚持黑白对立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中是非界线是由党的领导划分的。他们都谴责和惩罚那些未被认可的道德观和不规范的行为。对那些所谓是“阶级敌人”的人，持有严肃无情的成见，把他们看作是圈子外的卑鄙小人。他们向往在一个团结的集体中，不同身份的人都和睦安全相处。区和白

都寻求分享荣誉和权力，这种荣誉和权力是作为凌驾同辈人之上权威所应有的。总之，他们都带有权威人格的传统特征。

我认为，比起区和白来，张和邓有些逊色。张和邓仍然保留着在学校中接受的观念，他们既不是官方的积极分子，也不是坚定的追随者，总是处在圈外人的不稳固的位置上。他们与区和白在态度上的不同，部分地反映出他们不同的政治地位。他们不曾对为党献身充满激情，而是在所投身的社会洪流之中有意识地进行自我防卫，并且在内心世界中筑起对抗组织纪律的堡垒。他们有时反对限定的规范，不愿随波逐流，为坚持自己的个性而斗争。作为文革中造反派的头目，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享受自己所拥有的权力和统治他人的机会。这可以在邓的独裁式领导作风中现出端倪。但是，那种从社会和组织所规定的义务中摆脱出来的愿望强烈地激励着他们，这种愿望已经超出了他们试图控制他人思想行为的权欲。对那些打上了社会烙印的人，他们并不歧视，也没有摩尼教的观点，反而乐于接受异端思想。他们对人和事物以自己的评判为基础，而不是感情用事。而白则把他们看作是完全违背了意识形态原则的人，区在这样做时，则带着寻求权威赞赏的焦急心理。

张和邓那种勤奋和一丝不苟的自我锻炼，以及良好的自我修养，最符合党所赞赏的权威人格。但他们并不违背自己的意愿而屈从权威人格的要求：事实上正相反；他们的奋斗带很强的“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但是，在他们到香港之后，这些自我完善的努力与追求也随之崩溃了。在提倡自我

约束的社会环境中，张能够成为一个狂热的清教徒。可一旦取消了外界压力，他毫无疑问，也会成为一个十足的无政府主义者。

尽管有的采访对象并没有那种原始的权力欲，比如张和邓，但作为十几岁的孩子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出权威行为的倾向。正如我们大家所看到的，教室里也充满了社会和政治的压力，有时甚至非常强烈。有些学生比起张和邓来，更缺少独立性和反叛性，他们无法摆脱做一个顺民的压力，只能做一名虔诚的顺民。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也不时地表现出权威主义的种种态度和行为。

六十年代的早期至中期，学生们的压力愈来愈大，他们必须对正统政治俯首贴耳，坚贞不二。在这种同辈群体内部的竞争中，团支部作为表帅，严密地监督着学生们的行为，并对积极分子给予表彰。渴望入团，并且希望通过入团得到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心理，使得一部分年轻人的学雷锋运动已成为超出现性的狂热时，仍敢在政治上对自己提出更高的目标。学生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他们是在同辈群体的压力下进行竞争，并且在竞争中扮演角色。一切自发的行动都受到了抑制，因为这些自发行将有损于教条和纪律的实施。非常规的行为，在政治原则的层次上是要受到同辈群体的攻击和谴责的。

权威主义那时还没有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在它的拥护者那里，作为学生的经验已经展示出这种权威主义来了。文化大革命为极端主义提供了使它彻底表现出来的机会。毛泽东号召青年人保护他的革命路线，这就造成了他们

把权威当作偶像来顶礼膜拜，同时也助长了他们摩尼教徒般的刻板，残忍好斗，专横跋扈，但他们对亵渎那些学过的信条的人表示宽容。他们的内部充满了竞争需求。总之，就象伯克利研究计划所测验过的，他们的极端形式的行为反映出各种不同的“权威人格”。

很明显，只有在社会机构崩溃之际，以及在社会制度对极端权威主义的道德压抑消失时，年青人的信仰和需求才能得到充分的表现。有时候，他们也有充分的理由攻击权威，比如，在他们反对过分严厉或明显带有偏见的老师时，他们似乎是站在真理一边的。但情况远非如此，暴力往往是偏见、权威人物的狭隘、恐惧以及同辈群体的压力的产物。所有这些因素进一步促进了遵从行为。正象白所说的，就好象被卷入一股强大的激流之中。在文革最初几个月中，就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权威的社会性格了。

二、阶级分类

我们曾经注意到，一些关于社会性格的论述指出，即使同一社会团体大多数成员具有相同的社会性格，他们的行为也大不相同。六十年代中国城市中的学生里面，那些曾处在领导地位的积极分子较之那些不太得意的人总是多一些权威的个人性格。我们还可以同样看到，那些在政治挂帅的学校里学习的孩子们，往往更坚定地追随某种对他们有利的信仰。如同成功的运动一样，阶级这个称号为学生的权威主义提供了很好的划分标准。

在中国使用“阶级”这个字眼，明显地与马克思的阶级

定义不同。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阶级的产生和存在完全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所造成的差别。中国在解放后实行生产资料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因而急需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结构。苏联也发生了类似的社会结构变化。但在苏联，十月革命后的近一个世纪里，阶级斗争被宣布已经结束，并且在实际上，党已开始强调俄国阶级已不复存在。但是中国共产党却坚持认为，要保留旧的阶级范畴，人为地造成一种新的激进的社会秩序。共产党（包括毛泽东本人），坚持把“阶级斗争”当作一种手段，因为它可以使人民感激党，听党的话并且响应党的号召。从大众的立场看，重复六十年代的对阶级的赞美之词，只会受到从中得利的“红色阶级”的欢迎，而中间阶层的人们则认为那是政策混乱的结果。他们发现自己被包围在虚伪的稳定政局之中，被迫生活在传统社会制度的经济关系阴影之下。

用绝对的范畴来定义社会关系，便促使在人们的观念中掩盖了新社会的产生。不同于革命前的社会，新的社会分工是由权力关系的差别造成的，而在旧社会则是由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掌握程度造成的。作为列宁主义党执政的结果，便是已在统治集团的各个阶层中形成了一些新的特权人物，这就象迪吉拉斯所说的“新阶级”一样。毛泽东本人是反对这新产生的特权人物的。但他无法在不放弃列宁主义思想体系对党的控制的条件下，去消除新特权人物的权力关系。毛泽东的反应是，一方面发动群众运动并整顿腐化堕落的干部，另一方面要同时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

整个六十年代，那些官员与他们的孩子们一直努力保护

和扩大他们的特权地位并使之长期坚持下去，方法便是把具有保护色的列宁主义和阶级路线相结合。在文革前的学校里，干部子弟一直在寻求如何继承父辈们的特权，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在于那种婆罗门式的“红色阶级”的优越感。他们认为，只有那些具有特殊地位的年轻人才能担任领导职务，比如他们自己。

文革开始之前，这种极端的阶级等级的观念并没有完全统治学校。但从很早以前，阶级这一称号就已经使孩子们在教室中分成不同的等级了。他们都有不同的自我形象，不同的是竞争方式和不同的处事方法。

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相信他们在新社会中是大有机会的。他们广泛地接受了学校里教给他们的有关“阶级”的观念。区和白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这并不是说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已经成功地与不符合实际的阶级斗争的观念融为一体，而是他们在此基础上，还存在着自己的观点，也就是有理由获得自身的利益。作为可以团结的中间阶层的学生，他们享受着优于“反动阶级”子女的先决条件。这些中产阶级的子女发现，在他们自己和反动阶级家庭的子女之间划一条界线是件十分有意思的事情，尽管这条界限带有明显的偏执。大多数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准确地说，由于他们的政治地位没有保障，所以不象那些出身红色阶级家庭的学生那样强烈地仇视被污辱的阶级。总之，他们本身也有可能成为阶级路线的牺牲品，因为它过分强调阶级仇恨。我的一个采访对象对此曾有过一个十分贴切的说法，他说，“我们同样地背着阶级包袱。”

来自被污蔑为反动阶级出身的年轻人，是在一种社会自卑感中成长起来的，有时甚至比自卑感还糟。他们经常被拒绝扮演积极的政治角色。他们不但没有被争取到革命的一边来，反而连同他们的反动父母一起被遗弃了。

红色阶级出身的青年人在官方的宣传和鼓动下，已经自觉地成为学校政治生活中的中坚力量。而干部子弟身上的优越感和特权地位却妨碍他们自觉地革命。尽管他们最能保护现有的一切，但同时又最不服从学校的家长式特权。他们也有自己的苦衷，与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孩子们相比，他们对自己的二流的学习成绩有一种不稳定感。只要他们感觉不稳，或者感觉优越时，他们欺负弱者的倾向便极为强烈，就象文革中表现的那样。

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孩子，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都经常受到表扬，他们对党怀有一种感恩戴德的情感。但同时他们又不象革干子弟那样充满自信，因为他们不在新的社会中拥有领导地位和权力优势。

通过观察不同阶级背景的学生的不同处境，我们也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那个阶级的学生最具有权威人格，那个阶级的学生最不具备权威人格？那些来自反动阶级的子女在文革前或文革中很少表现出权威行为，他们未被给与向国家表示忠心的机会，所以我们可以说明，在他们身上究竟是否存在强烈的权威欲就很难说清了。在血统论和红色恐怖登峰造极的时期，干部子弟卷入了最偏激而且最野蛮的权威行为之中，劳动人民和中产阶级出身的子女却比较谦恭和随和。即使在他们有机会表现偏激、野蛮和暴力的时候，也还是比

较克制的。一般说来，阶级出身越好，权威人格就表现得越强烈。

即使我们注意到这种现象，我们也不得不说，同一代的各阶层学生（也许黑五类除外）都不同程度的具有这种社会性格。在那些年月里，中产阶级二等公民对权威人格已习以为常。他们中间大多数和出身好的积极分子一样，都是毛泽东个人迷信的虔诚的崇拜者。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同样不容易有反传统的思想和行为；同样热衷于迫害“反动”教师的活动。除去张以外，在我的采访对象中，仅有一个人对他周围的种种行为感到恐惧。

我这里再次说明，我并不否认偏激野蛮的权威行为在学生中的泛滥是政治社会化步步深入的结果。执政党头脑中想的是塑造一个虽然多少是权威人物但又遵守道德观念的公民形象，就象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所描写的一样。毛泽东头脑中的理想化的社会主义，不可能由少数社会斗士拉到现实中来。历史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新的社会关系和压力也随之产生。思想体系可以根据人们的自我利益来转移：由于考入大学和找到工作越来越不容易，这就使学生中的对抗心理增加了，本来就紧张的阶级问题日益激化。综合起来，在那些年中，由于学生们越发疯地争当空谈理论的积极分子，这代人中的权威的社会性格变得更加突出，远远地超出了政治社会化所预想达到的水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革中这些极端的权威人格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使党的领袖目瞪口呆。

37、权威主义与非社会化

我们从这些章节中可以看到，制度化的角色扮演和紧张的阶级问题交织在一起，如何影响了年轻人对待权威与服从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也同样看到了权威的社会性格为什么会在青年中形成，又是如何形成的。这里所说的是六十年代在中学学习的中国的年轻人。但在论述文革后果的章节中，我们同样看到，到了七十年代，接受我采访的14个人都改变了他们的处世哲学和信仰。

弗洛姆在论述人格和社会性格的发展与变化时是这样说的：

一定的性格倾向通常与儿童的环境相符，当某种性格倾向变得支配一切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其它的性格倾向就消失了，或由于受到压抑而不再表现出来……当环境变动较大时，儿童甚至包括以后的成年人有可能产生出一些潜在的，并与新形势更相适应的性格倾向。这种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最初的性格结构不会全部消失，而是部分地与新的性格结构溶为一体。一个新的性格结构与旧的结构没有根本的对立，但新的结构却足以产生一种大不相同的积极的性格特征……那些以前形成的性格结构所以在大多数人的一生中占支配地位，其原因不是由于这种性格结构刻板而不易改变，而主要是由于性格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一直

不断加强的缘故。

这就是接受我采访的14个人性格变化的方式。我们已经看到，年轻人对权威人格的屈从，是特殊环境下的产物。一旦外界条件放松，各种不同的人格倾向就会取代那些曾在学校受到鼓励的人格倾向。那些与权威联系在一起的某些行为模式，如果没有机会表现，也会成为潜在的东西留下来。另外，假如处在一种不受社会和政治信仰制约的环境中，这些潜在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弱甚至消失。在对毛泽东的中国的考察时，我们明确了社会化和非社会化这两个不同方面。

38、新一代

在本书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了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几种不同龄人的经历，但他们又都同属于一代人。解放后的第一代人现已三十多岁了。各种材料，包括中国近期的有关报道表明，这一代人仍是令人烦恼的一代。

年轻的一代人仍然要进行社会化。对待这新一代的青年，当局仍然使用一些对待上一代人的方法来教育他们。1977年，带着某种炫耀色彩，一场新的“向雷锋同志学习”运动又开始了。八十年代的中期，模范英雄仍然是党的“驯服工具”。空言与真实，理想与利益之间的鸿沟再一次通过对党的坚定信仰和积极分子的顺从而联结起来。

新一代人在1966年文革的狂热已经降温后才进入小

学，他们与我们所研究的那一代人有着明显的差别。文化大革命为先前的一代人与后来的一代人之间划出了一道明显的界限。对我的许多采访对象来说，文革中渡过的岁月象征着他们生活中的分水岭。渡过了从儿童到十几岁的少年的青年人只懂得一种单一的“真理”，现在突然面临着现实中的复杂的政治冲突。那些动荡的年月摧毁了积极分子理想主义的美梦。骚动年代的副作用及其余波现又追上了尚未成年的第二代。他们似乎没有继承上一代人单纯的理想主义，这一点可以从采访对象的兄弟姐妹以及外甥男女的谈话中得出结论。采访对象们常常带有某种怀旧情感，感叹于“我们的革命热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同时，对他们的年轻的亲属们表示轻蔑和藐视。他们绝望地谈到，年轻的一代人缺乏革命意识，缺乏事业心，注重物质享受并且对教师表示出失望。

总之，我们所调查的仅仅是一代人的经历，它既不同于前几代人，也与后来者不同。我们所讨论的中国现代史上的这一阶段，毫无疑问地一去不复返了，历史不能重演。那种助长权威的社会性格的特殊风气已不复存在了。

译者后记

这本书从酝酿翻译到最后定稿已经一年有余，中间的一些曲折，也许在这里还不便向读者交待。

关于本书的评价我想这并不是译者的责任。书摆在这里，每位读者都会有自己的看法。译者的职责只在于准确无误地把一种文字转化为另一种文字。至于中译本对个别地方有所改动，我想读者是会理解的。

在这里我想对为译者提供原书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系范惟凯教授表示感谢；同时，也向积极促成此书出版的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泽华先生表示感谢。没有这两位先生的帮助，这本书是无法与读者见面的。

最后需要指出，限于译者的资历和水平，译文中误植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指正。

史继平

于南开大学政治文化研究中心

1988.8.15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

作者 =

页数 = 281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